



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

财富管理信息



2020年第5期 (总第7期)

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

财富管理信息

2020年第5期（总第7期）

目录

★财富管理论坛	1
国内疫情下半场：如何扩大有效投资，推动经济复苏	1
人工智能与财富管理者信义义务的调适	7
股权信托在家族传承中的运用	13
金融消费者用户画像	17
吴晓灵：落实新修《证券法》 完善财富管理法律框架	20
阎庆民：推动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24
★财富管理报告	28
后疫情时代：中国城市消费力图谱	28
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	31
我国股票市场的投资者状况	36
★区块链论坛	41
区块链技术在流行病防治中的应用研究	41
区块链在公共事业领域的应用与发展	44
陈纯：中国区块链赋能各行业亟需解决四项核心技术	49
★公益慈善论坛	52
社区基金会在疫情防控中的行动空间及独特价值	52
“统筹”还是“知会”：抗疫中政府与志愿机制的协力模式	56
王瑾：更愿在边缘看公益圈	59

★山商实践探索	62
正规高学历公益慈善事业人才联合培养的可持续问题	62
儒家慈善思想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教学的建议	65
成功者从不靠偶然的机遇：我读《财务自由之路 3》	72
★学术资源推荐	79
图书推荐	79
论文推荐	82

主办：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 主编：崔洪海

责任编辑：陈浩义 排版设计：李嘉乐 封面摄影：崔洪海

★财富管理论坛

国内疫情下半场：如何扩大有效投资，推动经济复苏

3月25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和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共同举办“扩大有效投资，推动经济尽快复苏”网络视频会议。会议围绕国内疫情防控进入下半场后所面临的经济重建与如何尽快走出危机等焦点问题展开讨论并建言献策。

一、扩大有效投资，推动经济尽快复苏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扩大政府有效投资应以扩大公共消费为前提。

从经济视角判断，刘尚希指认为，当前政府投资的乘数弱、挤出效用高、边际效应低，投资效果不理想。他建议，提升政府投资“有效性”从以下三点基本思路出发，第一，要从“物本逻辑”转向“人本逻辑”，公共服务跟着人走，投资跟着公共服务走。第二，要从“经济效益最大化”转向“公共风险最小化”。第三，要从“划政府边界”转向“政府和市场、社会合作”，突破界域思维，以行为为基准来处理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总体上，刘尚希认为，从当前来看，要从“基于物的项目+投资”转向“基于人的项目+消费+投资”。对冲疫情影响，扩大政府有效投资，应以扩大公共消费为前提。

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纪敏：注重“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间的平衡。

纪敏认为，考虑投资作用时，既要考虑需求的情况、投资收益，也要考虑投资的成本和代价，注意平衡其中的关系。当前扩大有效投资，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综合考虑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短期来看，疫情的冲击下需要加大促进量的增长这方面的力度；但疫情终将过去，量这块的力度需要边走边看，根据情况灵活调整。成本和代价也包括体制固化，即增加后续改革难度。比如，在实施新老基建投资时，如果短期内刺激力度过大（当然需要也必须这么做），一些原有的本需改革的体制机制问题就会更为固化。纪敏表示，短期刺激稳经济与体制改革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寓改革于政策、用改革稳增长，愿望是好的，但实施起来不容易，需要平衡好稳增长和促改革、短期与中长期的关系。同时现在不比当年存在普遍瓶颈，当前扩大投资一定要考虑需求约束，否则无法回报投资难以持续。此外，新基建是高技术投资，还要考虑技术约束甚至技术人员的约束。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兼上海分行行长金鹏辉：扩大有效投资的六点建议。

金鹏辉围绕“如何扩大有效投资，推动经济尽快复苏”提出六点建议。一是

中央明确要加快数据中心建设进度，但在能耗方面地方政府受到硬性考核限制，建议将数据中心能耗单列；二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民用支线机场发展严重滞后，而航空业相对于公路、铁路而言有占地少的特点，当前应加大投资力度，建议优先考虑加大民用小型支线机场建设力度；三是在稳定房地产经济的前提下，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减少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抑制地方依靠房地产拉动经济的内在冲动；四是在稳定外贸外资方面，注重发挥人民币国际化作用，比如支持人民币跨境贸易再融资；五是改革GDP核算方式，可在目前生产法核算基础上，并行支出法核算方式，以更有利于真实核算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六是在稳投资方面，发挥国企和国资的带头作用，加快推进一批具有显示度的重大新投资项目的开工建设，进一步带动民间投资。此外，针对近两年谈的比较多的“进口替代”，金鹏辉认为，掌握“卡脖子”的核心技术不等于要搞“进口替代”战略，分工带来效益，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应该倡导国际分工和产业链全球化，尽可能发展出口导向。

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疫情对经济冲击较大，政策应及早出手。

黄海洲认为，目前最难稳的是信心，要从稳定有效需求着手，进而稳信心、稳就业。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投资非常有必要，但不应停留在对需求端还是供给端的争论上面。如果最终目的是稳信心，那应该及早出手，给市场一个明确的政策预期，这样有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比如，支持中小企业贷款、鼓励银行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等，通过从资本市场得到的回报来补贴对中小企业贷款可能面临的损失。

中国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方晋：扩大投资的三个方向。

方晋建议从以下三个方向扩大投资。一是有明显短板的地方。比如因为信息基础设施的短板、导致贫困农村的很多学生无法保质保量地上网课，导致了教育的不公平。二是因为管制导致没有释放出来的潜在投资需求。比如中国有大约4亿航空旅客，但机场只有六百个左右。三是对于已经看准方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已经被论证的产业、项目，可以加速投资。比如“新基建”中的5G，原计划三、五年布局，可以提前和加速投资。

中国铁建投资集团副总经理戴保民：有效投资的三条建议。

戴保民提出三方面建议。第一，坚持国有企业混改，推进理性投资。混改以后，推进国有企业核心员工持股，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第二，补充传统基建短板，加快新型基建投资。一是持续推进补短板，如城市轨道交通；二是持续推进水利工程建设，重点推进南水北调东线、西线二期工程；三是持续推进生态环保建设，主要包括大气治理、固废处理、污水处理等和土壤修复。第三，调整完善需求结构，提升有效需求，包括：全面放开生育、鼓励创业就业、完善社会保障、降低宏观税负、精减政府机构等。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鼓励社会力量办医院，大力发展商业保险。

朱恒鹏表示，疫情暴露出我国医疗服务体系长期存在的短板。他通过结构分析，认为民营医院当前占比仍然还很小；总体上医疗资源相对充足，但过度住院现象严重，基层医疗资源相对不足，此次疫情防控战中，基层医疗资源没有有效发挥作用。他建议，一是大力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基层医疗机构，夯实基层卫生服务数量，解决看病就医都往三级医院跑的问题；二是大力发展商业保险，政府保基本、兜底线，通过发展商保给参保者提供医疗服务，形成良性互动，最终形成数量足够大的、充分竞争的医疗服务体系。

上海市政府参事盛松成：房地产投资问题不可忽略。

盛松成表示，疫情之下，投资将会在今年经济增长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其中房地产投资是不可忽略的部分。疫情对房地产及直接相关行业的冲击非常大，既体现在行业投资和销售方面，也体现在就业方面，尤其要注意其中的隐性失业情况。应当在坚持“房住不炒”和“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前提下，稳定房地产投资和销售，避免房企资金链断裂和大规模倒闭。盛松成不主张运用下调首付比例、下调按揭贷款利率等需求端调控政策，因为这会导致房价大幅上涨。他建议应更多运用供给端调控措施，要保持一二线城市土地供给的适当增加。从长远来看，我国城镇化还有较长一段路要走，需要有与之配套的房地产供给和服务。此外，应重视房地产市场中的结构性的问题，包括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供给差别，商住楼和居民住宅的库存差别等。盛松成对前日刚出台的国务院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将在城市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赋予地方政府对具体项目用地和土地规划、使用等的更大审批权限，有利于充分发挥土地资源价值，有助于重大项目及时落实，有助于城镇化推进和城乡一体化改革。

二、“新基建”，是否能激发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新基建”前景广阔，政府和企业应合理分工。

江小涓判断，“新基建”短期规模有限，但能够带动的建设是非常可观的。从中短期看，“新基建”是促进疫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是重要的非常规的新增长点之一。具体而言，她指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在原来的信息技术条件下是非常难做到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为生产型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提供了真正的应用前景，并且很多前景非常有前途。比如，大型设备的远端服务、给企业提供生命周期所需的各种生产性服务平台、聚合中小企业闲置的全新生产性服务业平台等。从实施角度，江小涓认为，推进“新基建”政府和企业要有合理的分工，企业先行，如果企业不行，政府再做。政府方面，她建议，首

先，政府所属的机构应该多提供一些行业公共产品；其次，政府应该帮助企业来拓展海外市场，为企业创造更好国际营商环境；再次，政府要为数字服务的落地提供机会。总的来说，江小涓认为，“新基建”或新一代信息技术还是应该加快部署，其产业的发展空间前景是很大的，但是怎么部署，谁来做，还是要认真研究，不能政府企业社会盲目的一哄而上。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尽快形成对“新基建”的共识，做好应对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充分准备。

任泽平认为，在当前宏观背景下，“新基建”短期有利于扩大有效需求，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利于增加有效供给，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推动改革创新，改善民生福利。他预测，支撑未来20年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基建”是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消费升级领域基础设施。任泽平表示，启动新一轮基建，关键在“新”，不是四万亿重来，而是在新的领域、新的地区、新的方式、新的主体、新的内涵。任泽平建议，应区分“新基建”的基础设施和商业应用。前者更多的是由政府和市场一起来干，或者政府支持市场企业来干；后者更多的依靠市场和企业来干。政府、市场和企业相互地配合支持，共同发挥作用。最后，他建议，应该尽快形成对新基建的共识，做好应对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充分准备。有准备是机会，没有准备就是风险。

发改委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黄汉权：新老基建要统筹考虑协调发展。

黄汉权认为，第一，投资对于对冲疫情、恢复经济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短期可以形成需求，缓解个人消费和出口的大幅下降；中长期有助于形成有效供给和先进生产力；应该要加大力度。第二，在三大主要投资中，基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是立杆见影的，而且政府能够直接掌控，说干就能干。新老基建要统筹考虑、一体推进、协调发展。虽然当前“新基建”提及较多，但在传统基建中，历史欠账还比较多，需要补短板，例如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乡村振兴、生态建设等，不能光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考虑基建，还要兼顾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第三，重视推动新旧动能转化，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比如研发创新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建设、产业基础能力提升公共平台的建设、人力资本的提升等。

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新基建投资步伐应加快。

黄海洲认为，5G和相关的新基建是值得认真投资的，需要有一定前瞻性，能够有长期回报。投资领域可以更为广泛，他建议从两个维度来思考。一是当前在哪些领域相对而言投资不足，可以进一步补短板。二是这个投资既然是政府主导，要考虑公共政策的特点，既要考虑投资本身的回报，也要评估投资所带来的正外部性。他认为，无论是从满足人民需求的角度增加公共品的供给，还是从带

动民间资本和外资的角度进行的投资，只要方向正确，有利于未来整个效率的提升，就不必纠结于一些短期考量，投资的步伐可更快些。

华盖资本董事长许小林：医疗改革领域应成为“新基建”的重要内容。

许小林认为，医疗领域应该成为“新基建”的重要内容，医疗投资对吸引社会投资，恢复民众信心，拉动国内需求上有重要作用，医疗行业的投资重点建议放在家庭医生制度建设，尖端医疗装备方面的基础研发和高端医药研发等方面。

三、危机时刻的危机思维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面对灾害，我们要防止做错什么。

面对灾害，我们要防止做错什么？李剑阁认为，第一，能力建设与保有成本之间要有权衡。实行大规模投资拉动和刺激经济的时候，投资效益的原则也决不能废弃。补短板固然是必要的，但从投资角度讲，也要有一个成本与效益的分析，要考虑投资的实际作用、建设与维护的成本负担等问题，不能因此挤占其他必要领域的支出。第二，坚持市场化改革，不走回头路。每一次灾害发生，计划经济就有回潮的苗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倾向。这次新冠肺炎发生后，舆论上又有较多关于强化公有医院、批评前期医疗改革成果的声音，否定“社会办医”在医疗卫生体系中的作用。这个倾向是非常危险，容易导致“财政真花钱、基层假干活”。重大灾难之后，我们应该对体制机制暴露出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完善，而不能重走计划经济的老路，否则同样的问题还会出现在下一次危机事件中。第三，新基建要坚持市场导向。要考虑在现有体制下，避免与实际脱节。有些地方将某些“新基建”的项目摊派给基层，如5G基站建设。这样产生不了投资带动效果，还挤占了基层的日常开支，扭曲了政府和企业、企业和市场的关系。李剑阁认为，只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建立良好的国家信誉，体制是健康的，方向是正确的，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这次的经济衰退。

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在危机时刻应该有与之配套的危机思维。

赵燕菁认为，现在最亟需的，是做出一个大判断，我们面对的是正常的周期性经济波动，还是世界级的经济危机。如果是后者，我们就需要切换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目标体系和行动模式，在危机时刻应该有与之配套的危机思维。危机增长最关键的是创造有效需求，所有基建最终都必须建立在需求之上。就中国目前发展阶段而言，最主要的消费品，一个是住房，一个是汽车。当年德国就是依靠这汽车和住房带来的巨大投资和消费需求，率先走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住房方面，可以借鉴先租后售模式（1998年房改），让收入最低的居民也可以通过租满一定年限后补差价买下房子。这样，既可以避免对现有房地产市场的冲击，还可以带动装修和家电的大型耐用消费品行业增长；汽车方面，建议全面取消摇号购车等限制措施，降低汽车购置费。同时对现有道路进行智能化改造，根据车辆对道路资源的使用情况来收费。释放汽车消费的需求，提高道路资产价值，在

债务不变的条件下，达到去杠杆的效果。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需要“新”宏观调控框架和理论思维处理疫情影响下的经济调控问题。

刘元春认为，当前需要一个新的宏观调控框架和理论思维，处理疫情影响下的经济调控问题。第一，在不同阶段，疫情对经济系统的冲击具有不同性质，政策的把控必须匹配冲击的性质。比如，在疫情全面爆发和全面管控期间，政策要配合物资调配，打好疫情阻击战；疫情好转之后，首先要通过行政推动复工复产，恢复经济循环；疫情完全控制之后，市场发挥作用，这时候，疫情带来的供给、需求损失将全面显现，出现萧条期，具体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民众信息不够、局部出现供给瓶颈，因此政策上要有针对性的扩张有效需求。当前的重点是要通过行政的力量推动复工复产。第二，要根据不同阶段的任务和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行精准的政策匹配。然后考虑是否应该加大逆周期调整，是否应该加大稳投资力度，或是是否应该加大“新基建”为先锋的投资扩张政策，最后才会延续到发展“新基建”该把握什么度，用什么范围，谁做主题等问题。

中保投资董事长任春生：治急病和治顽症方法不同。

任春生表示，此次疫情导致人流物流资金流的中断，不同于以往经济循环和结构性恶化，治急病和治顽症方法不同，中国这几年降杠杆成效显著，情况也不同于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市场。他建议当前的宏观政策，一是补缺口，保必需品、保民生、保就业、保稳定，二是在疫情可控的条件下加快复工复产，激活企业自我修复；三是加强投资，新旧基建结合，在发展“新基建”的同时，补足传统基建短板。生产和投资是保就业、拉消费的基础。任春生认为，在外部疫情防控错后、全球经济衰退、逆全球化等因素影响下，外需明显减弱，生产和投资要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更加关注在实现可自我循环、自我消化的领域，二是在引领未来长期发展进可攻、退可守的基础性、依托性项目和必需品上，防止形成难以消化的过剩产能。在金融支持上，实体经济需要的资金形式是多样的，财政资金在数量和方式上都无法满足，产业投资更多地需要社会和金融资金参与，保险投资应创新投资品种和管理模式，更好对接实体经济多样性合理需求。

申万宏源总裁助理陈晓升：不能忽略疫情冲击的第四阶段。

陈晓升认为，疫情的冲击有四个阶段，一是国内经济活动暂停，二是国内经济重启成本，三是全球经济活动暂停，四是经济活动在按下“暂停键”后，出现的中小企业倒闭潮，从而引发全球金融信用风险，继而导致金融危机。目前，我国主要是应对第一、二阶段的冲击，对于第三阶段，还没有过多的动作。但如果现在不就第四阶段的冲击构建应对政策框架，后期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他认为货币政策只解决流动性问题，但全球政府财政资源很难拿出和 2008 年中国四万亿相匹配的财政支持力度来应对疫情的冲击。此外他还肯定了南京等地发放消费券

的刺激消费方式。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不能将危机应对政策和改革对立或混为一谈。

邢自强表示，不能将危机应对政策和改革对立或混为一谈。危机应对的宏观政策，讲究的是最小化副作用的同时，准、狠、快。“新基建”投资占整体基建投资的8%左右，难以成为应对疫情冲击的主要抓手。改革措施方面，几个重点城市群的土地使用改革、资源配置、以及下一阶段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提升长期生产率等都是大方向。从应对政策角度，参考全球各国目前推出的一揽子方案，总方向是纾困，用财政的钱、准财政（政策金融）的钱、国有资源的钱（水电、租金、出行费用），为企业和个人在停摆期间的损失部分买单。我国发行特别国债，可以兼具长期投资和短期纾困，除了一小部分用于基建和公共卫生开支外，剩余部分可用于对中小企业和个人纾困，具体措施为退税、免租、免息、免社保缴费、发消费券。

上海外经贸大学教授汪其昌：放松管制，充分发挥个人企业家才能。

汪其昌认为，要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企业家才能，放松管制，减少政府干预，尤其是在国企改革和农村土地领域；要改革政府部门绩效考核内容和方式，保护公司和私人创业的积极性；此外新经济新产业呼唤新的规则体系变革，新经济新产业更多依靠消耗人的智力资源、知识和数据信息等抽象生产要素，由此需要新的与之匹配的金融、法律、行政管理、政府服务等规则体系变革。

清控银杏董事长罗苗：希望政府对创投行业减负松绑，减少行政干预。

罗苗认为，创投行业受疫情的影响非常大，募资难等问题加重。他从行业角度建议监管层重视并帮助解决募资难和流动性的问题，希望创业板注册制能尽快实施，吸引社会资本敢于投资高科技企业。同时希望政府对创投行业减负松绑，减少行政干预。

来源：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ksV4NeAh3b7eXAOEkSsLtA>

人工智能与财富管理者信义义务的调适

2008年爆发的美欧金融危机，给财富管理市场带来了很多新的挑战，如何赢得财富所有者的信任、有效管控风险、降低管理成本、回应新的投资原则与监管要求，以更好地服务于客户利益，成为财富管理者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AI）所展现出的强大、高效、多维的能力及其不断增加的广泛适应性，使得它越来越受到财富管理者的青睐，成为财富管理者应对新挑战的重要凭借之一。

贝莱德公司（Blackrock）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近年来，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在资产管理领域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可以预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在自然语言能力、机器学习能力等方面的突破，人工智能将会越来越成为财富管理领域的核心工具。

但是，人工智能的应用在很多方面也将改变传统财富管理模式，新模式在突出、强化人工智能作用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将改变甚至弱化财富管理者的作用，并进而改变客户对财富管理者的期待及其与财富管理者之间互动的方式与内容。管理模式的改变在很多方面对传统的财富管理法律关系的假定前提将会形成冲击，从而要求对这些法律关系及相关的法律问题进行调整或重新界定。

财富管理者的信义义务是财富管理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基石之一。如何调整财富管理者信义义务以适应人工智能应用所带来的财富管理模式的改变，是人工智能在财富管理领域普遍应用的一个重要前提，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一、人工智能与信义义务的范围与责任主体认定

在所有类型的信义关系中，受托人对委托人负有信义义务，这是各国法律上的普遍规定，也是学术上的共识。信义义务发挥着两方面的作用，首先是保护委托人的利益，在委托人的财产交付受托人持有、管理与处分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信义义务的保障，委托人的利益将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其次是免除管理者的无限责任，管理者在履行了信义义务的情况下，除非法律与合同另有规定，管理者对受托管理的财产的损失不承担法律上的责任。

在财富管理关系中，信义义务的主体是财富管理者，传统上其信义义务的责任范围涵盖所有的财富管理行为，这是因为在实践上，财富管理的每个环节、各个方面都处于管理者的控制之下，每个管理行为都是由财富管理者亲自或委托他人做出的，对行为的事实与法律依据及预测性结果都（应当）十分清楚，委托人的委托财产受管理者行为的直接影响，财富管理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是法律上与道德上的应有之意。可以认为，传统上财富管理者对财富管理的所有方面与所有行为都负有信义义务的前提，是管理者对财富管理过程与技术的全面掌控。

但是，人工智能在财富管理领域的应用，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一前提。人工智能应用已日益扩大到财富管理的每一个方面，包括资产管理、财务顾问、投资决策、客户服务等。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能力、自律能力与数据收集与处理能力越来越强，虽然从财富管理全景上看，它仍然是工具性的，但是，人工智能的管理与决策过程、决策结果，将越来越超出人的控制与理解范围，作为管理者的自然人将难以做出清晰的解释。由此将引出两个问题：一是人工智能的行为与后果，是否属于信义义务的范围；二是对于不受自己控制且自己不理解的人工智能行为及其结果，财富管理者是否要承担信义责任。

因人工智能在财富管理领域的应用到目前为止还处于起始阶段，由此引起的

信义义务主体责任问题还不是很突出，对于上述两个问题的探讨还处于初步阶段，但很多公司与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有些资产管理者如美洲银行明确表示，银行将对人工智能决策及其后果承担责任，而有些学者则认为，由于受信任的家族财富规划者与计算算法之间的差异，对于人工智能是否符合信义义务标准值得怀疑。

但从信义义务的性质与目的来看，不论人工智能应用与否，委托人的权益不应受到影响。从根本上讲，人工智能的应用是财富管理者为适应市场发展及出于竞争的需要而采用的应对性手段，目的是提高财富管理的效率并降低成本，不能因此而减损委托人基于信义关系原本享有的权利与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工智能在财富管理领域的行为与后果，仍然属于信义义务的范围。因此，对上述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

但更关键的是第二个问题，即信义义务的主体如何认定。很显然，人工智能本身不是一个责任主体，无法承担信义义务，信义义务只能由财富管理者承担。但是，财富管理者信义义务范围是否全面涵盖人工智能的全部行为与全过程，则需要进一步分析，因为受托人承担信义义务的前提是其对财富管理过程与行为的自主性与控制，它与人工智能的过程与行为在某些方面将越来越超出其控制的范围，存在着冲突。管理者承担人工智能相关的信义义务，须考虑如何协调这二者之间的冲突。

对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完整的、确定性的答案。考虑到该问题的复杂性，上述冲突无法用一个简单的方案或规则来解决。从人工智能在财富管理领域应用所展现出的主要特征来看，解决该问题至少须从四个方面进行考虑：

其一，关于人工智能在财富管理领域应用的适格性。对于采用的人工智能是否适应财富管理的要求与需要，财富管理者应承担信义义务。适格性证明需要一套行业公认的标准，在财富管理者采用符合标准的人工智能系统的情况下，即可认定财富管理者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已履行了信义义务。其二，对于人工智能在财富管理中的管理与决策行为。如果能证明符合一般的专业财富管理者的行为标准，即可认为财富管理者履行了信义义务。其三，如果在人工智能管理与决策过程中，财富管理者进行了人为干预，对于干预导致的后果，财富管理者应承担信义义务。其四，对于人工智能管理与决策行为在其他情况下的后果，在财富管理者不存在过失的情况下，可考虑采取保险、在不同的相关主体（如人工智能开发者、提供者、使用者等）之间利用契约划分责任等方式解决，但如果财富管理者疏于采取防范相关风险的措施，则应承担信义责任。

二、人工智能与财富管理者信义义务标准的调整

几个世纪以来，信义义务的标准与内容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在学术界也存在着争议，但是它包括忠实义务与谨慎义务两大方面已成为普遍共识。信义义务这

两个方面的具体标准与信义关系的具体内容及受托人作用息息相关。随着信义关系的商业化与市场化，受托人义务越来越积极化，信义义务的标准也随之不断变化。人工智能的应用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将是财富管理领域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它对信义义务的标准也必将产生新的影响。

忠实义务的核心是要求管理者的行为主旨以委托人的最佳利益为目标，除非委托人同意，不得使自己处于与委托人利益相冲突的境地，不得从自己管理者的地位中牟取利益，在任何情况下管理者必须秉承善意行事。忠实义务的标准相对较为稳定，而且义务的核心内容已逐步法律化。人工智能的应用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忠实义务的标准，但是，在两个方面，忠实义务的标准须因之做出调整。

其一是最佳利益判断问题。最佳利益一直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并没有明确的标准，总体来看，传统上是以短期经济利益作为判断的主要因素。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近年来不断受到重视的可持续金融理念、政策与规范，使得最佳利益的理念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长期与短期利益的平衡、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平衡上。人工智能的优势在于数据与计算，但人工智能能否对委托人的非经济利益做出准确判断，仍存有疑问，因为委托人的非经济利益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或社会特征，需要综合各种具体情形与非标准化因素进行判断，并需经过与委托人的反复沟通方能确认，而以逻辑与数据为基础的人工智能在此方面的判断能力相对较弱。另外，人工智能能否对于委托人的长期利益进行准确界定，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因为长期利益既须考虑委托人的委托目的，也要考虑未来受益人的利益，还要对宏观经济、政府的政策与监管、社会价值取向等做出综合判断，而这些判断也是非标准化的，人工智能在这方面不具有优势。在这两种情形下，人工智能应用是否需要管理者的介入，以及管理者的介入将承担何种责任，将是一个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其二是秉承善意行事标准问题。善意只能由具有独立意志的主体才能拥有，人工智能本身无法拥有善意或恶意。但是正如很多研究者指出的，人工智能将不可避免地具有自身的系统性偏见，在不能认定此为人工智能非善意的情况下，如何判断管理者善意与否，将是一个难题。总体看来，不能简单地将人工智能的系统性偏见视为管理者的非善意，在管理者不知晓、不理解人工智能系统性偏见的情形下，该偏见才与管理者善意与否无关；如果管理者知晓人工智能系统性偏见但未采取任何措施，则管理者须承担忠实义务。管理者在此情形下可采取的措施包括消除或校正人工智能的系统性偏见，或者在系统性偏见无法消除或校正的情况下，对人工智能的管理或决策行为做出必要的人工干预。

关于谨慎义务标准，西方经历了从数量标准（英国的“法定清单（legal list）”方法）、谨慎人标准到谨慎投资人标准的演变。为适应资产管理的不断商业化趋势及现代投资组合理论（MPT），谨慎投资人标准在谨慎人标准基础上，更加强

调专业管理者的行业标准,强调并确认专业受托人的信义义务(特别是谨慎义务)标准应高于一般的谨慎标准,受托人应拥有较高的专业管理与投资技能。

人工智能应用能进一步为财富管理者赋能,有助于管理者履行谨慎义务,但它同时也对谨慎义务的标准提出了需要考虑与应对的新问题,特别是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如何判断行业标准问题。传统上,行业标准是以行业的普遍实践与对从业者的专业要求作为重要的参考标准,是以“人”为参照对象。但是,人工智能在某些方面所展现出来的专业技能,如数据与信息收集与处理、成本与收益计算、客户服务的及时性与容量,都将远远超出专业人员所能达到的水准。在人工智能应用的情况下,财富管理的专业能力是以通常的从业者的普遍能力作为标准,还是以从业者能力与人工智能赋能的综合能力作为标准?如何判断人工智能在行业中的普遍或平均能力?人工智能的应用将使谨慎义务的专业基础更加复杂化。

其二是管理与投资决策的合理性问题。为了证明管理者尽到了谨慎义务,管理者必须能够说明其管理与投资决策理由与合理性。在人工智能初级应用、受管理者控制的情况下,既有的谨慎义务标准完全能够适用。但是,随着人工智能自主性与机器学习能力的不断提高,人工智能将利用远超人类能够掌握与计算的大数据、通过系统自身的逻辑与程序做出决策,人工智能如何收集、加工、利用数据将不是一个可见的过程,即存在一个所谓的“黑箱操作”过程,人工智能不会对此做出完整的记录与解释,管理者将很难对人工智能的决策理由与合理性做出明确的解释,甚至也并不理解。在此情况下,传统的基于专业的合理决策标准也将无法适用。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管理者谨慎义务的标准必须随着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而做出调整。调整的基本原则应是将人工智能系统的适格性与操作的合程序性纳入到管理者谨慎义务的标准之中,在人工智能应用的情况下,弱化对人工智能管理与投资决策本身合理性标准在判断谨慎义务中的作用。

三、人工智能与财富管理者信义义务内容的新变化

人工智能应用既导致财富管理者行为与作用的改变,同时也将从不同方面对委托人的权益产生影响,委托人与管理者之间的联系、权利(或权力)与义务也将发生改变,二者之间信义关系的内容也必将随之而变化。人工智能应用带来的财富管理新变化也必将反应在信义义务内容之中,使信义义务内容进一步丰富、发展。从人工智能的特征、在财富管理领域现有应用与可能的发展方向来看,人工智能对信义义务内容新发展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确保人工智能系统适格性义务。人工智能日益成为财富管理的重要工具与手段,在很多方面将取代自然人的工作,人工智能系统是否符合财富管理的需要、

是否适于从事相关的财富管理工作，对于财富管理是否能够实现委托人期望的目标、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人工智能本身并不是信义义务主体，而财富管理者对于人工智能管理与决策过程并不能完全掌控，因此确保人工智能系统本身的适格性具有基础性意义。只有适格的人工智能系统才能解决由人工智能对信义义务所带来的新挑战，在委托人与财富管理者的信义关系中形成一种新的平衡。

对委托人数据进行保护的义务。随着人工智能及其他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个人数据保护日益成为广受关注的重要问题，很多国家和地区都相继出台了个人数据保护政策与法律。在财富管理中，管理者对委托人负有保密义务，但传统的保密义务已无法为应用人工智能进行财富管理情形下的个人数据提供充分的保护。一方面，基于信任与应用人工智能进行持续财富管理的需要，个人数据将前所未有的持续地汇集于人工智能系统中；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使得个人数据的存储、拷贝、传输更为便利，个人数据扩散与用于其他目的的风险呈几何级数增长。因此，在人工智能应用的情况下，个人数据保护义务更为迫切、更有必要。财富管理者不仅对数据负有保密与妥善保管义务，而且负有采取必要技术与手段确保人工智能系统中数据的安全，确保基于财富管理收集的数据不得用于其他目的。个人数据保护义务将成为人工智能应用情形下财富管理者信义义务新的核心内容之一。

确保人工智能系统正常运转的义务。由于人工智能对委托人的利益具有直接而重大的影响，人工智能系统的正常运转因而也就具有了基础性的意义。为了使人工智能能够正常发挥管理与决策作用，除了须确保人工智能系统适格外，还必须保障人工智能系统运行正常。虽然人工智能的算法与运行进程不受财富管理者控制，但对于人工智能是否能够正常运行，管理者仍负有直接的管理责任，确保人工智能系统正常运转成为管理者须承担的信义义务。为此，在技术人员配备、人工智能运行环境、人工智能系统升级维护以及异常情况下的应对措施等方面，财富管理者须做好必要而充分的准备。

人工智能的应用将引起财富管理模式的重大变革，管理者的信义义务的范围、标准与内容等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如何调整管理者信义义务以适应人工智能应用所带来的新变化，是财富管理领域大规模应用人工智能时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本文只是关于人工智能与财富管理者信义义务调适的一个初步思考，随着人工智能更加广泛、深入地应用，它对信义义务的全面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探讨。

作者：程卫东

来源：东方资讯网

<http://mini.eastday.com/a/200410142328370-4.html>

股权信托在家族传承中的运用

股权信托不仅能传承财富、延续商业生命，更是一种和控制公司的高效、专业手段。股权信托的设计可以帮助企业家化解三大传承之困：人问题、企业权属问题、市场内外环境。

详解英皇国际、永达汽车两大实操案例，带您了解股权信托在家族传承中的运用股权信托发展的时代背景。

“因时而立，因势而为”成事之道，在于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股权信托在国内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既与信托制度的优势有关，也与中国即将迎来以企业为主体的财富传承的大周期紧密相关。

一、中国未来财富将持续增长

根据贝恩公司和招商银行发布的《2019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国私人银行业：回归本源》简称《2019 财富报告》，2018 年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总规模达 190 万亿，可投资资产在 1000 万以上的高净值人群数量达到 197 万人（预计到 2019 年底将达到约 220 万人）高净值人群人均持有可投资资产约 3080 万，共持有可投资资产 61 万亿（预计到 2019 年底将达约 70 万亿）如此巨大的市场，为家族财富了广阔的蓝海。

图 1、2008-2019 年中国高净值人群的规模及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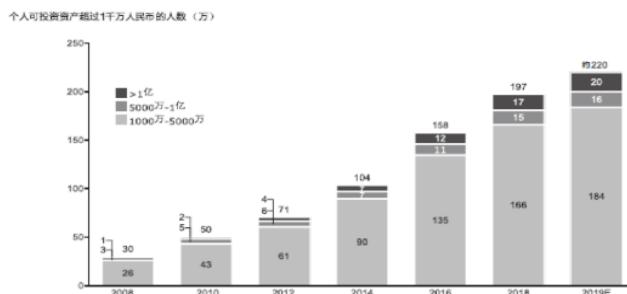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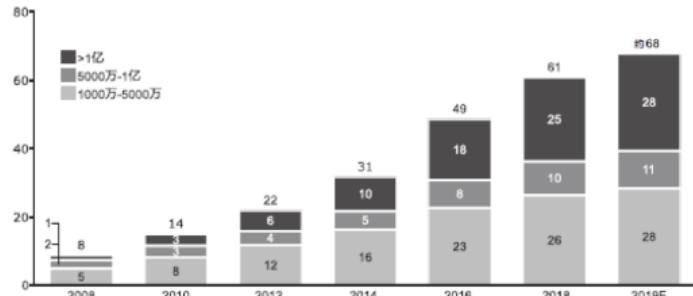


图 2、2008-2019 年中国高净值人群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及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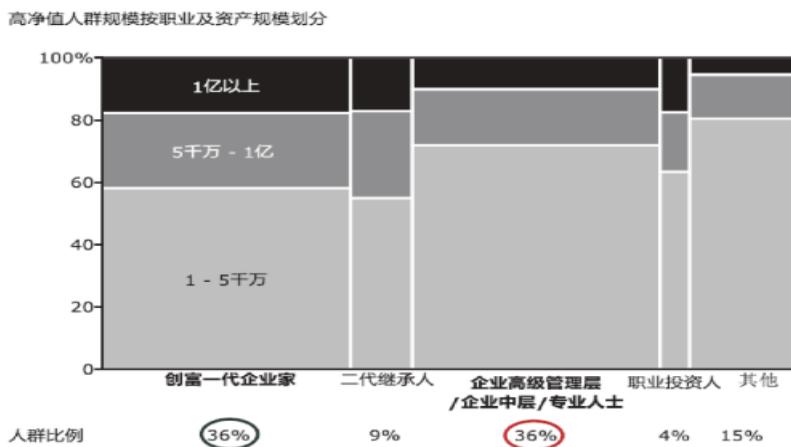


二、企业主是高净值人群的主体

根据《2019 财富报告》在高净值人群中，企业主占非常高的比例，且其身价上亿的比例最高。其中，创富一代企业家与企业中高层（包括高级层、企业中层

及专业人士) 分别占比 36%。

图 3、2019 年中国高净值人群构成按职业及资产规模划分。



三、家族传承迫在眉睫

未来 10-20 年是中国私人财富传承的集中窗口期。2019 年，超过 50% 的受访高净值人群已经开始准备或正在进行财富传承的相关安排，比例在过去十年来，首次超过尚未开始准备的高净值人群。而且，86.2% 的企业家开始考虑或着手准备家族传承的事情。即将到来的家族企业传承浪潮，为股权信托了巨大的市场需求。

不过，家族传承面临人、企业权属及市场内外环境三大问题：

一是人问题。主要体现在人继承意愿低、人理念与企业价值取向冲突等。

二是企业权属的问题。包括职业经理人稀释控制权，家族成员复杂、权属不清等。

三是市场内外环境。环境则体现在专业经验少且缺乏长期规划。

对于企业主面临的上述难题，股权信托可以有效的解决方案。伴随着未来家族传承的浪潮，股权信托必将迎来市场业务的井喷期。

四、股权信托在家族传承中的运用

家族企业凝聚了企业主的毕生心血，且优质企业的股权具有长期增值的巨大潜力，企业主对于家族企业通常具有深厚的感情，不愿对外转让。而且，家族企业多为封闭公司，缺乏成熟评估股权价值的机制与市场，如果以变卖方式处理股权，可能导致股权价值减损，并丧失未来增值的收益。对优质企业来说，传承是更优的选择。

家族企业的传承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常规方式，即将企业股权以、赠与或法定继承等方式分配给家族成员；另一种是设立股权信托。二者的现实效果截然不同。

方式一：常规方式

如果企业主通过、赠与或法定继承等方式将家族企业的股权交给家族成员，家族往往会因持股过于分散而失去对企业的控制，众多股东在关键事项上也难以

达成一致，容易出现相互扯皮的情况。一旦家族内部出现纷争，家族企业将首当其冲，甚至因此陷入公司僵局（这类悲剧屡见不鲜）此外，许多企业主的下一代不愿意或不具备接管企业的能力，这些都可能导致第一代创业者的平生事业付诸东流。

方式二：股权信托

设立股权信托，是将家族企业的股权交给其信任的自然人或专业机构（如律所、信托公司、私人信托公司等）股权信托的安排能紧锁家族企业股权，建立起有弹性的企业管控机制，有效防止控制权旁落，确保企业永续经营。无论家族成员内部分家析产还是婚姻变故，家族企业的控制权都牢牢掌握在为家族利益服务的受托人手中。企业主可以保留对家族企业的权限，掌舵企业的发展，也可以发挥专业机构的能力，协同培育下一代人，实现企业平稳过渡。

股权信托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利益分配机制，相比于等其他机制通常更为灵活，企业主可以在生前就家族财富分配作出安排，设置不同类型的受益人，保障家族成员生活与事业的不同需要，减少家族纷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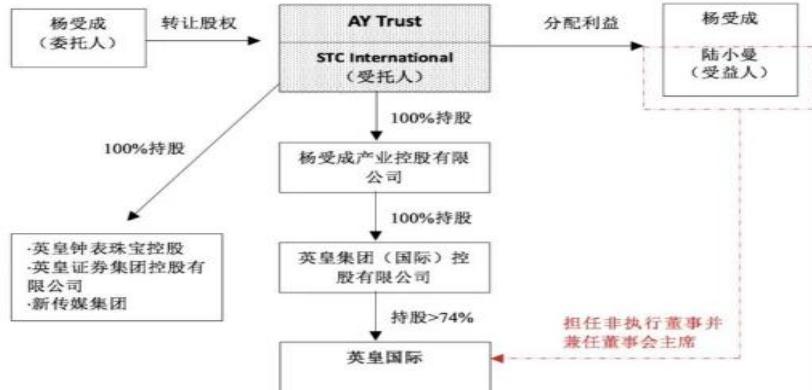
股权信托还可以规避漫长繁琐的继承程序。以美国为例。美国继承法规定了严格的认证程序，在继承中，继承人必须首先向申请认证，收到申请后要实质并公告，只有公示期间无人提出异议，继承人才能开始继承，耗时至少一年以上。对于商业环境瞬息万变的企业经营来说这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为此，许多企业主设立生前信托，由自己作为受托人持有股权，继续控制企业，而在他去世时，企业控制权将无任何延迟地移转给继任受托人，企业股权也可以清算后交给指定的受益人。

经过对比可知，股权信托是家族企业传承的利器，可以有效地掌控和维持家族企业控制权，隔离风险，防止因分家析产、婚姻变故等引起的控制权旁落或丧失，帮助家族企业长久经营。同时，通过股权信托可以建立起有弹性的企业管控机制，有助于家族事业平稳过渡。

五、股权信托实操范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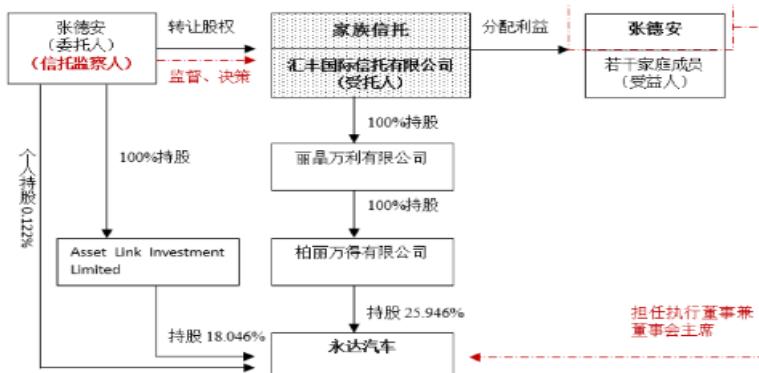
从境内外实务看，股权信托运用灵活，适用场景广泛，知名企业家如杨受成、张德安、李嘉诚、吴亚军、潘石屹等均设立了股权信托，实现对家族企业的有效控制。试举两例：

1. 英皇国际杨受成股权信托实例。杨受成是香港知名的企业家，以经营钟表发家致富，其后涉足房地产、娱乐、金融等领域。英皇集团（国际）有限公司（简称英皇国际）是杨受成控制并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杨受成对该公司及整个企业集团的控制，主要是借助股权信托的架构。根据英皇国际历年的中期报告和年度报告，其股权信托结构如下：



操作模式：杨受成设立名为 The Albert Yeung Discretionary Trust（简称 AY Trust）的股权信托，其中，受托人是其注册成立的公司 STC International Limited，受益人是杨受成及其妻子陆小曼。具体操作模式是，信托受托人 STC International 全资持有杨受成产业控股有限公司，而杨受成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全资持有英皇集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进而由英皇集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绝对控股英皇国际（超过 74%）而且，受益人陆小曼担任英皇国际董事会主席，以此实现 AY Trust 的间接绝对控制。该信托架构还全资控制了其他几家上市公司。通过一系列的控制安排，杨受成保持了家族集中持股，牢牢控制了整个企业集团。

2. 永达汽车张德安股权信托实例。中国永达汽车服务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达汽车）是在香港主板上市的集团企业，张德安担任主席执行董事兼董事会主席。为了达到长期控制的目的，张德安也设立了复杂的股权信托结构。



操作模式：2012 年 4 月，Asset LinkInvestment Limited（张德安全资控制的公司）将其持有永达汽车的部分股份（约 30%）无偿赠与给柏丽万得有限公司—该公司由丽晶万利有限公司全资拥有。2012 年 4 月 5 日，张德安成立家族信托，将其全资持有的丽晶万利有限公司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受托人汇丰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张德安及其家庭成员作为受益人。为了确保受托人遵照信托条款并为受益人的利益服务，张德安担任该家族信托的监察人，实时受托人的信托行为。

来源：金融界微信公众号

作者：杨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4945003711895877&wfr=spider&for=pc>

金融消费者用户画像

用户画像是对现实世界中用户的数学建模。用户画像是描述用户的数据，是符合特定业务需求的对用户的形式化描述——源于现实，高于现实；用户画像是通过分析挖掘用户可能多的数据信息得到的——源于数据，高于数据。

用户画像是在了解客户需求和消费能力，以及客户信用额度的基础上，寻找潜在产品的目标客户，并利用画像信息为客户开发产品。提到用户画像，很多厂商都会提到 360 度用户画像，其实 360 度客户画像是一个广告宣传用语，根本不存在数据可以全面描述客户，透彻了解客户。人是非常复杂的动物，信息维度非常复杂，仅仅依靠外部信息来刻画客户内心需要根本不可能。用户画像一词具有很重的场景因素，不同企业对于用户画像有着不同的理解和需求。举个例子，金融行业和汽车行业对于用户画像需求的信息完全不一样，信息维度也不同，对画像结果要求也不同。每个行业都有一套适合自己行业的用户画像的方法，但是其核心都是为客户服务，为业务场景服务。

一、金融消费者用户画像兴起的原因

金融消费行为的改变，导致当前的金融企业难以直接接触到客户。“80后”“90后”总计共有 3.4 亿人口，并日益成为金融企业主要的消费者，他们的金融消费习惯正在改变，他们不愿意到金融网点办理业务，不喜欢被动接受金融产品和服务。年轻人将主要时间都消费在移动互联网，消费在智能手机上。平均每个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间超过了 3 个小时，年轻人可能会超过 4 个小时。浏览手机已经成为工作和睡觉之后的第三大习惯，移动 APP 也成为所有金融企业的客户入口、服务入口、消费入口、数据入口。

金融企业越来越难面对面接触到年轻人，无法像过去一样，从面对面的对话中了解这些客户的想法，了解年轻人对于金融产品的需求。客户群体正在出现分化，市场上很少有一种产品和一种金融服务可以满足所有客户的需求。金融产品也需要进行细化，为不同客户提供不同产品。这里的“不同客户”包含三层含义：

- (1) 客户消费习惯的改变，企业无法接触到客户，无法了解客户需求。
- (2) 客户需求的分化，企业需要细分客户，为目标客户开发设计产品。
- (3) 金融企业需要借助于用户画像，来了解客户，找到目标客户，触达客户。

金融企业面对的客户群体基数很大，有的客户风险偏好高，希望高风险高收益；有的客户风险偏好低，希望稳健收益；有的客户金融理财意识低，只需服务较好即可；有的客户完全没有主意，倾向于听从客户经理的方案；有的客户注重体验；有的客户注重实惠；有的客户注重品牌；有的客户注重风险；等等。不同年龄、不同收入、不同职业、不同资产的客户对金融产品的需求都不尽相同。金

融企业需要为不同的客户定制产品，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对于金融企业，理财和消费是主要的业务需求。

二、用户画像的实践原则

市场上用户画像的方法很多，许多企业也提供用户画像服务，将用户画像提升到重要位置。金融企业是最早开始用户画像的行业，由于拥有丰富的数据，金融企业在进行用户画像时，对众多维度的数据无从下手，总是认为用户画像数据维度越多越好，画像数据越丰富越好，某些输入的数据还设定了权重甚至建立了模型，搞得用户画像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工程。但是费很大力气进行了画像之后，却发现只剩下用户画像，和业务相差甚远，没有办法直接支持业务运营，投入精力巨大但是回报微小，可以说是得不偿失，无法向领导交代。事实上，用户画像涉及数据的维度需要业务场景结合，既要简单干练又要和业务强相关，既要筛选便捷又要方便进一步操作。用户画像需坚持三个原则，分别是信用信息和人口属性为主，强相关信息为主，定性数据为主。下面就分别展开解释和说明。

1. 信用信息和人口属性为主

描述一个用户信息很多，信用信息是用户画像中的重要信息，信用信息是描述一个人在社会中的消费能力信息。任何企业进行用户画像的目标是寻找目标客户，其必须是具有潜在的消费能力的用户。信用信息可以直接证明客户的消费能力，是用户画像中最重要和基础的信息。一句戏言，“所有的信息都是信用信息”就是这个道理，其包含消费者工作、收入学历、财产等信息。

定位完目标客户，金融企业需要触达客户，人口属性信息就是起到触达客户的作用，人口属性信息包括姓名、性别、电话号码、邮件地址，家庭住址等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帮助金融企业联系客户，将产品和服务推销给客户。

2. 采用强相关信息，忽略弱相关信息

强相关信息就是同场景需求直接相关的信息，其可以是因果信息，也可以是相关程度很高的信息。

如果定义采用 0 到 1 作为相关系数取值的范围变化，0.6 以上的是强相关信息。例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35 岁左右的人平均工资高于平均年龄为 30 岁的人，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学生的平均工资高于哲学专业的学生，从事金融工作的平均工资高于从事纺织业的平均工资，上海市的平均工资高于海南省平均工资。从这些可以看出人的年龄、学历、职业、地点对收入的影响较大，同收入高低是强相关关系。简单地讲，对信用信息影响较大的信息就是强相关信息，反之，则是弱相关信息。

用户的其他信息，例如用户的身高、体重、姓名、星座等信息，很难从概率上分析出其对消费能力的影响，这些弱相关信息就不应该放到用户画像上分析，对用户的信用消费能力影响很小，不具有较大的商业价值。

用户画像和用户分析时，需要考虑相关强相关信息，不需要考虑弱相关信息，这是用户画像的一个原则。

3. 将定量的信息归类为定性信息

用户画像的目的是为顾客筛选出目标客户，定量的信息不利于对客户进行筛选，需要将定量信息转化为定性信息，通过信息类别来筛选人群。例如，可以通过年龄段对客户进行划分，18周岁至40周岁（不包括40周岁）为青年，40周岁至65周岁（不包括65周岁）为中年人，65周岁以上为老年人；可以参考个人收入信息，将人群定义为高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低收入人群；参考资产信息也可以将客户定义为高、中、低级别。定性信息的类别和方式方法，金融可以从自身业务出发，没有固定的模式。

将金融企业各类定量信息，集中在一起，对定性信息进行分类，并进行定性化，有利于对用户进行筛选，快速定位目标客户，是用户画像的另外一个原则。

三、金融消费者用户画像的构建和应用

要进行用户画像的构建，首先需要了解标签，标签是对用户的社会属性、生活习惯、消费行为等进行进一步的抽象，通过简单的规则算法或大数据技术对用户行为习惯的分析提取，以及对用户简单直接的特征描述即用户标签，标签的目的使我们简单、直观的了解用户的某些特征。

通过之前的说明我们可以了解到用户画像其实就是对一个人的特征（标签）进行提炼，即对一个人打标签的过程。标签也分不同类别，宽泛的说标签主要分为基础属性标签（性别、年龄、体型、婚姻状况、所在地区、工作状况等）和行为标签（爱好、常用购物网站、关注商品类别、常出现的地点等）两大类。

用户画像其实就是提炼标签规则的过程，以基础标签为例，对一个人年龄阶段的划分：从出生到满1周岁（不包括1周岁）为婴儿；从1（包括1周岁）至6周岁（不包括6周岁）为幼儿；6周岁至12周岁（不包括12周岁）为儿童；12周岁至18周岁（不包括18周岁）为少年；18周岁至40周岁（不包括40周岁）为青年；40周岁至65周岁（不包括65周岁）为中年人；65周岁以上为老年人。这是通过人的出生日期经过年龄计算然后再根据年龄阶段规则匹配而生成的标签，规则相对简单，有许多标签规则更为复杂，规则标准没有很明确的标准，需要经过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对用户的行为习惯进一步分析才能得出，如“白富美”“高富帅”等，这种没有很明确的标准，需要根据人的收入或财富、体型、长相等标准综合评判后才能获得综上所述，给用户打标签的过程就是对用户的行为习惯或者特定的属性进行提取和分析的过程，当一个用户被打的标签足够多的时候就产生了用户画像。

目前有很多已经被大家认可的具体的用户画像构建方法，如 Alen Cooper 的“七部人物角色法”、 Lene Nielsen 的“十步人物角色法”等。事实上，当仔细

了解了这些方法之后，就会发现这些方法从流程上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步骤：获取和研究用户相关信息、细分用户群、给用户打标签并建立用户画像。当然，不同行业构建用户画像时因为关注点不同，所提取的标签也不同，最终构建出来的用户画像也不尽相同。

来源：数字经济与管理周刊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kUICpKYxUMrZH0wx4vwwbQ>

吴晓灵：落实新修《证券法》 完善财富管理法律框架

全国人大原常委、财经委原副主任、中国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CWM50）学术总顾问吴晓灵就新修《证券法》撰文，文章指出，新修《证券法》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肯定了资产支持证券和资产管理产品的证券性质，应在《证券法》的授权下尽快完善财富管理市场法律框架，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提高金融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文章建议：制定《信托公司条例》，明确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在资产管理产品是证券的基础上完善《资管新规》；修改《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九十四条，允许非公开募集基金投资未上的公司股权，规范私募股权基金的运行和管理。以下为全文：

2019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15 次会议通过了《证券法》的修改。新修《证券法》扩展了证券的范围，明确了证券公开发行注册制的方向，在规范证券公开发行与交易、加大证券违法活动打击力度、保护投资者利益和完善监管手段等方面做出了重要修改。新修《证券法》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体现《证券法》适用范围的第二条规定“资产支持证券和资产管理产品发行、交易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规定”。这个授权肯定了资产支持证券和资产管理产品的证券性质。我们应在《证券法》的授权下尽快完善财富管理市场法律框架，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提高金融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财富的积累催生了财富管理的需求，让人民获得更多的财富增值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是金融行业的重要职责。财富管理包括对客户物质财富（实物资产、货币资产、金融资产）与非实物财富（知识产权、商誉）配置的规划和运作。财富配置的规划即投资顾问、投资咨询、财务顾问，财富规划的实施是资产管理。对实物资产的受托管理是经典的信托公司业务，对货币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受托管理是资金信托业务。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业务通常是指资金管理业务。《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简称《资管新规》）中对资产管理业务的定义“是指银行、信托、证券、基金、期货、保险资产管理机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接受投资

者委托，对受托的投资者资产进行投资和管理的金融服务”。这个定义不排除实物委托，但《资管新规》规定“资产管理产品按照募集方式的不同，分为公募产品和私募产品”，因而这里主要规范的是资金管理业务。

目前我国规范财富管理的法律有三类：一是新修的《证券法》，它将资产管理产品归入了证券，对资产管理产品发行、交易的规则授权国务院制定；二是《证券投资基金法》，它规范了“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的行为；三是《信托法》，它规范了信托关系，“受托人采取信托机构形式从事信托活动，其组织和管理由国务院制定具体办法”。我们应该在三部法律的框架下完善金融业财富管理的法律法规，规范财富管理行为和监管。

一、制定《信托公司条例》，明确信托财产的独立性

中国信托业受日本的影响很大。日本上个世纪中期在存款利率管制和长期建设资金缺乏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贷款信托业务。1952年6月公布实施的《贷款信托法》规定贷款信托为：“根据一个信托条款，把受托人与多数委托人签署的信托合同为依据受托的资金，主要运用于贷款或者期票（日语，手形割引）的综合金钱信托。信托相关受益权利，需要在受益证券券面上明示”。日本贷款信托，在鼎盛时期（1993年末），余额高达50万亿7千多亿日元。此后，随着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的结束、资金需求的下降以及利率的市场化，信托贷款逐渐减少，2009年以后停止新办业务。

我国1980年代引进信托业务时也面临金融业高度管制、银行信贷实行严格计划管理、社会计划外经济活动无法融资和长期资金短缺的问题。于是信托公司成为突破管制、为计划外投资活动融资的重要渠道，并因此而遭遇五次全行业整顿。直到2001年全国人大制定《信托法》和2002年人民银行公布《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后，中国信托业才回归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信托本业。但由于《信托法》对财产登记规定的缺失，信托公司难以开展实物财产信托，基本只做私募资金信托。在路径依赖的惯性推动和社会融资需求的诱导下，当前信托公司做了许多融资业务和通道业务。在全民财富积累和财富传承需求增长的背景下，在资产管理市场逐渐统一规范的形势中，信托公司必须回归事务信托（公益信托、家族信托）和实物信托（财产权信托）的传统业务，才能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竞争力。因而修改《信托法》明确信托财产登记的法律效力是非常重要的。鉴于《信托法》涉及面较大，修改时间长，可先制定《信托公司条例》（已有立法计划）在条例中明确信托财产登记的效力，对抗善意第三方，为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提供法律依据，为开展传统信托业务创造制度环境。

二、在资产管理产品是证券的基础上完善《资管新规》

《资管新规》自2017年征求意见和2018年实施以来，资产管理市场的秩

序逐步好转，金融界对资管产品的认识也逐渐趋于一致，即资产管理产品必须回归代客理财的本源，做到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尽管老产品存量的整改和消化还有一些操作中的问题，一些产品的底层资产还有对过渡期限延长的需求，但统一规范资产管理市场的方向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在资管产品被纳入《证券法》后，我们有条件进一步完善《资管新规》，明确一些未明确的问题。

一是明确募集资金时，投资人在两人以上的资产管理产品是基金，并按《证券法》标准分为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二是明确资产管理产品的管理人，无论其投资人是哪类金融机构，均不改变其资产管理机构的本质，都应执行统一的管理人的规定。发行公募产品按公募基金管理办法获得牌照，发行私募基金产品按《证券投资基金法》进行管理人登记、产品备案；三是在修改《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九十四条后明确《资管新规》适用于各类公募、私募基金；四是促进目前银、证、保、信、基分别建立的私募资产管理产品登记、备案系统互联互通，逐步实现统一登记、备案，破除私募产品市场的分割，促进私募资管产品的交易和流通；五是明确《资管新规》出台后，银行、保险、证券、基金、期货等机构的配套规定是过渡规定，在公募、私募产品均能纳入《证券投资基金法》调整后，监管机构可在吸取不同管理规则优点的基础上出台统一的实施细则；六是明确对金融机构在从事财富规划和资产管理时的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与人员素质的要求；七是按收费方式规范财富规划和产品销售的行为及法律义务，收入来自买方的行为是财富规划，收入来自卖方的行为是销售行为、经纪行为。另外还可根据《资管新规》执行两年来的情况对一些规定加以完善。

三、修改《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九十四条，允许非公开募集基金投资未上市的公司股权，规范私募股权基金的运行和管理。

2013年《证券投资基金法》重要的修改是增加了“非公开募集基金”一章，给予了私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以法律地位。私募基金管理人是金融中介机构，只是豁免核准，实行登记制度（第八十九条），并规定符合条件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经核准可以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第九十六条）。

当时规范非公开募集基金时，本想将主要投资于已上市证券的私募证券基金与主要投资于未上市的股权的私募股权基金一并包括，但当时对股权投资基金的认识未达成共识，主要是对公司股权是否是证券有争议，而未实现。未上市的股份公司的股票是证券似无异议，而股权基金特别是创投基金经常投资的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是否是证券，认识不同。我们认为证券从中文解析是一种证明，是财产权益的证明，如果财产能分割、能无因转让就具备了证券的性质，应该纳入《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调整。有限责任公司的份额经持有人同意是可转让的，具备了证券的性质，但当时未达成共识。因而在第九十四条规定“非公开募集基金财产的证券投资，包

括买卖公开发行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债券、基金份额，以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证券及其衍生品种”。条款中限定为公开发行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于是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排除在《证券投资基金法》以外。为保证基金市场的统一管理，2013 年通过中编办批准部委三定方案的形式将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职能从发改委划归证监会，发改委保留了对创业投资企业扶植政策的制定职能。

《证券投资基金法》2013 年生效和私募证券基金获得法律地位后迎来了基金业的大发展和大资管市场的形成。私募股权基金也得到了发展，其对经济创新和企业资本募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法律上给予其应有的地位迫在眉睫。自 2014 年以来国务院也在制定《私募基金的管理条例》但至今未能出台。在稳定宏观经济杠杆和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的背景下，发展和完善股权融资具有重大意义。当前社会对私募股权基金的作用高度认可，明确公司股权的证券性质，给股权投资基金以法律地位已有了较好的社会基础。美国资本市场的高度发展得益于其《1933 年证券法》和《1934 年证券交易法》的法制基础。美国证券法在列举了几十种证券类型后，又在司法判例中对列举的投资合同采用了是否是证券的四要素检验：1、利用钱财进行投资；2、投资于一个共同企业；3、仅仅由于发起人或第三方的努力；4、期望使自己获得利润。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就是符合证券特征的投资合同。我们应该在《证券投资基金法》中予以承认。修改《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九十四条对非公开募集基金投资仅限于公开发行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限制，将公司股权投资纳入其中，使《证券投资基金法》适用于私募股权基金，能以最小立法成本打开股权融资的渠道。

像 2015 年用修法特别程序修改《商业银行法》一个条款一样，只修改《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一个条款，可以以最小的立法成本解决市场的痛点问题：

一是修改后“非公开募集基金财产的证券投资，包括买卖公司股权、债券、基金份额……”，这样私募股权基金也顺理成章地包含在《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调整范围中。二是可以解决不同组织形式基金的规范问题。《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公开或非公开募集资金，以进行证券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者普通合伙人管理的，其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根据此条，契约型、公司型和合伙型基金只是基金内部治理机制的不同，其投资行为适用本法。基金是投资管道，因而基金不是纳税主体，其税收由投资人承担，由管理人代扣代缴。这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无论其组织形式是公司还是合伙企业，他们的税收问题也可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八条一并解决，即基金层面不是纳税主体，基金收益分配后由基金管理人代

扣代缴应纳税。

建设法治国家，离不开法律法规的完善。金融业应完善法律法规尽快补上制度短板，以提高金融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提高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在金融科技迅速发展和国际金融竞争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理顺法律关系，完善法制环境更为紧迫！

来源：凤凰网

<http://finance.ifeng.com/c/7sltIm87rrE>

阎庆民：推动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在 2019 中国私募基金行业峰会上指出，资本形成能力是资本市场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私募基金行业规模快速增长，为创新资本形成提供了蓬勃动力，将推动养老金等长期资金投资私募基金。

很高兴在重庆召开中国私募基金全行业的高峰论坛。首先，我谨代表中国证监会，对参会的私募基金行业代表表示诚挚的问候，对重庆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对资本市场的支持、对重庆证监局的关心表示衷心的感谢！对本次峰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新的一年经济工作进行全面安排。会议强调：要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健全退出机制，稳步推进创业板和新三板改革。对私募基金行业而言，就是要适应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提升专业性、竞争力。借此机会，我想谈两点意见。

一、私募基金行业发展取得阶段性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资本形成能力是资本市场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内容。自 2014 年纳入统一监管以来，私募基金行业规模快速增长，质量不断提高，为创新资本形成提供了蓬勃动力。

一是规模增大。从行业规模看，股权投资的力量在显著增强。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规模从 2015 年底的 1.9 万亿元增加到 2018 年底的 8.7 万亿元，在行业整体规模中占比由 46.7% 提升到 68.6%。私募基金规模与名义 GDP 之比从 2015 年末的 6.1% 提高到 2018 年末的 14.1%；其中，股权投资基金规模与名义 GDP 之比从 2.9% 提高到 9.7%。

二是来源趋稳。从资金来源结构看，长期资金稳步增长。私募基金来自养老金、政府部门资金虽然绝对数量不大，但 2018 年以来持续快速增长。2019 年前三季度，养老金、政府部门资金季度平均规模同比增长 47.9% 和 31.8%，来自银行的资金季度平均规模同比下降 17.0%。长期属性资金占比增长，短期理财型资金占比下降，资金来源结构发生变化。

三是投向合理。2019 年前三季度，私募证券基金持有股票、债券资产规模显著上升，季度平均规模同比增长 34.3%；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向股权类资产季度平均规模同比增长 19.0%，股权资产占基金净资产的比例超过 50%，债权、收益权资产占比有所下降。整体而言，权益类基金占比上升，私募基金主业特征更加凸显。

四是治理稳定。从公司治理看，管理人运营稳定性有所提升。截至 2019 年三季度末，70%的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近三年未发生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变更，65%的注册基金经理已填报可追溯的投资记录；2018 年底前登记的私募管理人中 91%提交了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五是作用凸显。从支持创新资本形成看，私募基金作用逐步显现。2019 年前三季度，私募基金投向境内未上市未挂牌企业股权本金新增 4429 亿元，相当于同期新增社会融资规模的 2.4%。截至 2019 年三季度末，私募基金在投中小企业 6.0 万家，在投本金 2.0 万亿元；在投高新技术企业 3.1 万家，在投本金 1.3 万亿元。互联网服务等计算机运用、机械制造等资本品、计算机及电子设备、原材料、半导体、医药生物、医疗器械与服务等产业升级及新经济代表领域成为私募股权与创业投资基金布局重点，在投项目 5.5 万个，在投本金 2.7 万亿元。截至 12 月 10 日，63 家科创板上市企业中，有私募基金参与投资的 54 家，投资本金合计 268 亿元。

在看到取得阶段性成就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主要表现为两极分化严重，公司治理整体水平不高，不同程度地存在“量小”“质低”“投短”“募难”问题，以中小型机构表现尤为突出。此外，“伪私募”风险也逐步显现。

“量小”主要表现为基金管理人平均管理规模小。2018 年末，我国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平均管理规模分别为 2.4 亿元、5.9 亿元；同类型美国基金管理人平均管理规模分别是我们的 128 倍和 28 倍。前 10% 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合计管理超过 80% 的基金资产，有 37% 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规模在 1000 万元以下。

“质低”主要表现为内控质量低、规范化水平低。少数管理人一定程度存在合规意识淡薄、内部治理不健全、专业化水平不高、盈利能力不强等现象，行业整体质量有待提升。近三年来，证监会以问题导向、风险导向，结合随机抽查原则，对 1200 余家私募基金管理人进行了现场检查，其中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和被处罚的管理人占比 36%。

“投短”主要表现为平均投资期限短。截至 2019 年三季度末，股权投资基金已退出项目中，投资期限在 4 年以下的项目数量占比 74.6%，退出本金占比 81.5%，7 年以上项目占比很少。

“募难”主要表现为基金募集难度提高。从2019年来看，虽然私募证券基金产品备案数量“一少增”，但证券与股权创投基金产品的备案规模却出现明显的“双下降”。2019年1-11月，私募证券基金产品备案数量同比增加14%，但备案规模同比减少36%；股权创投基金产品备案数量同比减少44%，备案规模同比减少41%，大部分私募基金面临募资压力。

特别需要关注到的是“伪私募”风险逐渐显现。各类“伪私募”花样翻新，有的变相开展借贷业务，名基实债；有的通过多只产品关联操作，变相自融或利益输送。更有甚者，打着私募基金旗号，行非法集资和诈骗之实。

这些问题有的与机构内部治理水平和专业能力有关，有的与外部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有关，必须找准问题根源，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原则，把握行业发展规律，结合行业实际，稳妥有序做好对私募领域的风险化解工作。

二、推动私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目前私募基金在服务实体经济、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开始形成共识；加强私募基金监管、强化风险防控开始形成共识；构建私募基金综合监管体系和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开始形成共识。

在这“三个共识”基础上，中国证监会从人民性立场出发，坚持法治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不断深化行政监管改革，优化市场运行机制，推动公平竞争及市场化出清与重组，充分释放市场活力。“三个共识”从共识到落实、落地、见效，需要各方遵循行业发展规律，持续做到“三个努力”，推动私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努力提升行业机构治理水平，提升专业能力。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创新发展攻坚克难时期，扩大对外开放、以开放促发展既是基本国策，也是战略方向。在开放市场条件下，符合开放竞争规则、专业能力强、治理有效的机构将在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热衷寻租套利的机构势必被市场淘汰。因此，行业机构要紧紧围绕质量、效率、动力变革，全面提升治理水平，提升专业能力，应对国内国际双重挑战。

从国外成熟市场看，国际领先机构非常重视治理。发展战略清晰、管理架构合理、风险控制有效是其共同特征，也是发展专业能力的基础。这些机构或者按资产类别、区域搭建专业团队，深耕细分领域上的专业性，或者按募资、投资和投后管理阶段搭建专业团队，追求细分功能上的专业性。目前，国内不少头部私募机构已经展示出与国际领先机构类似的专业治理能力。

需要强调的是，私募机构加强治理，必须坚持守法合规经营，全面履行忠实审慎义务。守法合规是一切经营活动的底线，行业机构和从业人员要敬畏法治，将守法合规意识融入血液、装进心头，绝不触碰法律红线和监管底线。要

逐步完善内部治理机制，从每个岗位、每项业务抓起，铲除利益冲突的土壤，坚决反对欺诈、利益输送、内幕交易等一切不当行为，秉持价值投资理念，建立科学运营流程，提升投资管理专业性，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二是努力提升私募基金依法监管效能。中国证监会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坚持“四个敬畏、一个合力”，不断完善私募基金监管体制机制，规范私募基金行业发展。下一步重点做好6个方面监管工作：健全私募基金法律法规体系，积极推动《私募条例》出台，细化规范性要求；落实合格投资者制度，加强投资者教育和保护；加强监管执法，严厉查处私募基金违法违规行为，打击非法集资等犯罪活动；指导和监督基金业协会工作，优化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和产品备案，提高透明度；引导发挥托管机构、审计机构等中介机构作用，完善监督机制；真正落实扶优限劣，支持信用良好的机构规范发展。

基金业协会要依据《基金法》职责和证监会党委决策部署，不断提升服务效率，做好自律服务工作。着力做好私募基金入口端和出口端管理，完善差异化登记备案机制，管理人登记扶优限劣，产品备案试行“分道制+抽查制”，做到标准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提高工作透明度，加大信息公示力度，稳定市场预期；强化展业过程自律，构建以历史信用和业绩为基础的行为管理体系，完善信义义务行为规范和信用激励约束机制；加强行业风险监测，响应行业合理诉求，寓自律于服务，以自律促发展。

三是努力推进私募基金行业生态建设。要推动全社会更加理性客观认识私募基金的本质、作用与风险，塑造良好的外部生态，增强发展环境包容性。推动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增强养老金积累能力；推动养老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投资私募基金，推动私募基金管理人主动开发与养老金投资管理相适应的产品和策略，优化资金来源结构。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鼓励私募基金融入资本市场定价、交易机制，推动创业投资、并购投资专业化发展；推动完善养老金和基金行业税制，激励养老金积累和长期投资行为，约束短期投机，优化投资行为。优化创投反向挂钩政策，加大扶持政策力度，畅通退出通道。加强“卖者尽责、买者自负”文化建设，多渠道多层次开展私募基金投资者教育，强化风险警示，倡导理性投资，培育成熟理性投资者。

来源：腾讯网

<https://new.qq.com/omn/FIN20191/FIN2019122502110600.html>

★财富管理报告

后疫情时代：中国城市消费力图谱

5月2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与新华网联合推出的投资者教育公益节目《国民财富大讲堂》第十六期播出。香帅数字经济工作室创始人唐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以及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围绕报告《后疫情时代：中国城市消费力图谱》进行了精彩分析。

报告《后疫情时代：中国城市消费力图谱》由CWM50特邀研究员、香帅数字经济工作室创始人唐涯牵头，基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对疫情下的中国城市消费冲击总量、分布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同时，通过对消费的研究分析了未来城市化的特点和方向。

距离新冠疫情的整体爆发已经80多天，经过政府和全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努力，疫情在中国全境内已经实现超预期的控制，湖北和武汉解除封闭，各省市在严格防控境外输入病例的同时，工作和生活正逐步在恢复常态。

但是由于这次百年不遇疫情的特殊性，中国第一季度的经济生活遭到了极大的损害。投资方面的损失比较容易估算和通过政策来进行刺激弥补，消费方面的实际损失则更复杂，更难合算。

从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逐步向消费驱动，服务业驱动的方向转型。2019年，消费在中国GDP中支出法构成的占比已经高达55%，其中服务业的比重达到54%，超过制造业成为支柱产业。更重要的是，消费涉及的数百个行业，例如：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和文化娱乐，都是劳动力高度密集型的行业，容纳了数以千万计的小微商户，以及数亿中低收入人口的就业。

本研究基于蚂蚁金服提供的移动支付大数据，详细考察和分析了春节后45天消费冲击的总量，在不同行业上和不同区域，城市的分布，总结了各个城市在外生冲击下的消费韧度，并深入讨论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消费冲击的大小。

这个研究的意义在于，目前移动支付已经成为中国人最主要的支付方式，在个人消费金额中的占比达到64%。互联网上实时记录的移动支付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活动的活跃度，而且可以覆盖到“社会零售品销售总额”和“最终消费支出”等传统指标的盲区，是宏观经济分析的有益补充。

一、疫情的总体冲击：支付额度下滑达到10万亿级别，就业严重承压

受益于移动支付在我国居民生活中的高渗透率，并且对线下个体工商户、居民全方位日常消费行为等传统指标统计盲区的覆盖，我们发现疫情对居民造成的消费冲击强度，高于传统统计指标反映的情况。基于2019年和2020年春节前后的数据，我们匡算发现从2020年大年初一开始，我国移动支付金额发生了剧烈

下滑。从春节前超过 20% 的增长，到年后很长时间内超过 30% 的下跌，疫情使得本年度节后理论消费量几乎“腰斩”。直到年后的第 45 天，我国居民移动支付金额才渐渐赶上去年同期的数值（仍远低于其平均增速 20%）。



图 1 春节前后移动支付情况

我们根据蚂蚁金服提供的移动支付数据推算，即使是基于乐观和保守的假设（3 月以后消费基本全部恢复，非移动支付下滑幅度不超过线上），一季度消费下滑最少造成 3% 的 GDP 损失。其中，居民线下消费支付额度下降超过 40%，线下商户遭遇了非常严重的冲击；我国居民可选消费商品及服务的冲击幅度更大，同比降幅达到 40%-60%。

要注意，这里估算的假设是 4 月份以后基本全面恢复，以及没有任何其他外生冲击的情况。现实情况会比较复杂：

1. 由于输入型病例的压力，4 月份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仍然处于高度防疫状态，线下消费恢复几乎不可能。
2. 线上消费的恢复较快。截止 3 月 9 号移动支付的金额已经达到去年同期的水平，这意味着，后期部分消费可能从线下转入线上，弥补一部分消费的损失。
3. 考虑到国内线下消费难以完全恢复，城市服务业人遭受重创，同时全球疫情大流行，需求雪崩导致中国制造业也面临停工潮，大量劳动人口会面临失业，收入下降的效应会使得消费的恢复更加缓慢和不可预期。

整体上而言，迄今为止疫情造成的消费冲击以及后续的消费恢复情况，都不容乐观，政策强度和企业预案需要对此留出足够空间。

二、疫情的结构冲击：可选消费及服务严重冲击且恢复缓慢

春节后的一个多月，大多数线下经济活动按下了“暂停键”。各个行业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我们基于两个标准对行业进行分类：一是按照消费品的属性分成商品和服务，二是按照消费品的弹性分成可选、中间和必需消费。整体而言，不同行业的消费冲击和行业消费弹性高度相关，排序如下：“可选商品”>“可选服务”>“中间商品”>“必需服务”>“必需商品”。



图 2 2019、2020 年春节前后，分行业的移动支付额同比变化 (%)

具体而言，可选商品类行业（以汽车、家电为代表），和可选服务类行业（以航旅、文娱、保健为代表），受到的冲击最大，节后相比节前的同比下滑超过 60%。化妆品、服装、通讯器材等中间弹性的商品，也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下滑幅度超过 40%。必须消费的下滑幅度相对较小，必须商品（粮油、食品、饮料、日用品）下滑约 20%，必须服务（餐饮、教育、生活服务）下滑约 35%。

分区域来看，从南到北，可选消费的下滑幅度逐渐增大，而且相对于必需消费也有更大幅度的下滑。在此次疫情中，平时奢侈消费和非必需消费更多的北方地区，受到的冲击要明显超过更加踏实务实的南方地区。另外，大城市的可选消费受到的冲击程度也明显高过小城市，随城市级别呈单调下滑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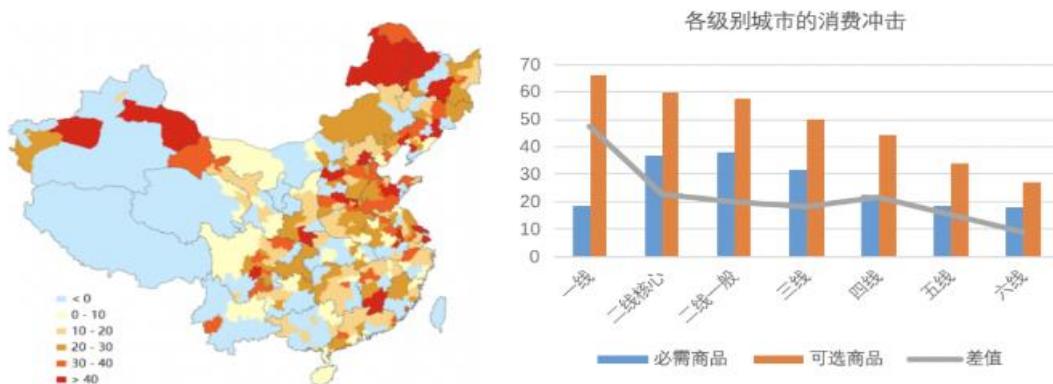


图 3 各个城市的可选和必需消费冲击差值

三、疫情对各地区的消费冲击存在较强的地区性差异

新冠疫情对全国各地区消费都产生了广泛冲击，但仍有较强的地区性差异。首先，疫情对湖北省消费的冲击最大，湖北省各城市总消费支付金额下降 40% 以上，线下消费支付金额下降 50% 以上。其次，除湖北省之外，长三角地区、中部地区（安徽、河南等地）的总消费下降幅度最大，超过 20%，而且线下小微商户受到的影响更高。尤其是上述地区的省会城市受到的消费冲击更严重，例如杭州、南京、合肥，总消费同比下降幅度在 35%-40% 左右，线下消费同比下降 40% 以上。华北（北京、天津、河北）以及苏北鲁南地区的总消费下降幅度也较高，在 10%-20% 左右。而华南地区（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南部）受到的消费冲击普遍较

小，总消费支付额同比下降不超过 10%。

为了直观表示全国各地区消费下降幅度的差异，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按春节后 24 天（1.24-2.17）总消费下降幅度的大小，将全国城市（互联网普及度较低的偏远六线城市除外）分为 4 档，如图 3.1 所示：

- 消费冲击最低组：总消费支付额未降反升的城市，红色区域；
- 次低组：总消费支付额降幅低于 10%，黄色区域；
- 次高组：总消费支付额降幅高于 10%、低于 20%，绿色区域；
- 最高组：总消费支付额降幅高于 20%，蓝色区域。



图 3.1 全国春节后 24 天（1.24-2.17）消费支付金额同比下降幅度（%）

注：消费支付金额同比下降幅度=（去年同期可比金额-今年春节后支付金额）/去年同期可比金额

（未完）

来源及全文链接：中国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Q4dnLoXYEXvvNN24alhVA>

2019 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于 2019 年 10 月中下旬在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 3 万余户城镇居民家庭开展了资产负债情况调查。从当前掌握的资料看，这是国内关于城镇居民资产负债情况最为完整、详实的调查之一。调查显示：第一，城镇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 317.9 万元，资产分布分化明显；家庭资产以实物资产为主，住房占比近七成，住房拥有率达到 96.0%；金融资产占比较低，仅为 20.4%，居民家庭更偏好无风险金融资

产。第二，城镇居民家庭负债参与率高，为 56.5%，负债集中化现象明显，负债最高 20%家庭承担总样本家庭债务的 61.4%；家庭负债结构相对单一，负债来源以银行贷款为主，房贷是家庭负债的主要构成，占家庭总负债的 75.9%。第三，城镇居民家庭净资产均值为 289.0 万元，分化程度高于资产的分化程度。与美国相比，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财富分布相对均衡（美国净资产最高 1%家庭的净资产占全部家庭净资产的比重为 38.6%，我国为 17.1%）。第四，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为 9.1%，总体稳健，少数家庭资不抵债；居民家庭债务收入比为 1.02，略高于美国居民水平（0.93）；偿债能力总体较强，偿债收入比为 18.4%，居民家庭债务风险总体可控。第五，需关注两方面问题。一是居民家庭金融资产负债率较高，存在一定流动性风险。二是部分家庭债务风险相对较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部分低资产家庭资不抵债，违约风险高；中青年群体负债压力大，债务风险较高；老年群体投资银行理财、资管、信托等金融产品较多，风险较大；刚需型房贷家庭的债务风险突出。

一、城镇居民家庭资产分化明显，金融资产占比低，房产占比超七成

1. 镇居民家庭资产分化明显

调查数据显示，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均值为 317.9 万元，中位数为 163.0 万元。均值与中位数之间相差 154.9 万元，表明居民家庭资产分布不均。居民家庭资产分布不均衡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居民家庭资产的集中度较高，财富更多地集中在少数家庭。将家庭总资产由低到高分为六组，最低 20%家庭所拥有的资产仅占全部样本家庭资产的 2.6%，而总资产最高 20%家庭的总资产占比为 63.0%，其中最高 10%家庭的总资产占比为 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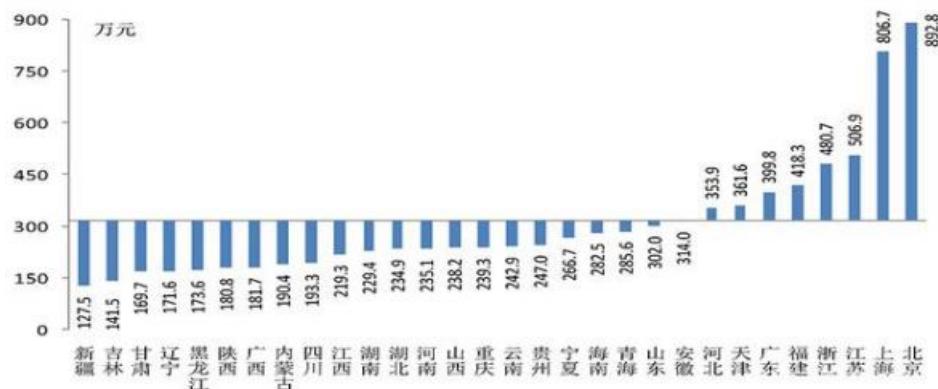
表 1 居民家庭总资产分布情况

按总资产 由低到高 分组	均值 (万元)	占全部家庭 总资产比重 (%)
0~20%	41.4	2.6
20%~40%	99.3	6.2
40%~60%	164.4	10.3
60%~80%	282.4	17.8
80%~90%	493.3	15.5
90%~100%	1511.5	47.5

第二，区域间的家庭资产分布差异显著，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家庭资产水平高。分经济区域看，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东部地区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为 461.0 万元，分别高出中部、西部、东北地区 197.5 万元、253.4 万元和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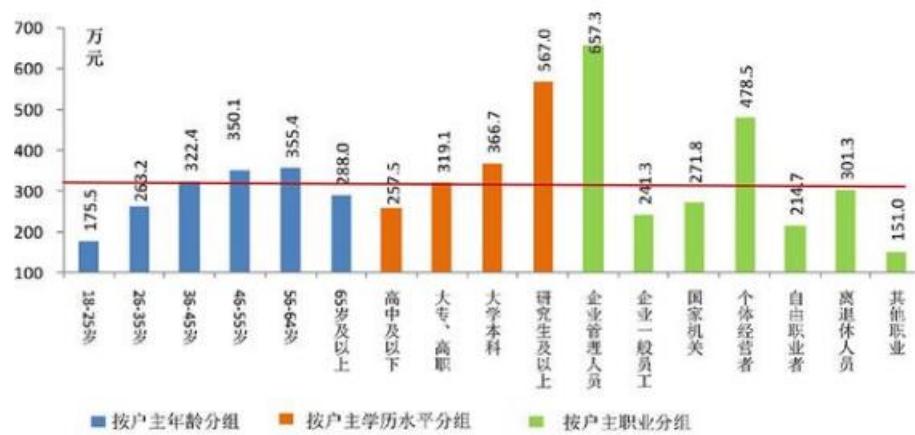
万元。东北地区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最低，仅占东部地区居民家庭的三分之一左右。

分省份看，家庭资产最高的三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北京、上海和江苏，最低的三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新疆、吉林和甘肃。其中，北京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约为新疆居民家庭的7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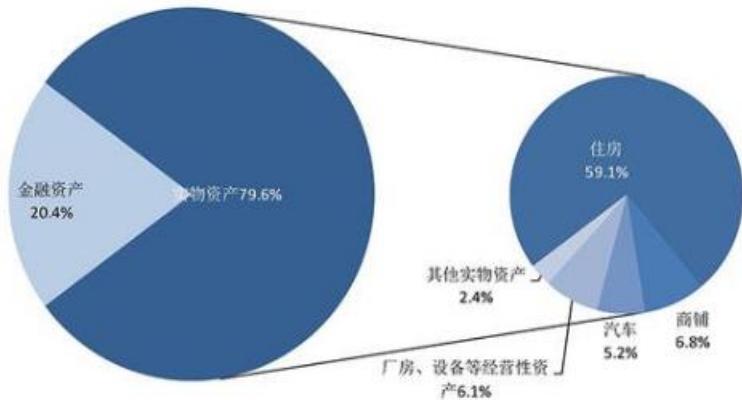
第三，高收入家庭拥有更多资产。将家庭总收入从低到高排序，总收入最高20%家庭所拥有的总资产占全部样本家庭总资产的半数以上。其中，收入最高10%家庭户均总资产1204.8万元，是收入最低20%家庭户均总资产的13.7倍。

第四，户主的年龄、学历水平及职业均影响家庭资产分布。一是家庭总资产随户主年龄的提高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特征。户主年龄为56~64岁的家庭户均总资产最高，18~25岁的户均总资产最低。二是户主的学历水平越高，家庭户均总资产越多。户主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家庭户均总资产明显高于均值，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家庭户均总资产最低。三是户主为企业管理人员和个体经营者的家庭总资产明显高于均值，其余家庭总资产均低于平均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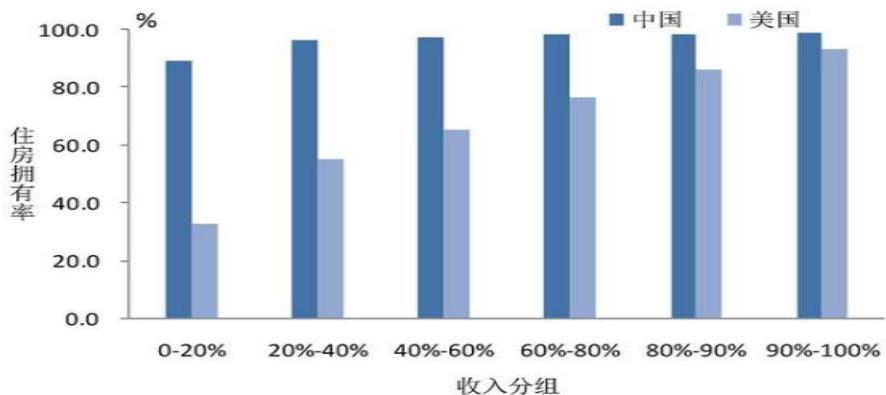


2. 家庭资产以实物资产为主，房产是其主要构成

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以实物资产为主，户均253.0万元，占家庭总资产的八成。



第一，住房是家庭实物资产的重要构成，居民家庭住房拥有率相对均衡。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实物资产中，74.2%为住房资产，户均住房资产187.8万元。居民住房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为59.1%。和美国相比，我国居民家庭住房资产比重偏高，高于美国居民家庭28.5个百分点。



居民的住房拥有情况相对均衡。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为96.0%，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占比为58.4%，有两套住房的占比为31.0%，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占比为10.5%，户均拥有住房1.5套。美国住户总体的住房拥有率为63.7%，低于我国32.3个百分点。按家庭收入从低到高排序，美国收入最低20%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仅为32.9%，而我国收入最低20%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也为89.1%。

城镇居民家庭拥有的住房数量越多，其家庭资产中住房资产的占比反而越低。拥有一套住房的家庭的总资产中住房资产的占比为64.3%，有两套住房家庭的住房资产占比为62.7%，有三套及以上住房家庭的住房资产占比为51.0%。这主要是因为多房产家庭在解决了基本住房需求后，更倾向于多元化资产配置。

第二，商铺及厂房等经营性资产是家庭资产差距大的重要原因。受调查家庭中，15.9%的家庭拥有商铺或厂房等经营性资产，这些家庭的经营性资产均值为257.5万元，占其家庭总资产的33.1%。拥有经营性资产家庭的户均总资产为776.8万元，是没有经营性资产家庭的3.4倍。

家庭总资产越多，经营性资产的拥有率越高，经营性资产在家庭资产中的比重越大。按家庭总资产排序，资产最高10%的家庭中，近半数的家庭拥有经营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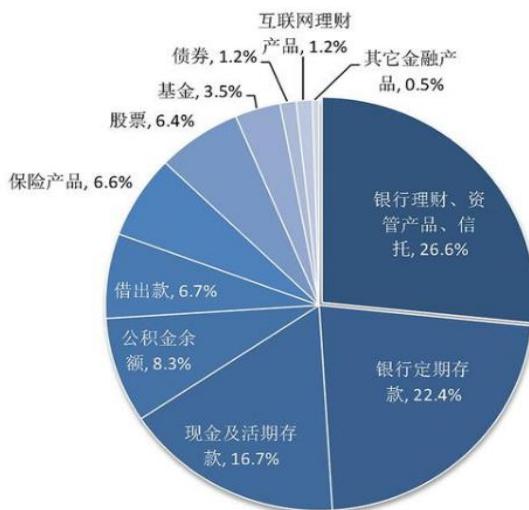
资产，这些家庭的经营性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 35.6%；而资产最低 20%家庭中仅有 3.5%的家庭拥有经营性资产，其经营性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为 22.4%。

3. 金融资产分化明显，居民家庭更偏好无风险金融资产

受调查家庭中，有 99.7%的家庭拥有金融资产，户均金融资产 64.9 万元，占家庭总资产的 20.4%。与美国相比，我国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偏低，比美国低 22.1 的百分点。

表 2 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分布情况

金融资产由低到高分组	占总样本金融资产的比重 (%)	实物资产由低到高分组	占总样本实物资产的比重 (%)
0~20%	1	0~20%	2.3
20%~40%	3.8	20%~40%	6.1
40%~60%	7.7	40%~60%	10.3
60%~80%	15	60%~80%	18.1
80%~90%	14.2	80%~90%	16
90%~100%	58.3	90%~100%	47.1



第一，金融资产的分化程度更明显。将家庭分别按照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从低到高进行排序，金融资产最高 10%家庭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占所有样本家庭的 58.3%，而实物资产最高 10%家庭拥有的资产占比为 47.1%。可见，金融资产的不均衡程度更显著。

第二，居民投资偏稳健，家庭无风险金融资产持有率高。调查显示，无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率高于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率，受调查家庭中无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率为 99.6%，户均 35.2 万元；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率为 59.6%，户均 50.1 万元。从调查样本整体看来，户均持有无风险金融资产 35.0 万元，占总金融资

产的比达到 53.9%，高于风险金融资产。

第三，高资产、高学历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意愿更强，金融资产表现形式更加多元化。随着家庭资产的增加，家庭持有风险金融产品的比率稳步提高。将家庭总资产排序，总资产最高 20%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率为 87.9%，最低 20%家庭的持有率为 29.8%。而且，总资产越多的家庭参与各类金融市场的程度越高，高资产家庭在各类金融产品上的持有率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学历水平看，学历越高的家庭金融资产表现形式越多元化。调查数据显示，随着户主学历水平的提高，家庭持有活期与定期存款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持有银行理财产品、互联网金融及股票、基金等金融资产的比例有所上升。这主要是因为高学历群体通常更了解相关的金融知识和信息，加之其往往拥有较高的收入和资产，因而在满足了预防性需求后更愿意投资高风险、高收益的金融产品。

（未完）

来源及全文链接：新浪财经微信公众号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4830535681198027&wfr=spider&for=pc>

我国股票市场的投资者状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全国股票投资者数量达 15975.24 万，较上年同期增长 9.04%，其中自然人投资者占比 99.76%。日渐庞大的投资者群体反映了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财富管理需求，也对投资者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考验。较为科学地掌握我国投资者状况，是有关各方进一步把握资本市场运行规律，精准开展投资者保护的基础。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投保基金公司”）作为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投资者保护专门机构，一直高度关注并持续观测分析我国股票市场的投资者状况，为立法机构、监管部门、自律组织、市场主体开展投资者保护工作提供依据。

2019 年 12 月 30 日～2020 年 1 月 17 日，投保基金公司组织开展了“2019 年度全国股票市场投资者状况调查”。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 19.8 万份，参与调查者覆盖自然人投资者（197658 份）、一般机构投资者（613 份）、专业机构投资者（188 份），全部为市场活跃投资者，统计分布特点符合总体特征。调查显示，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未呈根本性改变，但个人投资者行为特点继续呈现积极变化，与此同时机构投资者作用凸显，投资者选择更加理性。主要结论如下。

一、自然人投资者知识、经验和行权意识有所提升

1. 自然人投资者证券知识水平有所提升。当问及投资者证券知识水平时，受调查投资者中属于“新手上路”的占 15.3%；“对投资有基本认知”的占 48.6%，

占比最高；“对投资产品较为熟悉”和“对投资较为专业”的占比合计为 36.1%。与上一年度相比，属于“新手上路”的占比降低了 13 个百分点，属于“对投资有基本认知”“对投资产品较为熟悉”和“对投资较为专业”的占比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其中“对投资产品较为熟悉”的占比提升 9.1 个百分点，提升程度最为明显。2019 年，自然人的整体证券知识水平有所提升，但仍有提升空间。

2. 自然人投资者的投资经验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对于金融产品的投资经验，受调查投资者曾购买过的金融产品前三位依次是股票及期货（76.4%）、银行理财产品（66.6%）、公募基金及证券公司或基金公司集合理财计划（44.8%）等。与上一年度相比，曾购买过集合理财计划和公募基金等金融产品的投资者占比增长最快，由 2018 年的 26.7% 提升至 2019 年的 44.8%，增长 18.1 个百分点；其次是股票、期货等，由 66.6% 提升至 76.4%；投资者对其余各类型金融产品的投资经验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与 2018 年相比，在股票投资中盈利的受调查自然人投资者比例由四分之一提升至半数以上，“10%~30%”为主要盈利区间。2019 年，受调查投资者中股票投资盈利的合计占比 55.2%，盈亏持平的占比 17.6%，亏损的合计占比 27.2%。从各盈亏区间的投资者占比来看，“盈利 10%~30%”的投资者最多，占比 23.6%；其次是“盈亏持平”的投资者，占比 17.6%；“盈利 10%以内”的投资者占比次之，为 16.6%。与上一年度相比，盈利的投资者比例由 24.9% 提升至 55.2%。具体来看，盈利 50% 以上的投资者比例由 3.5% 提升至 5%，盈利 30%~50% 的投资者比例由 3.1% 提升至 10%，盈利 10%~30% 的比例由 7.5% 提升至 23.6%，盈利 10% 以内 的比例由 10.8% 提升至 16.6%。

受调查自然人投资者认为自身证券知识储备及对市场的理解是决定其股票投资盈亏的最主要因素。在投资决策的方式上，67.1% 的受调查投资者依靠自己的分析作出投资决策，占比最多；根据朋友推介或跟着朋友投资的占比 16.5%；根据网上投资专家推介和接受投资顾问辅导的两类投资者占比合计不足两成。与上一年度相比，自己分析决定投资策略的比例由 72.9% 降至 67.1%，而倾向于接受投资顾问辅导的投资者比例由 6.4% 提升至 10.1%。

3. 自然人投资者的行权意识有所提升。调查显示，2019 年行使过股东权利的受调查投资者占比 17.5%，与上一年度相比增加了 4.4 个百分点。从投资者行使的主要股东权利类型来看，决策参与权和知情权仍然是行使最多的两项权利，同时受调查投资者行使决策参与权、撤销请求权、建议质询权、求偿权的比例较上一年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在各项投资者保护工作措施中，明确市场规则并强化信息披露仍是受调查自然人投资者重点关注的方面。在列出的 11 项投资者保护工作中，“进一步明确市场规则，强化信息披露”是投资者认为最应明确和强调的方面，与上一年度调

查结果一致。投资者对“增加上市公司分红制度”“进一步强化投资者教育和宣传引导”“修改完善退市制度”“强化证券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加大行政处罚限额”和“加强证券基金行业文化建设”的关注度也较高,均排在前六位。其他投资者保护举措受到的关注度相对较低。

表1 投资者对投资者保护各方面举措的关注情况

投资者保护需着重明确和强调的方面	占比	排序
进一步明确市场规则,强化信息披露	64.5%	1
增加上市公司分红制度,保障投资者收益权	54.4%	2
进一步强化投资者教育和宣传引导	49.2%	3
修改完善退市制度,不给壳资源炒作空间	47.7%	4
强化证券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加大行政处罚限额	46.7%	5
加强证券基金行业文化建设,提升行业机构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41.0%	6
科技监管升级,及时发现问题企业财务造假等行为的端倪	37.9%	7
扩大投资者保护基金赔偿范围,将对市场主体的罚没资金用于赔偿投资者	36.3%	8
推动集体诉讼制度落地,减小投资者维权压力	32.6%	9
推广注册制,使市场更加公开透明	31.4%	10
进一步强化投诉处理,加强12386热线等投诉渠道的建设	28.0%	11

二、一般机构投资者与自然人投资者的比较

1. 在平均持股时间上,受调查一般机构投资者要长于自然人投资者。从平均持股时间来看,受调查一般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偏向中长期,平均持股时间在1~6个月的受调查者占30.0%,6个月至1年的占28.1%,1~3年的占20.6%,3年以上的占15.3%,而1个月以内的仅占6.0%。对于自然人投资者,平均持股时间在1~6个月的受调查者占32.8%,6个月至1年的占24.6%,1~3年的占17.4%,1个月以内的占比14.3%,3年以上的占10.9%。

2. 在买卖股票的操作风格上,一般机构投资者以长线为主,自然人投资者以中长线为主。在买卖股票的操作风格方面,55.5%的受调查一般机构投资者倾向于“价值投资、长线为主”,选择“波段操作、中线为主”和“快进快出,短线为主”的占比分别为29.5%和6.4%。自然人投资者倾向于以中长线投资为主,其中,38.1%的受调查自然人投资者倾向于“波段操作,中线为主”,占比最高;35.2%倾向于“价值投资,长线为主”;倾向于“快进快出,短线为主”的受调查自然人投资者占比17.9%。

3. 在杠杆使用方面,使用杠杆资金炒股的一般机构投资者和自然人投资者占比均为三成左右。调查显示,受调查一般机构投资者投资股票时使用杠杆资金的比例较低,仅27.6%的受调查者表示使用了杠杆资金,且杠杆资金占本金的比例不高,基本在本金的50%以内。本次调查中使用杠杆资金炒股的自然人投资者占比为29.1%;使用杠杆资金的比例未超过自有本金的投资者占比为25.4%;使用杠杆资金的比例超过自有本金的投资者较少,仅占3.7%。

4. 在止盈变现方面,一般机构投资者对于止盈变现的收益率区间选择与自然人投资者差别不大。调查显示,九成以上的受调查一般机构投资者表示投资股票盈利 10%以上才会卖出变现,选择在盈利 10%~30%、30%~50% 和 50% 以上时卖出变现的受调查者占比分别为 33.9%、36.2% 和 22.2%。受调查自然人投资者对于股票投资的盈利,多数选择在 10%~30% 和 30%~50% 两个盈利区间卖出变现,其选择比例分别为 38.8% 和 32.1%,合计占比 70.9%;在 50% 以上和 10% 以内两个盈利区间卖出变现的投资者相对较少,分别占比 20.4% 和 8.7%。

5. 在投资目标方面,与自然人投资者相比,一般机构投资者更注重获取中长期收益。调查结果显示,受调查一般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目标多为获取中长期收益,尽可能实现收益的稳定增长。具体而言,对于投资目标,58.6%的受调查者表示注重长期收益、希望稳定增长,只有 6.0% 的受调查者表示注重短期收益、追求高波动,余下 35.4% 的受调查者表示投资目标介于前两者之间。对于自然人投资者,51.6% 的受调查自然人投资者表示“注重长期受益,希望稳定增长”,13% 的受调查者表示“注重短期受益,追求高波动”,剩余受调查者认为自己的投资目标介于上述两者之间。

一般机构投资者在投资金融产品时最关注产品风险,而自然人投资者最关注收益率。本次调查中,受调查一般机构投资者表示在投资金融产品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是风险程度和收益率,且对风险程度的选择占比(73.6%)略高于对收益率的选择占比(69.0%),主要考虑投资期限和买卖便利度的占比分别为 17.6% 和 16.6%,而相关投资费用和最低投资额度则不是一般机构投资者考虑的主要因素,选择比例很低。对于自然人投资者,78.5% 的受调查者选择“收益率”,54.1% 的受调查者选择“风险程度”。相比之下,“投资期限”“买卖的便利度”“相关的投资费用”和“最低投资额度”对投资者选择投资品种的影响较小,选择比例均较低。

三、专业机构投资者的情况

2019 年专业机构投资者的盈利情况显著高于一般机构投资者和自然人投资者。本次接受调查的 188 位专业机构投资者所在机构或所管理的产品 2019 年获利情况良好,年度有盈利的机构或产品合计占比高达 91.4%,其中,盈利 10%~30% 的占 35.6%、盈利 30%~50% 的占 25.5%;年度盈亏持平的机构或产品占 5.9%,而年度亏损的合计占比仅为 2.7%。受调查一般机构投资者股票投资获利情况较好,共有 68.9% 的受调查者表示盈利,其中盈利 30% 以内的占到 48.6%,21.9% 的受调查者表示盈亏持平,表示亏损的受调查者仅占 9.2%。受调查自然人投资者中股票投资盈利的合计占比 55.2%。其中,“盈利 10%~30%”的投资者最多,占比 23.6%;盈亏持平的占比 17.6%;亏损的合计占比 27.2%。

宏观经济预期和行业基本面变化是影响专业机构投资者对市场预期的主要因素,在不同的市场预期下,专业机构投资者的股票持仓情况存在明显差异。受

调查专业机构投资者普遍认为影响其所在机构对于市场整体预期的主要因素是“宏观经济预期”和“行业基本面变化”，选择这两项的占比分别为 62. 2% 和 60. 1%，而“场内外资金变化”“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以及“技术指标”的选择比例分别为 21. 8%、19. 1% 和 14. 9%。在预期市场未来处于不同阶段时，受调查者所在机构或所管理产品的股票整体持仓仓位差异较大，预期市场走势向好时则选择高仓位的受调查者占比较大，预期市场走势不佳时则选择低仓位的受调查者占比较大。

超四成受调查专业机构投资者所在机构或所管理的产品中股票投资金额占比在 80% 以上，过半数重点配置了科技行业。受调查专业机构投资者中，其所在机构或所管理的产品中股票投资金额在各类型投资中占比较大。其中股票投资金额占比在 80% 以上的有 44. 1%，股票投资金额占比在 50%~80% 的有 28. 2%，股票投资金额占比在 50% 以下的合计为 27. 7%。受调查者所在机构或所管理的产品在 2018 年与 2019 年的重点配置行业基本一致，电子、计算机、通信等科技行业位列第一，医药生物次之，日常消费位列第三。有所区别的是，2018 年机构对上述三个行业的配置相对均衡，而 2019 年机构对科技行业的配置更为集中，有一半的受调查机构在 2019 年均重点配置了科技行业。

四、关于投资者保护的下一步展望

1. 做好资本市场投资端的研究。目前传统的资本市场研究是以上市公司为核心，基于融资端的研究；针对投资者交易行为、心理预期、情绪因素等投资端的研究相对较少。为适应投资者保护工作的需要，我们应当加强投资者调查分析工作，不断丰富投资者角度的研究分析方法和工具，更高效、精准地获取基于投资端的第一手数据，进而掌握投资者基本状况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对投资者行为结构、情绪因素等方面的分析与研究，为完善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实现让广大人民群众财富保值增值的普惠金融提供助力。

2. 运用科技监管提升投资者保护效能。伴随着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应用为主要特征的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我们需要科技监管的思维和前沿技术的运用以适应投资者保护新形势的需要。一方面，需要立法、司法、行政以及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来实现投资者保护相关数据信息的融合，通过健全相关机制和建设投资者保护数据中心平台来实现信息和资源的共享；另一方面，要强化科技思维、提升技术能力，运用科技手段实现对投资者权益的精准维护，从而节约监管资源，提升投资者保护效能。

来源：中国金融杂志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pKTkrX-6L0lCdsalbBaFpQ>

★区块链论坛

区块链技术在流行病防治中的应用研究

近年来，以区块链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区块链技术在金融、医疗、信息、公共事务等领域的应用快速升温，得到了世界广泛的关注和探索。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为例探讨区块链技术在流行病疫情防控角度的实践应用，以及探究区块链技术应用于疫情防控、人口追踪及资源配置的可行性，通过区块链技术完善现有流行病疫情防控系统，最终提出数字经济视角下的流行病疫情防控策略，从区块链技术的技术架构、激励机制、共识机制等层面分别设计针对流行病 COVID-19 防治系统的具体实现内容，旨在为未来区块链技术在流行病疫情防控方面提供一定的研究借鉴。

一、文献研究

1. 公务。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有人使用“公务”这一概念。公务是指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以具有公共性的事物为对象，要求人人参与，而又只能由少数专业人员直接从事的社会活动。可以将公务理解为与社会公众的共同需求，采用公共管理的方式。与此同时，面对公务的人群庞大又特质不同，公务治理的关键和难点在于寻求“自治”与“嵌入”两者间的动态平衡。人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着最大化实现公共利益的公务治理之道，政府对社会公务的管理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组织方式。政府作为国家和社会公务的唯一管理主体和权力中心，集中了所有的公共资源，决定和安排一切公务事宜。但随着公务的日益众多和日趋复杂，社会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多样化与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实践证明，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都不具备充足的资源和能力可以独自治理公务与解决所有的公共问题。公务的治理需要多方合力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通过提高合作治理能力、优化合作治理结构、建构合作治理机制、培育合作治理文化等措施完善合作治理模式，从而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公务影响全球化的实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市场化和自由化的过程中，面对很多突发需要处理的公务，如2020年初中国武汉地区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病事件，绝非仅仅依靠政府之力能完全解决，而是需要众多行动主体包括医院、社会等相互合作，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务以实现公共利益（疫情管控）的过程。为实现公务的善治，治理主体必须考察和分析生态系统、社会系统及其构成要素之间的内在机制，在复杂、相互嵌套的社会——生态系统中，治理主体诊断系统、发现问题、修补漏洞和完善系统，实施多层次的政策与制度调试，多主体协同合作共同完成公务的治理。在不确定的社会条件下，公务活动者不可能获得有关公务问题的所有信息，不可能拥有

处理信息的完全能力，也不可能绝对理性地进行选择，这给公共事务的治理带来很大的挑战。因此，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要强调多管理主体包括公共、私人的或个人、机构管理公共事务。完善方式是政府能把原先由它独自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参与者自主合作构成网络，使得公共事务管理主体多元化。积极促进公民参与实现管理民主化，是现代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必然之路。

2. 流行病预警防治体系。随着计算机存储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医学数据能够被实时完整地记录，流行传染病数据逐步呈现高维和动态性的特点，有助于对流行病传播规律展开研究。可以针对重点流行病预防制综合分析系统建设过程中数据综合分析的方法和模型，科技的发展为重点流行传染病预防制综合分析提供了方法基础。如近年来的人工神经网络（ANN）在流行传染病分析与预测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在针对流行病疫情防控等非线性系统的建模及控制中有着基础支撑能力。与此同时，因为流行病的传播是一种复杂现象，这种复杂现象只能作趋势预测，需要借助新兴的复杂性科学进行研究，使用决定论的模型或时间序列重构和预测的方法，通过对流行传染病进行建模分析的方式做好预防和管控。互联网新兴技术的发展，为我国目前传统的流行传染病疫情报告系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3. 区块链技术在流行病防治中应用。在数字经济系统中，广泛使用的数字技术给整个经济环境和经济活动带来根本性变化，同时在公共事务治理上也带来新的思考和探讨。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是公共事务治理中的新型主流技术。区块链是一个分布式的共享账本，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全程留痕、可以追溯、集体维护、公开透明等特点。这些特点保证了区块链的“诚实”与“透明”，为区块链创造信任奠定基础。利用区块链的特征和安全多方计算，可以建立一种安全、高性能的共享及多方计算模型，使得参与者能在自主控制数据的同时，保证数据计算和共享的安全性，保障了公共事务治理中数据信息的对称性和隐私性。区块链数据安全系统通过共识算法实现公共事务中多个责任实体对于数据共享管控的分布式验证和决策，将原有公共事务共享交换平台的管控权限分配到多个下级责任实体执行降低了共享交换平台的管理责任，提高了交换平台的稳定性。

在流行病等疫情防控过程中，因医疗数据的校验、保存和同步较难，各医疗机构间共享数据困难，病人、医生和研究人员在访问与共享医疗数据时有很多的局限。花费大量的资源和时间用于权限审查和数据校验给流行病的防治带来了延误，区块链技术对医学数据建模共享管理，可以有效提高流行病防治效率。而传统的流行病监测，是一个复杂而低效的过程，可以利用基于区块链优化流行病的监测和报告系统，采用分布式账本技术进行疾病监测，以及配合相应的激励机制完善疾病防治系统。区块链技术针对流行病防治过程中的医疗碎片数据、延迟通信和异类工作流，提供了访问纵向、完整不可篡改的医疗记录的机会，这些记录

以安全、伪匿名的方式存储在分布式的数据系统中，能够更好地实现医疗数据的多层次交互和流动，提高了流行病等的防治效率。如在埃博拉病毒防治时，区块链平台可以提供实时的埃博拉监测和接触者追踪，通过在一个区块链平台上收集来自 CDR、全国人口普查、全国运输系统和埃博拉疫苗生产数据库的大量数据，区块链系统让更多参与者实时访问数据，加大了在平台上量化人类行为的机会，可以进一步了解人口动态在疫情传播和控制埃博拉期间所发挥的作用。结合区块链技术的医疗平台，通过共识机制加快了流行病信息的录入过程，非对称加密与数字签名技术保证了数据的真实性，共识节点上的数据存储分散了流行病信息的价值，降低被黑客集中入侵中心节点的风险，而将传统的流行病预警与区块链相结合可使数据利用更加安全、高效。利用区块链技术进行医疗数据共享和分布式管理，可以更好地推动全球医疗一体化，流行病预警的自动化，使得公共事务中类似医疗健康管理更加个性化和平民化。

二、我国现有流行病防治体系分析——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 为例

1. 我国流行病防治体系的痛点

我国流行病防治体制以区域卫生平台为介质，智能化采集电子病历中流行病相关信息生成流行病报告卡，补充信息后逐级上传至区、市、国家流行病网络直报系统（NDRS）。流行病预警体系可判断其即将流行的强度，未来发病数和流行病的传播过程，并阻止疾病的快速传播。虽然已经建立了报告、预警体制，但流行病防治体系依然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对新型流行病监测延迟，地方政府基于各种考量偏向隐瞒信息。HIS（医院信息系统）只提供已存在法定流行病的相关信息和病人的以往病历信息，但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无法提供充足的数据信息，且存在政府某些管理人员的隐瞒漏报导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未能及时防治。

第二，上报需要经过三层审批，程序繁重。流行病报告卡上报是否成功，人为干扰因素太多。由于国家流行病上报对于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要求高，每一级上报都稳健保守，且缺少同级之间多方核对的过程，医疗机构之间也很难针对新型流行病 COVID-19 展开交流和讨论。

第三，数据实时性、可溯性不够。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爆发后，未能对感染 COVID-19 病人的病毒来源进行追溯，对行走路径实时监测；相关医疗设施及防护资源未得到合理分配；各机构在研究流行病 COVID-19 的详细信息及治疗方法的进程中数据不能实时共享。

第四，医疗物资分配不合理。在突发流行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时医疗物资供给不足导致病人无法治疗，地区间物资分配不合理，资源浪费。

2. 利用区块链技术完善流行病 COVID-19 防治体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经过多年的发展，区块链技术在金融、医疗、信息服务等领域快速升温，催生出了一个又一个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数字经济视角下的交叉学科，在中国更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是从必要性角度上分析，我国现行的流行病防治体系信息化程度还远远不足，不充分数据共享与信息处理制约了流行病防治的准确性及效率，建设一个高效的流行病防治体系十分必要。二是从可行性角度上分析，对于传染性疾病防治系统来说，关键是准确发现感染者并迅速上报。当病毒爆发并确认疾病能人传人时，管理部门就需要识别、隔离患者，并追踪与患者接触过的人。每当发生疫情时，首先要做的是，“系统、持续地收集和整理、分析数据，并将信息及时分发给需要知道的人，以便采取行动”。利用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开放性、独立性、安全性、匿名性等特征，结合近期的流行病 COVID-19 疫情防治热点，在医疗信息共享与更新、流行病防治体系建设上具有可行性。

图1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流行病NCP防治系统技术架构图



（未完）

作者：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李爱娅、赵欣欣、王中杰，北京交通大学威海学院 王以戈

来源及全文链接：数字经济与管理周刊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YnYi-6m08cEK0Clhqm2Uw>

区块链在公共事业领域的应用与发展

当今世界，国家的科技实力是大国力量的重要体现。作为下一代互联网的关键技术，区块链技术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其发展能够从国际和国内两个角度塑造国家竞争力，成为综合国力和科技实力的一个象征。因此，区块链技术的研发成为各国的必争之地。不少国家和地区纷纷出台规划和具体措施，推动区块链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一、区块链的定义

区块链分为公有区块链（公有链），行业区块链（联盟链）和私有区块链（私有链）三类，分别针对不同的现实需要。

区块链（公有链/联盟链/私有链）是由若干个有时间顺序、包含交易信息的区块从后向前有序链接起来的数据结构。由多方（任意节点/预选节点/特定节点）共同维护，使用密码学保证传输和访问安全，能够实现一致存储、难以篡改、防止抵赖的记账技术，也称分布式账本技术。

区块链本质上是分布式总账，基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采用算法（共识模型）提供一个可信任的环境，确保节点的交换数据过程和交换历史记录不被篡改；节点的数据会同步到经过共识的最新数据；整体节点维护的数据本身客观反映了交换历史。

二、区块链的起源、发展与技术特点

上个世纪 80 年代，数字货币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2008 年，《比特币：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又称《比特币白皮书》，作者匿名“中本聪”将其发表在密码学网站。中文翻译版最早将原文中的“chain of blocks”译为区块链。至此比特币现世，区块链也开始逐渐走进大家的视野。区块链与比特币关系密切，但起初人们更加关注比特币这一数字货币的发展状况。2013 年，人们逐渐意识到比特币在没有中心化运营和管理的情况下运转良好，大家才开始关注支撑比特币系统的关键要素——区块链技术。作为区块链的首例应用，比特币系统的良好发展态势，使专家人士看到作为比特币底层技术和基础架构的区块链的无限可能，或可将其应用到更广阔的空间。

区块链技术可以应用在不同领域。区块链与产业结合的应用模式，克服了原行业的发展劣势，将行业特色与区块链技术优势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新的特点及行业优势，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并参与到社会行业的发展进程中来。

区块链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去中心化、开放性、自治性、匿名性、信息可溯源、信息不可篡改。以下结合联盟链描述其具体特点：

去中心化。区块链使用分布式核算和存储，不存在中心化的硬件或管理机构，预选节点的权利和义务均等。

开放性。交易各方的私有信息被加密外，行业区块链的数据由预选节点写入，其他节点可以通过公开的接口限定查询区块链数据。

自治性。区块链采用基于协商一致的规范和协议（比如一套公开透明的算法）使得整个系统中的节点能够在去信任的环境中自由安全地交换数据。

匿名性。由于节点之间的交换遵循固定的算法，由算法保证实现，其数据交互是无需信任的（区块链中的程序规则会自行判断活动是否有效）。

信息可追溯。区块链是保存历史交易数据的分布式数据库，通过调动节点的参与积极性，实现多节点无差别记录，从而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可追溯。

其机制就是设定后面一个区块关联前面一个区块的一个哈希值，仅当识别了前面的哈希值才能连接，以此形成一条完整的链。

信息不可篡改。信息一旦经过验证并添加至区块链将会永久存储，因此区块链的数据稳定性极高。

各行业可以依照客观情况，切实结合行业自身发展特点，适当引入区块链技术，克服自身行业当前发展的桎梏与不足，探索基于区块技术下的应用模式，努力为市场注入新鲜活力，为相关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会，进而促进科技与社会的进步。

表1 区块链分类

类别	描述
公共区块链 (公有链)	世界上任何个体或者团体都可以发送交易，且交易能够获得该区块链的有效确认，任何人都可以进去读写公有区块链的信息，参与其共识过程。 公有区块链是最早的区块链，也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区块链。
行业区块链 (联盟链)	由某个群体内部指定多个预选的节点为记账人，每个块的生成由所有的预选节点共同决定（预选节点参与共识过程），其他接入节点可以参与交易，但不过问记账过程。
私有区块链 (私有链)	仅使用区块链的总账技术进行记账，可以是一个公司或是个人，独享该区块链的写入权限，分布式存储方案与其他类型区块链类似。

三、我国对区块链的态度及政策发展

各国政府对区块链发展持不同态度，多数国家重视区块链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少数国家对区块链技术及加密货币持“积极拥抱”的态度，部分国家对加密货币明确了监管政策。例如，澳大利亚、韩国、德国、塞浦路斯、阿联酋、马耳他等国家发展区块链产业，并制定了产业总体发展战略；美国、中国、韩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瑞士、芬兰等国家陆续制定了区块链监管方面的法规。

我国对区块链技术表现出浓厚兴趣并显现出积极发展的态势。从 2008 年比特币诞生以来，我国政府就密切关注区块链领域，期间也颁布了相关的政策法规，对区块链的发展起到了相当程度的推动作用。

2019 年 10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对区块链作出四点指示：一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重要突破口；二要加强区块链标准化研究，提升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三要推动区块链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四要把依法治网落实到区块链管理中，推动区块链安全有序发展。

科学技术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区块链作为一项高新技术，对于未来中国保持经济增长和增强国际影响力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来看，区块链技术已经获得了国家的认可。伴随国家对区块链的高度重视和科学技术技术的迅猛发展，“区块链”将会成为社会的关注焦点，并逐步渗透至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表2 部分国家的态度及政策

国家	态度及政策
中国	发展区块链技术，规定比特币是虚拟商品，非货币，不在市场流通
澳大利亚	政策开放，并且大力支持区块链技术的创新发展
美国	对区块链持“拥抱技术”和“不要封杀”的暧昧态度
英国	“监督不监管”
德国	世界上首个承认比特币合法的国家
日本	态度比较正面；正式承认虚拟货币为合法支付手段
新加坡	承认数字货币的合法性，同时进行积极监管
俄罗斯	将加密货币定义为非法货币
韩国	比特币作为一种合法的汇款方式
泰国	接受包括比特币、BCH、以太坊在内七种加密货币
印度	会持续关注数字货币的发展，目前不会进入监管

四、区块链技术在公共事业领域的应用场景

公共事业是由公共组织的行为主体进行的，面对全民、面向社会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基本目标，提供特定的公共产品的事业领域的相关行业综合，包含教育、医疗、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文化、电力、政府基本社会保障、交通、环保等诸多领域。公共事业是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载体，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关系到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公共事业具有公共性、非营利性、规模性、服务性、整体性、公益性等特点，同时大多公共事业需要跨主体合作，需要各主体之间建立低成本的信任。

区块链技术能够起到促进数据共享、优化业务流程、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协同效率、建设可信体系等作用。区块链技术的特点使得其在公共事业领域具有巨大应用潜力。下面我们将以教育、医疗、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文化、电力、政府基本社会保障、交通等公共事业具体领域为例，分析区块技术如何缓解当前相关领域的困境，并介绍区块链技术在这些领域的应用现状以及一些实际案例。

教育领域。近些年，随着素质教育的推广，学生培养不再只看重学生的成绩好坏，而更注重学生优秀习惯、素质和品质的养成。学生素质与成绩的表现形式、评价方式不同，而当前教育系统学生档案的记录不能满足对学生素质的评估要求，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着学生档案管理难、学生接受的专业教育与应具备的职业能力不协调等问题。学生档案是学校关于学生的培养、教育、考察情况向学生和社会交出的答卷，是高校基于学生管理至关重要的证明材料。当前，学生档案大多采用纸质版形式存放，容易造成许多管理上的问题：（1）在存放过程中容易发生非人为自然损坏、丢失；（2）人为保管无法确保档案的真实性、有效性；（3）中心化数据成果和资料容易受到攻击或篡改，无法有效保障学生的档案隐私安全；（4）在档案管理过程中，难以最大化利用学生档案数据信息。

教育系统管理引入区块链技术将会有效改善学生档案资料不当管理的现象。第一，区块链不可篡改特性能够保证上链的学生档案信息真实可靠；第二，区块链的信任机制使得学生档案信息能够得到保护。总的来说，将学生档案与教育信息（包含学生入学以来学习状况、研究状况、参与项目、学习表现、上课表现等）上链，可验证学生和学校的有关信息，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准确记录学生成长历程表现，使学生学习记录、学校管理过程可追溯，实现高效化管理学生系统，全

面化评估素质教育，可量化学生成长进度。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构建起学生、高校与社会之间有高度可信的信息体系，降低专业素质与技术能力之间的不匹配度，大力促进学生的成长、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

医疗领域。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云时代的来临、科技的发展带来了数据爆炸式增长，2012年后大数据开始走入大众视野，经由大数据运算的结论也更能得到大家的信赖。由于个人的数据信息关系到个人隐私，数据收集成为大数据处理运算的新难点。而医疗领域中患者的个人信息更为私密，隐私保护也更为重要。一旦犯罪分子攻击医疗领域医院数据源，通过不法手段窃取并泄露患者的敏感信息，将会给患者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严重可能会危及患者生命，同时医院运营也会受到巨大影响。

2006年5月，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亮菌甲素注射液，误将二甘醇当作辅料丙二醇使用；2007年5月，河北省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查获假冒“人用狂犬病疫苗”；2011年8月，药监局发布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信息，通报上半年药品不良反应2698例……此类医药安全事件的发生，表明我国药品管理机制有待改革。同时医疗行业依然存在医疗信息安全性低、医疗数据难共享、信息易被篡改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区块链技术可保证全程追溯药品的生产、物流、销售、使用及影响，实现了医疗药品，耗材从生产到使用的全过程管理，有效监管医药卫生安全；可对每一次药品流转、医疗耗材、电子病例进行登记，帮助专业医师提高诊断的速度和准确性，促进医疗领域的职能转化与行业发展。医疗行业引入区块链技术后，有效提高患者的敏感信息的私密性；即使在中心数据源损坏的情况下不会对其他节点产生影响，提高了医疗数据的安全性、可靠性。

医疗数据是医疗领域非常宝贵的资源，包括病人身份、过往病史以及医疗支付情况等，但这些都是患者的隐私数据。“区块链电子病例”的使用可以在以下方面起到重要作用：（1）缩减医院、医生、病人之间的沟通成本，提升手术治疗及程序调度过程效率，解决数据丢失问题；（2）用户利用加密技术和匿名化处理对自己的数据有选择地进行加密或者公开处理，保护了患者的隐私；（3）区块链技术可以让医院安全的储存数据——包括医疗文书、病人病历、诊断结果等，与外界医院实现医疗资源信息共享。

公共卫生。在公共事业组织结构当中，问题发生后的反馈顺序是由下到上，问题的解决顺序正好相反，自问题出现到解决方案作用至相关问题层面需要双倍的中间流程传递时间，这种解决问题的形式可能会延误最优的反应时间。区块链技术可保证信息公证上链后，点对点机制直接作用至初始问题节点，高效处理问题；各节点同时对同一事件进行反馈，有利于集思广益、博取众长。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当中，区块链技术有助于提高事件处理速度，为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争

取反应时间，最大化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019年底，湖北武汉地区开始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疫情爆发后，国家宏观管控，各省份接连启动重大公共医疗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由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指导发起，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区块链研究中心、博雅正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开发建设了“博雅医链”战“疫”医疗物资捐赠存证公益平台。平台免费为捐赠与受赠双方提供物资确认、可信存证，信息查询等服务，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防篡改、可溯源等特性提高了平台捐赠信息的透明度与公信力，为社会各界提供了公开透明、可追溯、可反馈的监督途径，这是用区块链技术保证信任的又一力证。

（未完）

作者：北京工业大学 李健

来源及全文链接：数字经济与科技周刊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3-h4APbmMdbSL7cXkI7h7g>

陈纯：中国区块链赋能各行业亟需解决四项核心技术

忽如一夜春风来，区块链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实体经济、金融资本和社会舆论共同追逐的焦点。

区块链技术正在引领全球新一轮技术变革和产业变革。然而，刚满十岁的区块链技术在自主创新上需要有哪些重要突破？区块链如何在促进数据共享、优化业务流程等方面发挥作用？区块链技术应该如何引导并加强安全风险防控？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浙江大学信息学部主任陈纯院士。此前，他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就区块链问题作了汇报，并谈了意见和建议。

一、联盟链存在四大关键技术难点

村民张三把100元借给了李四，为了确保借出的安全，张三通过村广播把借钱的事情告诉了全村，村民们点对点核实以后，把这次借钱记在了自己的账本上。

通过这个简单比喻，陈纯院士介绍了以单点发起、全网广播、交叉验证、共同记账为主要特征的区块链。“全程可追溯、不可篡改。张三不怕李四赖账，因为李四不可能去更改全村的账本。”陈纯进一步解释，区块链是一个记账系统，根据应用场景以及用户需求，分为公有链、联盟链、私有链三种。

陈纯认为，要争取我国在区块链技术发展上的主动权，就要大力发展国产自主可控的区块链技术平台，包括对联盟链和公有链核心技术的研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推动区块链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让“区块链+”服务于各行各业，陈纯认为发展联盟链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他认为，当前联盟链还存在四个方面需要继续突破的核心技术。

一是高性能关键技术。目前区块链在大规模应用或者出现大量数据节点时，性能会急剧下降。国内领衔的联盟链技术，目前每秒可以处理上万笔交易，但在双十一高峰时期，阿里云峰值处理交易速度达到每秒 30 多万笔。这两者的数量级还存在鸿沟，需要高性能关键技术加以解决。陈纯表示，希望通过高性能的共识算法、高效智能合约引擎，能够提高共识效率与安全性。

二是安全隐私关键技术。在中国要用，首先要全面支持我国的加密算法和标准。商业应用需要平台支持对业务数据的隐私保护，比如通过命名空间隔离的方式在物理层面对业务数据进行分离，还有更细粒度的隐私交易机制，实现交易可验证但是不可见。还有基于可信执行环境等技术实现节点密钥管理和数据加密存储，防止文件被篡改。

三是高可用性的关键技术。这其中包括动态成员的准入机制，以及节点失效后的快速恢复机制，不能整个系统停下来加节点，应该是可以实时动态的。还有联盟自治管理机制和高效的热备切换机制，这也是联盟链以后的关键技术。

四是高可扩展的关键技术。联盟链要方便适用于各场景，必然支持多种编程语言的使用。同时，还需要支持多类型、多组织形式的数据可信存储，支持跨链协同等。

针对“区块链+”在大规模应用方面的问题，陈纯认为最重要的是解决链上链下数据协同的问题。所谓的链上就是区块链，链下就是所有传统的可信信息系统。怎么样把区块链系统嵌入到现在传统可信系统里来解决它的一些问题，或者反过来用区块链系统把传统的信息系统放出来？链上链下数据协同需求可能会特别重要，要求链上链下数据能够有效协同，以确保链上链下数据的关联性和一致性。

二、“区块链+”赋能民生大有可为

区块链的应用场景，中西方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思路。

西方区块链的发展基本上是基于金融创新带动别的行业创新，而中国除了金融创新外，更重要的是在各个行业的应用。陈纯表示，中国正在加快支持区块链技术在金融、民生、政务、工业制造等领域的应用落地，重点分析区块链技术能够解决的业务痛点以及在不同场景下的适用度，共同建设更加完善的产业应用生态，努力使区块链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支撑技术。

公积金中心在中国是城市隶属的机构，我国不存在全国性的公积金管理机构。如果要统合这些方面的数据，用传统的方法只能是物理归拢，不但时间、成本高，而且很难很快解决相应问题。而区块链的应用，就让存在各地的数据能够轻松跨地流转，为政务民生服务。

住建部通过区块链把全国的 491 个公积金中心连在了一起，不必集中统一数据的存储，就可以异地很方便地操作。“从技术上讲如果没有区块链，杭州的公

公积金中心想要调取北京的数据非常麻烦。但是有了区块链，通过数据协同，就可以轻松且可信地调取一个人在北京交的公积金。”

让数据多跑腿是当下对政务服务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而随着区块链技术的使用，用陈纯的话说，数据也不用跑。这是因为智能合约的存在，区块链可以让数据留在各个城市，实现数据的跨城市共享，并通过同步到相应节点，省去了大量数据跑腿的“烦恼”。

中国的银行为什么说做中小企业贷款很难，不是没有钱，而是因为要提供资产担保或者股票担保，或者是别的企业给它担保。所有担保、签合同、协调都需要时间，时间就是效率。如果所有的这些信息都在链上看得清清楚楚，银行可以自己判断是否直接给贷款，那么中小企业办理贷款效率就提高了。陈纯介绍，浙商银行“应收款链平台”目前使用了区块链技术，据了解已经节省了80%的审核时间，成本也降低了50%。

据了解，浙江大学区块链研究中心已经基本上可以提供国产、自主、可控、完善的中国国密算法支持，提供系统的链上链下协同服务技术栈，已上线服务包括：大规模可信存储、集群节点数量可达数万节点。另外，支持智能合约跨链互操作的通用跨链服务，“数据可用不可见”数据共享都已经初步实现。

但陈纯也坦言，区块链的技术正在爬坡，不论是每个单点技术还有整个系统的技术都远远不够，他觉得中国的区块链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没有监管的区块链，就像路上没有红绿灯”

每个司机的理想状态就是路上没有红绿灯，以为这样车子可以跑得快，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就如同公有链中，去中心化、不可篡改、不可删去、低成本的特点，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体，但也可能成为传播有害信息、网络谣言的温床。

陈纯指出，任何一个好的技术或者工具都需要被正确予以使用，才能发挥最大价值。“我们认为，区块链作为重要的底层基础设施，在其快速发展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监管的安全问题。”

在技术上如何为监管提供支持？

陈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要强化对区块链平台及应用的安全评估，提升区块链技术及应用的合规性和规范性，协助建立健全区块链监管体系，强化区块链监管能力建设，共同探索区块链监管新模式，实现监管技术的升级和提效，并降低监管成本，确保产业发展与监管并行，为区块链技术的健康发展创造环境。

尽管监管的道路还是非常长，但在陈纯看来，正因为有效的监管，国内或将大规模应用区块链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来源：浙江大学区块链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4Nq3ndI4Tv9wXCXa0DjvZQ>

★公益慈善论坛

社区基金会在疫情防控中的行动空间及独特价值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社区很快成为抗疫主战场。在应急响应状态下，扎根社区的社区基金会又是如何寻找自己的行动空间的呢？广东省德胜社区慈善基金会（简称“德胜基金会”）是广东顺德何享健家族“和的慈善体系”的重要成员，由何享健先生于 2017 年捐赠 5 亿元人民币并通过“慈善信托+基金会”的形式设立，专门支持顺德地区的社区发展。以下简述德胜基金会在本次疫情中的抗疫行动，并用生态学中生态位（niche）的概念来理解社区基金会在基层应急事件中的行动空间和独特价值。

一、德胜基金会在广东顺德的抗疫行动

从 2 月 1 日开始筹划参与社区抗疫起，德胜基金会的抗疫行动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紧急物资援助为主，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与顺德区青年企业家协会联合出资 45 万元设立“青企抗疫专项资金”，为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抗疫前线医务人员采购 500 套医用防护服，并通过顺德区义工联为一线抗疫志愿者购买防护物资、保险和其他服务；二是购买 14 吨消毒液，分发给容易被忽视的社会服务机构，包括顺德区十个街镇的 93 家幼儿园、22 家残疾人康复机构、18 家养老院、13 家社工机构和 4 家长者饭堂。

第二阶段以面向社区和社会组织进行项目资助为主，动员更广泛的力量缓解社区防控压力和降低疫情带来的次生影响。德胜基金会经过与理事会的积极沟通，迅速调整全年资助预算，决定将三分之一的资金（1000 万）提前用于社区抗疫。2 月 14 日，基金会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项资助”，以顺德全区村（居）委会和在顺德区内开展服务的社会组织为对象，提供两类资助：一是社区防疫公益服务，包括防疫相关的志愿服务、互助行动、宣传教育、受疫情影响的弱势群体帮扶、心理支持等；二是对因疫情影响而运营困难的一线服务机构提供应急支持。

第三阶段多元力量面向多元群体共推“和善同心”。2 月 21 日，在和的慈善基金会的统筹下，顺德慈善会、北滘镇慈善会的两个“和的爱心基金”加入行动，专项资助升级为“和善同心”社区抗疫计划，资金池增至 2000 万元人民币。抗疫计划以村（居）委会、社会组织、医疗、残疾人康复和养老机构为资助对象，并通过社会组织间接服务于受疫情影响的一线医务人员、异地务工人员和社区弱势群体。截至 3 月底，“和善同心”计划五批次共资助 261 个项目，其中德胜基金会的资助项目 214 个，覆盖了顺德 194 个村居、17 家社工

机构及 1 个全区志愿者抗疫服务。

二、社区基金会在危机应急中的角色定位

在此次新冠疫情的特定情景下，很多社会组织在一开始都有一种无所适从感，德胜基金会的同事们也一直在思考到底能做些什么。抗疫的主力无疑是政府、医院和基层社区，在人员不能自由流动、自身没有物资储备、又缺少公共卫生专业知识的情况下，社会组织似乎什么都干不了。即便有资金也还不一定能买到抗疫急需的物资，也不如志愿者网络的脉络广，反倒有可能扰乱物资市场；即便有物资，也不能直达一线抗疫人员，无序输入很可能造成添乱和干扰。

在此背景下，社区基金会的行动空间到底在哪里？生态学中有生态位（niche）的概念，指的是一个个体或种群在生态系统中的时空位置及与相关个体、种群之间的功能关系。生态位的概念有两个重要的启发，一是要选择合适的生态位才能避免竞争、有利生存并发挥独特的功能，二是生态位至少包括时和空两个维度。在公益机构行动策略选择的适用性上，还可以在时、空两个维度的基础上再拓展一个维度，即对象选择（targeting）维度。我们从这三个维度来看德胜基金会是如何结合自身的资源和优势，找到合适位置的：

时间维度。对于灾难救援或危机应对类行动来说，时间是最重要的考量维度，不同时间节点需求不一，不同主体的潜在贡献也不一。正如 Iwill 志愿者联合行动关于疫情救援四阶段研判（图 1）的分享所示：疫情冲击初期，不确定性很强、情况不明朗，需要基于理性和科层决策的政府尚未及时充分发挥作用，此时最重要的角色是行动迅捷的志愿者；疫情中后期的次生灾害和服务需求才是大多数服务类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优势阶段。德胜基金会第一阶段的行动以防疫物资应急救援为主，并通过义工联支持一线抗疫志愿者，第二阶段则转向能减轻疫情影响的相关抗疫服务资助，在时机的把握上非常务实且契合疫情发展的阶段性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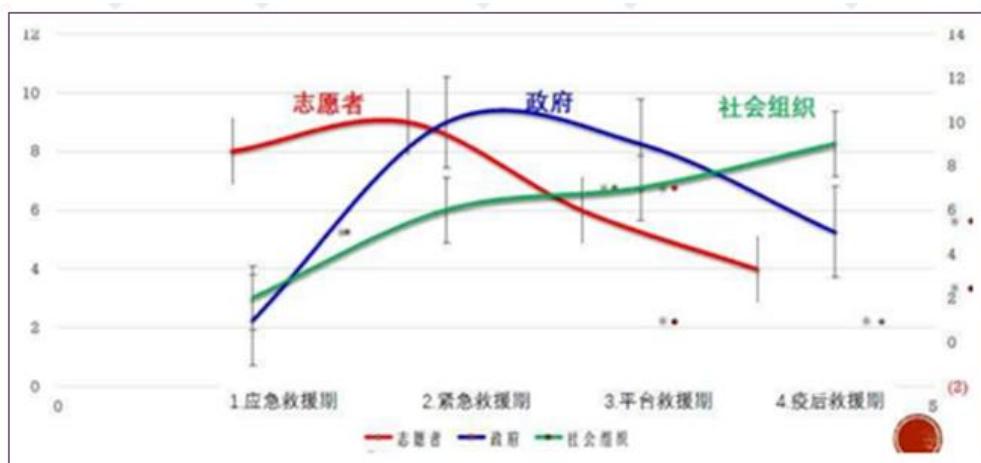


图1 新冠疫情救援四阶段研判（来源：转自Iwill志愿者联合行动杨团、思语、瞿雁）

对象维度。受益对象的精准选择（Targeting）是公益组织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和善同心”社区抗疫行动的资助对象选择非常明确。一是紧急支援残疾人康复机构、养老院、长者饭堂等这样一些相对容易被人们忽视的服务场所，以及受疫情影响可能出现运营困难的一线服务机构。二是专项资助参与抗疫的村居委会、社工机构及其他社会组织。在常态下，顺德这些组织的项目资金主要来源于三大部分，包括政府购买服务、政府主导的“众创共善”公益创投和德胜基金会的“和美社区”计划。在疫情应急的特殊时期，社工机构也在积极协助政府和社区抗疫，但此时政府并不能面面俱到，一时间照顾不到社工机构的额外投入，“和善同心”的项目资助成为持续陪伴这些社工机构、社会组织的重要专项资金来源。三是大面积资助村居委会，作为在政府资金之外的补充，重点支持其动员社区志愿者参与和自助互助项目，在缓解社区干部工作压力的同时也在传导社区多元共治的理念。

空间维度。空间关注如何处理与组织生态中其他主体的竞合关系。德胜基金会在基层抗疫的诸多主体中占据了社区和社会组织的陪伴者、资助者和联动者的恰当角色。不同于政府在社区、医院抗疫的主力角色，基金会是补位者，是社会服务者的服务者；不同于另一类传统的慈善会，慈善会在应急状态下更偏重在接受社会捐赠和慈善物资方面充当重要角色，而社区基金会则偏重于资助服务项目和社区动员中发挥作用；也不同于义工组织、社工机构等一线志愿者组织或一线服务机构，社区基金会是这些组织的坚强后盾和联动者。社区基金会与其他组织的联动协同非常突出，以初期的消毒液和其他抗疫物资捐赠为例，面向服务场所的物资基金会只负责采购，运转配送则通过区、镇两级慈善会体系来达成；面向志愿者的支持，则通过与区义工联合作来达成。依托于自身的资源特征和项目管理经验，德胜社区基金会在政府、企业家、慈善会以及社区、社会服务机构、志愿者之间拓展出行动空间，展示出独特性。

由此可见，德胜基金会上述看似简单的行动背后却有诸多考量，在当地社会组织生态、乃至整个抗疫生态中找准了自己的生态位，并充分联动协同，发挥了独特的优势和功能。

三、社区基金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价值

基于德胜基金会抗疫行动案例，把社区基金会放到整个公益生态和地方治理体系中进行审视，我们看到其三方面的独特价值：

一是扎根本地、接地气。与其他关注社区抗疫的公益机构相比，社区基金会扎根于基层社会网络，对本地需求、行动场景的把握更为精准。此次疫情响应行动中，万科公益、联想公益、招商局慈善、正荣公益等基金会等机构发起“社区战疫”支持联盟，对全国范围内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抗疫起到了很好的倡导和助推作用。但相比之下，社区基金会在支持本土社会组织方面更具得天独厚

厚的优势，一方面对地域范围内的社区、社会组织已经有充分的了解和信任关系，资助内容更符合需求、程序上更简洁灵活；另一方面资助也更成体系、服务和陪伴更完整。德胜基金会的项目申请只需要填写简单表格，抗疫支持计划2月14日发布申报公告后，20日即公告第一批资助项目，22日第一批项目经费就拨款到位；基金会还及时向政府沟通、汇报情况，为社区和社会组织的抗疫行动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是体制优势、反应敏捷。德胜基金会能够很快调整全年预算并把大量资金用于抗疫行动，能够很快回应地域内社区和社会组织的需求并填补空白，这得益于其民间属性、资金来源和高效的决策机制。与远离社区的基金会相比，其理事会成员为本地精英，对社区形势足够敏感；与官方背景慈善组织相比，其资金来源相对单一，决策程序简单灵活、自主性较高，不需要考虑层层审批和严苛问责。一切都基于务实的考虑来回应本地的需求，高效迅捷。

三是社区基金会的情感面向和社会关系的建构。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也是与其他基金会和官办组织相比最大的不同。事实上整个“和的慈善体系”都在扮演这种地方情感营造的功能。“和的慈善体系”以创新创业基金会为核心的“和衷共济”计划（2亿人民币）扶持小微企业，以德胜社区基金会为核心的“和善同心”计划扶持社会组织和社区，在疫情对本地经济和民生带来冲击的背景下，代表着顺德民间互助的传统道德力量。可以预见社区基金会与政府财政支持的效果将非常不一样，这些受到资助的小微企业在度过难关之后，很有可能也会再反哺顺德社会；对社区和社会组织的资助则会增强社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在基层社会治理与服务中营造合作协同的生态和氛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社区基金会撬动民间慈善，更撬动乡土情感。

此次新冠疫情对整个中国公益慈善行业来说都是一次考验，我们认识到对于这样的公共卫生应急事件，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并没有准备好。在财力和途径多元的企业面前，在响应迅速的志愿者组织面前，乃至在非传统慈善组织、但动员力量巨大的校友会之类组织面前，职业的公益慈善组织都稍显笨拙无力。但另一方面，我们本来也应该对公益慈善机构在重大危机应对中的角色保持适中的期待，唯有如此才能更清醒地认知到自身的局限，找到自己合适的生态位，更积极地跨界链接，与其他行动主体形成协同或协助关系。

最后，对德胜基金会乃至“和的慈善体系”扎根基层的现代慈善之路、对其对形势的敏感性和务实的态度致以敬意。

作者：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 蓝煜昕

来源：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5d4ppJBuJzyfxd3JC1WHew>

“统筹”还是“知会”：抗疫中政府与志愿机制的协力模式

新冠肺炎的疫情应对，所涉问题已经远超出医学救治领域，而关涉相关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统筹和社会的志愿参与，都加入进来。但是从目前可见的范畴看，与2008年汶川赈灾、2013年雅安地震救助等重大灾害应对相比，在此次疫情反应中，人们感到的社会力量作用并不凸显。为什么会如此？在突发事件应对中志愿机制如何更好参与？我们应该更深入理解志愿机制，进而探索更好的政府统筹与志愿参与的协力作用。

一、志愿机制的独特作用

为什么在政府统筹之外，需要社会组织和志愿机制？首先必须认知社会组织和志愿机制的核心特性，它们是与政府的行政体制不同的一种作用机制，而不仅仅是对后者在资源数量上的增益补充。

具体而言，政府是依靠税收运作的体系。它的运作特点是：强制性、统一性、依靠官僚机构执行。与之相比，社会组织的运作机制恰恰具有志愿性、多元性、灵活性，比如在疫情应对中，更便于实现及时、直接、细化的资源对接和多方面的社会治理支持。

举例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都安排了专项基金。政府的专项基金支出方向是什么呢？比如政府承诺确诊病例的全部免费救治，疑似和留观人员中与疫情防控直接相关的医疗支出费用补贴，疫情防控相关的医疗机构设施建设、应急设备改造、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补助、应急防疫物资采购、疫情监测、基层党组织疫情防控工作等。支出途径呢？需要由相关单位提方案，政府批准，财政拨付，中间经过一系列行政流程。财政资金安排的项目目标往往是全面的、均衡的、宏观效果考量的、针对疫情应对总体需要的，同时也与各行政部门的职能框架相对应，并经由行政部门一级级执行。

社会机制则不同，它是宗旨导向、点对点、直接投入目标行动的，同时由于行动主体的多元性，是各种目标可能同时关注、平行运作的。比如在武汉“封城”的当天，武汉各大医院纷纷直接向社会发出求助信息。社会的捐赠意愿和社会组织的行动，由医院防护物资需求的信息直接启动起来。观察社会行动的特点，其一，反应点多。很多个人、企业、社会组织，看到武汉的需求信息，就各自开始搜索或询问资源、寻找衔接途径。其二，在行动中随时调试，形成分工和秩序。比如防护物资需求有规格要求，国内外标准模式不一，需要模板或审核；购买物资、运输、对接、到达，以及过海关、入仓库等过程，在组织过程中出现分工、分群；信息混杂，真假信息同存，在行动中识别、利用技术手段整合，在这个过程中，数据平台和信息平台也在建立。其三，直接满足需求。社会募集的物资，在最初各种通道还在摸索的阶段，通过个人带入、当地

组织运输、医院院长直接拉货等形式，直接投入使用。其四，关注“被忽视的声音”。社会组织有关注弱势的倾向，在纷杂的信息中，那些被忽视的信息，比如在武汉成为关注中心时，武汉周边的疫情严重地区其实面临问题更大；当关注重点在医院时，社区入户者、快递人员等高接触风险的群体防护问题也很突出；当大家都在关注疫情时，防疫控制带来的老弱日常病群体的脆弱性增加、居民饮食生活的维系可能困难等，也需要互助机制的帮助。其五，海外资源动员活跃，境外非政府组织（NGO）在资源衔接中起到重要作用。由于短时间全国一级响应，实际面临全面性的资源短缺，海外，特别是华裔社群、校友会等机构，响应强烈，调动了大量的资源。鉴于法律合规性的要求，这些资源的进入面临更大困境，获得合法性的境外非政府组织成为较好的资源对接平台。

可见，社会组织和志愿机制，在疫情反应中，具有独特的运行机制和行动特色。如果仅把它们看作财政资源的一种数量上的补充，而回到行政的整体性、全局性、层级性的运作机制，就不能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特性了。

二、对社会力量参与的“统筹”政策效应及调整

1月23日，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第3号、第4号通告，开通社会捐赠，受捐主体是市红十字会和市慈善总会，同时公告称暂不接受境外捐赠。民政部1月26日发布《关于动员慈善力量依法有序参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公告》，其中规定慈善组织为湖北省武汉市疫情防控工作募集的款物，由省、市两级的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5家组织接收，除定向捐赠外，原则上服从省、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的统一调配。

在疫情宣布的最初几天，社会力量的动员是快速的，内部分工和资源对接模式也很快出现，显示了部分社会组织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较成熟的运作模式。而且即便时间紧急，无论本土社会组织还是境外NGO，都意识到了合法性规范，很多也主动对接了当地的红会和慈善总会。但是对于境外捐赠的拒绝信息，和社会捐赠物资的统一接受政策，使得刚在形成中的社会参与秩序返回混乱状态，捐赠物资与一线需求的直接对接基本中断。另外，由于省、市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成为捐赠物资的汇集地，很快出现物资集散的“堰塞湖”，组织的资源分配能力和各种运作问题也成为媒体曝光焦点。进入物流公司，武汉市红会的资源才逐渐分发执行，1月30日红会第一次发布了社会捐赠物资使用公告，再过一周左右，防护服、医用口罩等核心防护物资才开始批量分配到各区指挥部，此时距“封城”已经过去一周时间，而直至今日，捐赠物资到最终使用者的使用情况尚未来得及公开。

2月14日，民政部再次发文《慈善组织、红十字会依法规范开展疫情防控慈善募捐等活动指引》，在新的指引中，要求慈善组织、红十字会依法规范开展慈善募捐，并在各地联防联控机制统一领导和部署下，根据疫情防控工作

的实际需要，充分尊重和体现捐赠人的意愿，合理分配使用捐赠款物。指引没有再提及捐赠物资的统一接收和使用，而是特别明确了依据捐赠人意愿，直接送达最终使用单位。这可以看作对早先政策的调整，更多体现了对社会组织运作规律的尊重。

三、“知会”模式：可以探讨的政府与志愿机制的协力模式

政策从“统一接收使用”到各自“依法规范运作”的调整，应该是看到实践中的物资分配效果，以及听到社会的反响声音。自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到2010年玉树赈灾，再到此次抗疫，社会捐赠物资的政府统一配置，在重大灾害救助或突发事件管理中，都是主要配置机制。为什么会如此呢？不能不说，与政府对物资“有序”使用的担心密切相关。

中国社会组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生路径，就带有较强的行政色彩。政府职能转型、机构改革，由业务主管单位组建社会组织，是中国社会组织发生的一条重要路径。虽然社会自发形成的组织不断增多，但“政府管社会”、政府做决策，仍然是最熟悉的惯性模式和日常经验。在紧急反应时刻，秩序的形成就很容易回到最熟悉的模式，也就是政府统筹资源、政府分配资源的模式去。

那么除了统一接受、政府统一配置外，社会捐赠物资的使用，有没有避免混乱、分配不均、配置失效的其他方式呢？要看到，多元分散的社会力量，在运作中是有自发秩序生成的，那么这种自发秩序的生成机制，如果延伸到与政府机制的对接，政府搭建顺应社会秩序的协调平台，是完全可能实现有序与志愿的协同的。

可以探讨的模式是：政府从资源统筹者的角色，转化为信息统筹者的角色。通过供需信息的汇总、公开、共享，在尊重捐赠者意向和各行动者选择权的前提下，形成资源配置协调、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协力作用。

相比于资源统筹模式，信息统筹模式可以称为“知会”模式。它的运行原则是：第一，社会捐赠物资不需要被统一接受，但要将进入区划的物资信息“知会”统筹部门，登记在信息平台；第二，政府对于配置资源的计划，或需求方信息，也统筹登记，“知会”社会，并可以给出引导性意见；第三，社会力量依据法律法规，合乎组织宗旨，尊重捐赠人意愿，则可以自由行使选择权，并将在政府指引范围内的资源配置“认领”情况，反馈回统筹部门，同样登记在信息平台，同时，通过信息化技术手段，这些信息可以做到动态平衡。这样的信息平台，也不一定需要政府自己操作，可以交由社会机制或企业机制来实现。其中政府角色最重要的转变，应该是在观念上。

对于红十字会、慈善总会这样的组织，由于其本身运作机制非常靠近行政性，政府可以保留有更强的指导权。即便对于这些组织，政府的指导也是以方向原则为宜，而不是具体代替决策、将社会组织视为类似物流公司的执行者。

总之，社会组织的独立决策权责明确，才有利于其运作的功能发挥和效果责信。

当志愿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慈善法》以及社会组织的管理条例、公开透明办法、行业自律、公众监督等社会监管机制，针对境外 NGO 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才能发挥作用，贡献于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最终效益。

总之，政府对社会力量参与的开放态度，更多利用信息“知会”而不是资源统筹方式，让财政资源和捐赠资源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作用，在抗击疫情以及疫后更广泛的社会秩序恢复中，都是政府与志愿机制形成协力值得注意的方向。

作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贾西津

来源：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U3lnFRwhNBR1GCTfKiOUOQ>

王瑾：更愿在边缘看公益圈

王瑾，NGO 2.0 创始人兼秘书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比较媒体系讲座教授、新媒体行动实验室主任，同时也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客座教授。2009 年，她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周荣庭教授一同创办了 NGO 2.0 这个以技术公益为核心的公益组织，带领团队助力中国草根公益组织的信息化能力建设。

1950 年，王瑾生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从小家境艰难。尽管如此，对子女期望甚高的母亲还是执意将王瑾送进了台北市知名的贵族学校就读。由于当时和她一起读书的都是达官权贵的子女，家境不好的王瑾在那里很难得到承认和重视。也正因如此，她不关注所谓的“达官贵人”，反而对中下阶层的人充满悲悯和关怀。王瑾曾在美国杜克大学执教 16 年。在那里，王瑾发现杜克大学有一些精英学者会很慷慨激昂地为一些弱势群体发声，但实际上他们阐述的一些理论性问题和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这让王瑾很难接受。2001 年，王瑾离开大师频出、人文学术氛围浓厚的杜克大学，选择了向她抛出橄榄枝的麻省理工学院。

对于 NGO 2.0 所做出的努力，腾讯创始人之一、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发起人陈一丹曾评价道：“NGO 2.0 生于批判，兴于创新……正是因为有着像 NGO 2.0 这样的机构不断倡导‘互联网+公益’的模式和理念，互联网公益才有了今天蓬勃发展的局面。”

王瑾始终保持着冷静和清醒。她告诉《公益时报》记者，研究学术和文化的人应该经常站在边缘批判主流，而不应被某些光环和虚荣所迷惑。

一、筹款和人才是难点

《公益时报》：NGO 2.0 已经走过 10 年公益旅程，这中间哪些坎是比较难过的？

王瑾：可以说，NGO 2.0 是国内第一家通过推广技术公益项目做公益的公益组织。我觉得直到现在，大家对何谓“技术公益”这个概念并不清楚，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有资源的人其实对这件事并不懂。尽管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互联网公益的信息化非常重要，但到目前为止，这方面进行专项资助的非常少，因而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困难始终是两个：筹款和人才。

《公益时报》：关于筹款的困难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王瑾：现在基本上我是以 MIT 新媒体行动实验室为核心进行筹款。当然，这也是一把双刃剑，但总的来说好处大于坏处。比如我在国内的时候，筹款时可能就相对容易一些，但机构下属员工去筹款，人家就未必那么待见了。

优点就是，NGO 2.0 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国内搭建技术公益的生态圈，这个生态圈的构成需要各种跨界资源来支持，而我 MIT 新媒体行动实验室的品牌就有这种聚合力。比如说，只要与其相关的大学、创客社区或者互联网公司，因为有我这个身份，更容易将这些要素聚合在一起，搭建起一个多元化主体的技术公益平台。

二、也谈“公益产品化和规模化”

《公益时报》：目前国内好像有一种比较主流的声音，就是“公益一定要做成产品”，你的观点是？

王瑾：首先，大家对公益产品的理解不同。认为“公益要打造成产品”只是目前公益生态圈里的思路之一，这种思路当然也很好，我也不否定。可是问题是当这种思路变成主流的时候，势必会过滤掉其他一些多元的声音。要知道，任何一个行业想要健康蓬勃地发展，不能只有巨头。就像我经常引用敦和基金会陈越光老师说过的一句话：“公益行业的发展不能只有大树，没有草地。”最初我们培训中西部的公益组织做技术公益方面的提升，就是帮助最弱的群体逐渐懂得应用自媒体，替他们寻找本地的各种资源，赋能予他们。

其实我们 NGO 2.0 一直在做的就是搭建平台的事情，并非单纯做产品。有平台的助力，这个行业才能可持续。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各方主体能够携手行动，成立一个技术公益联合机构，更好地推动公益生态发展。

我也注意到，现在另外一种声音就是“公益规模化”。实际上，MIT 媒体实验室既不注重规模化，也不追求产品化，他们唯独看重的是创新，汇聚的是创新能量。他们更渴求的是创新带来的那些美妙的灵感，这些东西让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更加感性、兴奋，带来更多启发。

《公益时报》：你如何界定商业与公益的关系？

王瑾：这里面需要一分为二地看。首先我们说“商业向善”一定是应该大力倡导的，企业需要践行社会责任，而且多多益善。反过来说，公益机构是否一定要变成商业化的运营才有发展，这可不是说你想要变就能变的。另外，有的机构

打算或者确实可以发展成社会企业，但你不能说这是唯一的选择。

很多人都以为做社会企业很容易，绝非如此。但问题是现在很多大的公益组织都认为走这条路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甚至是唯一的途径，那显然探索其他道路的机构就拿不到资金了，因为这个行业的资金流动毕竟有限。

也有些公益人对公益组织向社会企业蜕变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这个我也不同意。说到底，公益和商业的关系其实没有一个绝对标准的答案，我认为这种选择是根据各机构的实际发展状况而定的。

三、“未来村庄”：技术公益升级版探索

《公益时报》：NGO 2.0 的十年发展与你当初的设想一致吗？

王瑾：真的很不一样。最初我们就是想帮助中西部地区的草根公益组织做培训，提升他们的信息化能力。后来越做越发现，其实他们最匮乏的是资源，于是我们又慢慢向这个方向倾斜和努力。但无论怎么样，我们的初心始终没变，就是赋能于草根公益组织，助力他们发展。截止到今天，这个项目我们已经做了 10 年，大约培训了 1700 多家机构，从最初面向中西部的社会组织培训到今天面向全国的社会组织来培训，成果还是很大的。

“技术公益”这个概念，中文好像很难阐释得特别清楚，但英文比较直接，就是 ICT4GOOD，ICT 是信息和通讯技术的简称。我们前十年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前两点 I 和 C，即互联网信息技术和传播，任务是提高社会组织的信息化组织和传播能力。我们另外一个旗舰项目是“技术公益马拉松”，体现的是 T 技术这部分内容，就是科技公益。从 2013 年至今，我们已经做了 8 场技术公益马拉松，目的是对接创客和公益机构，通过协同设计一起探索解决问题的方式。

《公益时报》：你们最近开始尝试的“未来村庄”公益项目和这部分内容有关吗？

王瑾：“未来村庄”是我们在此基础上推出的技术公益新项目，它强调的是从下而上的社会实践和创新，它所帮扶的对象不是一二三线的城市，而是贫困地区的村庄，是广义的技术、设计与扶贫理念相结合，在村庄落地的一种模式和实践。

假如某地村庄发展过程中遇到某一个具体问题，公益人和技术人员就坐在一起，商讨如何解决该问题。在此过程中，集结多元的创客和研究者，参与者包括村民、高校老师，大学生、高中生、设计师、工程师等，大家以协同设计的方式参与其中，最终的愿景是共同助力其发展成宜居、生态可持续、科学而又具有人文情怀的村庄，其形态和成果充分凝聚了科技、能源、硬件、材料、建筑、生物生态、设计、公共艺术等多学科多领域的智慧结晶。

《公益时报》：听上去这个“未来村庄”很“高大上”，问题是基层认知度和接受度高吗？

王瑾：“未来村庄”是一个开放的入口，所有的创客都可以在此沟通和碰撞。它是互联网精神的一种极致体现，强调的并非个人创新，而是个人与社区互动之后产生的创新和能量。

目前我们已经和一些基层政府进行了对接，他们对此表现出浓厚兴趣。我们还去了雄安探访，寻找合适的实验基地，我觉得只要所有的元素都到位且契合，都能发挥其良好的效应，那么未来这条路就值得探索，也会很精彩。

《公益时报》：你是否注意到这十年来中国公益慈善的发展变化？

王瑾：我来自麻省理工学院，作为科技大学的发展方向来说，其本质就是要通过科技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好。可以说，目前中国互联网参与公益的创新性和多样化是远远超出美国的，比如说支付方式、比如说互联网筹款、募捐，还有最近几年开始推广的99公益日等。我们发现国内的技术人才开始越来越多地渗透公益、推动公益，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技术公益的发展水准也进入领先行列，其实当下就技术公益的层面来看，与美国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我希望中国能够涌现出更多重视技术公益的组织，把一些看似基础性的技术常识和工作程序加以推广和普及，并不断挖掘和培养出更多的技术公益人才，为链接一个多维健康的公益生态圈一起努力。

来源：公益中国网

<http://www.pubchn.com/news/show.php?itemid=94597>

★山商实践探索

正规高学历公益慈善事业人才联合培养的可持续问题

摘要：高校和社会机构联合进行的正规高学历公益慈善事业人才培养，由于机构领导调整、经费保障不稳定、缺乏优秀运营团队和专业调整等不利因素，面临严峻的可持续问题考验。要根据实际抓住重点，预先采取措施进行风险防范。

关键词：公益慈善人才；联合培养；可持续性；巩固提升；

基金：山东省本科教改项目(重点)：“嵌入式”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及质量保障机制研究——以公益慈善事业管理专业为例(编号:Z2018X082)；

高水平公益慈善事业人才，是高质量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关键力量。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高校和社会机构等采取联合培养等方式来实现正规高学历公益慈善事业人才培养目标，但受多种因素影响，如何保障联合培养机制的可持续性，已经成为高校和社会机构等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相对稳定的联合人才培养机制应当具有的基本条件

纵观国内外较为成功的联合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突出的一个核心要素，则

是在“联合”二字上下功夫。

1. 权责能明确的合作章程，这是联合培养的依据。权责能明确，要求合作各方的权利、责任、能力，特别是经费来源以及争议解决等事宜必须通过合作章程清晰界定，各方都要以此为依据和目标进行运作。合作章程明确，能够给各方提供明确的行动路线、能力建设目标和行为预期。

2. 稳定持续的联合经费投入机制，这是联合培养的生命线。联合培养的经费一般通过资金、物资、场地、平台等不同形式，由参与联合培养的各方共同承担。

3. 具有事业家精神的优秀管理运营团队，这是联合培养的关键。项目执行与协调的关键，则在于能否形成一个具有事业家或企业家精神的优秀管理运营团队，能否具备持续运营、高效运营的思维和能力素质、事业品格。

4. 稳定多元的联合专兼职师资队伍，这是实施联合培养的根本。稳定多元，是指师资队伍的核心力量要在培养期内相对固定，而这种相对固定则建立在师资力量来源的多元化保障上。联合培养的师资人才等，如此形成充分的备选师资数据库、人才库、智囊库等，以备师资要求变化与人员流动之虞以及应对各种不确定性。

5. 科学系统的联合人才培养方案，这是联合培养的实施途径。培养方案能够精准体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及教育受众的个性化成长需要，以“通”为主，把“通”与“专”很好的融合起来。重在培养教育受众的深刻学习能力、思考能力、发展能力、应变适应能力，而非局限于单纯具体的知识点传授。更为重要的是，培养方案的制定修订，要始终在各方联合参与的基础上进行。

6. 成熟配套的联合课程体系，这是联合培养的传导介质。课程体系成熟配套，既包括延用当前相对成功的、主流的课程体系，更指基于当前专兼职人才力量优势开发的具有自我特色的课程种类。主流课程体系可以保障专业人才培养符合普遍发展规律或趋势，而自我特色课程则可以充分结合参与各方的具体优势经验，以促进人才个性化选择与成长。

7. 实用高端的联合教育平台基地，这是联合培养的实施资源手段。实用高端，侧重教育平台或基地的实用性和先进性。既然是多元联合，就可以从各方的社会网络中优选成熟、具有社会影响和品牌效应的资源与平台等开发建设成优良的联合教育平台，给人才培养提供多样化的、具有前瞻性引领性的资源选择。

8. 有针对性的联合项目训练系统，这是联合培养的内源动力。针对性，是指各方既能根据自我发展需要，又能考虑经济社会需要和人才成长需要，从战略问题、学术问题还是应用难题等角度，基于科学与战略研究——工程开发——实际执行操作链条，联合设立训练项目、科研项目等等，通过项目训练提高师资队伍的核心能力和人才训练水平。

9. 协同高效的成果转化推广体系，这是联合培养的可持续保障。协同高效，

要求合作各方能够及时总结联合培养的经验教训，推出系列成果，通过成果转化形成持续的正向反馈和价值激励。同时也能吸引更多的优秀力量加入联合机制。

二、当前公益慈善人才联合培养面临的可持续问题

1. 机构领导更替导致合作中断。每届领导都有自己的优势资源和关注目标领域、思维习惯，因此任何一方的领导更替都有可能导致合作意愿衰退直至中断。

2. 经费投入难以保障导致合作无法进行。联合经费来自高校教育经费投入和社会机构等的投入两大部分。特别是联合的各方吸引、接收与付出经费的目的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经费投入期间不固定和拨付不及时、经费预算执行缺乏公开监督的情况下，社会机构持续投入的积极性将会遭受很大压抑。另外，除国内当前对接收社会融资兴办正式学历教育的相关规定不明朗外，高校系统内部的竞争和其本身的知名度、影响力也是影响联合培养经费投入的重要因素。

3. 缺乏优秀运营团队导致联合难以落地。协同高效持续的运营是公益慈善人才联合培养项目实施的关键，但来自并最终归之于相对封闭的象牙塔的高校专业教师，并不像社会机构那样具备充足的项目运营能力或较高的项目运营水平，更缺乏充分的运营意愿和动力。因此优秀的联合运营团队的组建是公益慈善人才联合培养面临的重大难题。

4. 缺乏有效的成果转化推广体系导致后续激励不足。高校与社会机构的联合培养，目标目的、成绩绩效标准都有差异。高校目前重视的是报考率、就业率等短期目标，社会机构重视的服务目标、社会效益甚至也有潜在的经济效益。如果不能形成有利于双方的、较一致的成果认定与转化推广体系，将最终无法形成共赢或多赢局面，进而后续激励不足。

5. 高校专业调整因素导致联合无法实施。公益慈善事业人才培养当前主要是嵌入到社会工作、社会学等法学类或公共事业管理等公共管理类专业中进行的，尚未形成有效合法的教育“户口”和认知度。而且高校学科专业现在面临或主动或被动、或定期或不定期的调整问题，相应专业的停招、合并等将导致联合培养陷入实施困境。

此外，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社会机构自身面临的不确定性也是影响联合培养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

三、保障公益慈善人才联合培养可持续性的主要对策

根据前述基本条件和主要问题，拟重点从稳定团队、经费绩效监督、加大成果激励、预警预控等方面采取措施，保障公益慈善事业人才培养的可持续性。

1. 构建稳定的联合运营团队。以高校教师和行政人员为主，构建稳定的联合运营团队。高校人员与社会机构人员相比更加稳定，可以之为凭借并适当吸收一定比例的社会机构人员，在加强其联合项目运营能力培训的基础上，形成稳定的联合运营团队。即使社会机构人员变动，或机构领导人员变化，也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通过稳定的运营团队或项目执行团队减少不利影响。

2. 实行经费绩效公开监督机制。对教育部门、社会机构或社会渠道投入的联合培养经费，通过招纳出资代表、定期公开经费执行报告和绩效报告，以及专门的审计监督报告等方式接受利益相关群体以及相关领域社会监督。这样可以提振社会机构、出资人、人才需求方等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的投入积极性。

3. 加大成果应用转化激励。一方面，要构建联合培养各方才能接受认可的成果绩效认定标准。另一方面，采取联合成果推介方式，如公益慈善人才联合培养皮书、联合培养人才推介会、高峰论坛、项目库公开招标等，加大培养成果的宣传推广和提升应用价值。

4. 构建联合培养风险点预警预控体系。重点针对领导变化、机构调整、专业调整、社会需求、人才成长中的不利情况和重大变化趋势，构建预警体系和应急预案。通过自我评估或第三方评估等方式，定期评估联合培养的风险隐患变化情况，预先采取预防巩固和提升转型等措施。

作者：山东工商学院 薛春 甘金球 王鑫 杨晓龙 李亚军 秦敏

来源：《中国校外教育》，2020. 09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AUTO&filename=XWLL202009023&uid=WEEvREcwSlJHSldRa1FhdkJtNEYwbVZhcK1jdE4xK2xDc0xUZWFzWnB1R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g3OThyTIBUckhZckc0SE5ITXBvOUhaNFI4ZVgxTHV4WVM3RGgxVDNxVHJXTTFGckNVUjdxZll1Wm1GeTNoVzc=](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AUTO&filename=XWLL202009023&uid=WEEvREcwSlJHSldRa1FhdkJtNEYwbVZhcK1jdE4xK2xDc0xUZWFzWnB1R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g3OThyTIBUckhZckc0SE5ITXBvOUhaNFI4ZVgxTHV4WVM3RGgxVDNxVHJXTTFGckNVUjdxZll1Wm1GeTNoVzc=)

儒家慈善思想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教学的建议

摘要：儒家慈善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家慈善思想，对于强化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的教学效果，丰富“原理”课的文化底蕴，加强“原理”课的价值引领，有着现实意义。在理解儒家慈善思想“仁爱”内核的基础上，把握好儒家慈善思想融入“原理”课的切入点，做好教学设计，沿着文化传承、辩证统一、道德塑造和知行合一四个向度，通过理论讲解和实践教学相结合，可实现儒家慈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自然融合。

关键词：慈善思想；儒家；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基金：2018 年度山东省社科普及应用专项“以色列爱国主义教育研究及启示”（项目编号：18CKPJ13）；山东工商学院 2019 年财富管理特色建设年度招标项目“大学生慈善现状分析及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19ZBKY022）的阶段性成果；

儒家慈善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慈善思想和慈善事业的重要基础，是在民族发展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优秀文化。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将儒家慈善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应当成为思政课教学新的增长点，这既有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又有益于培养我国大学生的慈善意识和道德品质，提升思政课的价值引导性和教学实效性。笔者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以下简称“原理”课）的授课教师，结合教学实际，对儒家慈善文化融入“原理”课提出一些思考与建议。

一、准确把握儒家慈善思想的合理内核

中国慈善传统源远流长，其中以“仁爱”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内容丰富，影响深远，成为中国古代慈善思想最主要的渊源。“仁”是儒家思想中具有广泛意义的道德范畴，“仁”字在论语中共出现了 109 次，是儒家慈善思想最基本的出发点。“仁”的核心内容是“爱人”（《论语·颜渊》），体现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相互同情等人际交往关系。这种人际交往，由“亲亲”发展到“泛爱众”，“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最终要达到爱天下众生，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在实践层面，孔子还强调要通过“忠恕之道”实现“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做任何事情都应当推己及人，“忠”“恕”实际上是爱人的规范。也就是说，人们在行仁义之时，并不是为了什么目的，只是做应当做的事，真正的意义在“做”的过程中。孟子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爱”学说，宣扬一种充满怜爱和悲悯的“恻隐之心”，亦即“不忍人之心”。这种“恻隐之心”强调人们行善的心理动机是发自内心的“仁爱”之心，是人性的自然，每个人都具有帮助他人的心性与能力。在实践方面，孟子将孔子的“泛爱众”之说发展成为“仁民”，强调以民为本，高度概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十字箴言。要求统治阶层兼顾贫富阶层的利益，反对贫富差距过大，主张“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统治阶层必须“与民同乐”，施行爱民之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仁之政”（《孟子·公孙丑上》）。在“以民为本”思想的推动下，中国古代官方慈善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官府便实行平籴政策，即丰年买粮，灾年官方卖出粮食，用于赈济灾民，缓解饥荒。为了增强国力，各诸侯国都鼓励生育，实行恤幼政策，对待老人，继承三代以礼养老的遗制。汉代以来，随着儒家学说成为主导思想，儒家慈善思想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得到广泛施行，

利用国家力量赈济、养恤、尊老、携幼的举措日渐成熟。

二、儒家慈善思想融入“原理”课的意义

1. 慈善文化融入课堂是党和国家的明确要求

慈善意识对慈善事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尽管世界各国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差异，但都注重宣传和培育慈善意识。我国历来重视慈善意识的养成，更将慈善教育纳入国家政策层面，鼓励慈善教育进学校，进课堂。《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3—2015年）》把加强慈善文化建设作为加快发展慈善事业的重点任务之一，明确指出：“以学校、社区为主要载体，将慈善文化融入课堂，挂入社区宣传栏，开展形式多样的慈善教育宣传活动。加强慈善学科建设，制定慈善教育计划，指导学校在德育课程中培育慈善意识，弘扬慈善行为，并纳入学生素质评估中。”2016年9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明确提出：“国家采取措施弘扬慈善文化，培育公民慈善意识。学校等教育机构应当将慈善文化纳入教育教学内容。国家鼓励高等学校培养慈善专业人才，支持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开展慈善理论研究。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应当积极开展慈善公益宣传活动，普及慈善知识，传播慈善文化。”这些都是对大学生开展慈善意识教育、培养慈善人才的政策保障和理论依据。

2. 是弘扬和传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内在需求

当前，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我们要坚持文化自信，立足中华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先进的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要建立在既有的文化基础之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才能开辟未来，善于集成才能创新。”中华民族传统是我们的“根”和“魂”。《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儒家慈善思想成长于中华民族独特的生存环境中，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绵延不断的文化主流，蕴含着独特的文化特质和精神理念，是经过岁月变迁的浪涛保留下来的，是与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紧密结合并同向而行的。儒家慈善思想以“仁爱”为中心向外散发，以人为本，强调“和谐”“友善”“尊老”“爱幼”，体现着中华民族高超的生存智慧和卓越的精神追求，蕴含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观。这与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共通的，具有育人的属性。从儒家慈善思想既可以挖掘慈善的根本动力，理解慈善的丰富内涵，寻找建设现代慈善事业的智慧之源，又可以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3. 是强化“原理”课的教学效果的有效路径

当前思政课教学存在对传统文化关注不足、文化吸引力不够的问题。教学的针对性不强，导致课程吸引力和感染力不够，尤其是“原理”课，抽象性和思辨性很强。要讲好“原理”课，让学生喜爱并终身受益，就必须增强课程的文化底蕴和价值自信，增强课程的亲和力和吸引力。儒家慈善思想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孔子、孟子、荀子都是学生熟悉的儒家学者，对他们的言论耳熟能详。在课堂教学中通过案例讲授、分组讨论和角色扮演等方式，将先秦儒家智者们的慈善之思传递出的“仁爱”价值观念融入“原理”课教学，把抽象的事实和鲜活的慈善案例相结合，既帮助学生理解哲学原理，又提升“原理”课的价值引领，增强社会责任意识。

三、抓住结点做好教学内容设计

“原理”课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科学方法，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难度较大，对学生的抽象思维和思辨思维要求较高。这一门课的特点不在于讲好理论本身，不在于“为了理论而理论”，正如学者指出，这门课的终极价值指向人的内在心灵世界，以改造主观世界、进行思想塑造为落脚点。正确处理理论讲授与价值观传递之间的关系，成为讲好“原理”课的关键，儒家慈善思想的融入，是协调二者之间张力的一条有效路径。把儒家慈善思想融入“原理”课，具体说来从理论上是要通过原理的分析、解释让学生充分地认知、理解儒家慈善思想的要义，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对以往的慈善思想进行解读和改造。要将儒家慈善思想融入“原理”课教学，首先体现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处理好几个具有直接对应性的关系，我们称之为“接口”。

1.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认为，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世界，自然界、人类社会及人类思维领域，都处在相互联系和永恒发展之中。人类社会就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其中每一个人都不是单独的存在，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他人和社会，和谐社会的形成取决于每个人当下的点滴行动。这就要求我们善于分析事物的具体联系，确立整体性、开放性观念。在实践活动中，要把个人放在相互联系的环境中理解和考察，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要意识到个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整体进步，出于对自身发展的考虑，也应当为社会贡献力量，保持集体主义意识，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中国传统慈善行为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由“亲亲”到“泛爱众”再到“天下众生”，呈现出的是以家庭为圆心，向外扩展的对他人之爱，就像石子投入水中，层层推出，一圈圈扩散开来。从《礼记·礼运》记载的孔子的“大同”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到孟子主张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梁惠王上》)不难看出,以“仁”为中心的儒家慈善思想,不仅仅局限在血亲范围,体现的是“我他”关系,基于爱对他人的关怀,是构建良好人际关系的准则,更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2.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存在一些“固有的难题”,比如社会需求增长与社会现实生存环境之间的矛盾,是东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慈善作为扶贫济困、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是人类回应这一难题的重要传统。不管是儒家以“仁爱”为基础的慈善思想,还是基督教以“博爱”为基础的慈善思想,都给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普遍的理想和共同的道德原则,慈善是人类社会跨时空的价值基础。唯物辩证法指出,具体事物的矛盾及每一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有特点,矛盾的特殊性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本质,是世界上事物之所以有差别的根据。中西方社会基于各异的公共历史、道德价值和政治传统等,慈善思想也存在显著的差异而各具特殊性。就慈善动力而言,儒家慈善思想主张“仁爱”,由仁而趋善。善良的意志,“不忍人之心”是慈善行为最重要的动力。基督教慈善思想主张“博爱”,以对“上帝”的信仰为动力,保持“谦虚”“忏悔”“谦卑”等崇高的道德境界。慈善作为“赎罪”的形式,是自我圣化接近上帝的重要途径。二者相照观,儒家慈善更强调慈善的理性与自觉,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道德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基督教慈善思想更强调超越力量的外在约束,关注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二者相照观,儒家慈善思想对于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当看到,现阶段我国社会的慈善事业,尚不能完全依靠道德约束,还应当借鉴西方的经验,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加强慈善的外在约束,建设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保障。

3. 人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价值在于为人类社会做贡献,只有在人与人的相互交往中,人的自我价值才会通过人的社会价值表现出来,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是相统一的,个人和社会相互依存、相互制约。马克思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这表明,人不是遗世而独立的,人的所有活动都与他人与社会发生着联系。同样,社会是由单个人组成的,是由众多个人组成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有机整体。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马克思总结人的本质不在于人的自然属性,而在于人的社会属性,“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必须处理好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社会成员之间必须相互帮助,相互关爱,共同促进社会的进步。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反过来又为每一个人更好地发展,更充分地实现自身的价值提供了平台。

马克思主义对人的价值的观点，与儒家慈善思想的要求完全一致。儒家智者要求把慈爱善良之心化为行动，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去改善人们的生活处境，去提升人们的生活能力，体现的是人性的正能量，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正价值。个人价值只有在更广阔的社会范围里才能得到充分实现，积极奉献社会，帮助他人，才能获得更高的成就感。儒家经典提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要求人们从己做起，心存仁爱，以礼待人，从身边做起，随时随地行慈善，才能成为受他人尊敬的“君子”。同时，又要求政府层面，“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为政为仁，放眼天下，关心民众生活疾苦，方能实现社会和睦安宁。儒家慈善思想，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创造了一种维系和共享资源和情感的方式，有助于个人实现自我价值，也帮助构建和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

4.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社会意识是人们交往的产物，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表现在：第一，先进的社会意识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对社会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二，落后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起着消极的阻碍作用。慈善思想是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受一定物质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和规定，又反过来影响一定时空下的社会存在。儒家慈善思想源于先秦哲人们对百姓生活疾苦的关心，诞生在小农经济的中国，打上了宗族、血亲的深刻印记。受此影响，慈善在很长时间里囿于乡间邻里。然而儒家慈善思想作为一种观念体系，具有历史传承性，儒家慈善思想所体现的个人道德修为、社会责任意识和悲天悯人情怀，符合当今社会主流价值观，尤其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能够对当今中国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这提醒我们，在学习和传承儒家传统慈善文化时，要发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传统文化加以升华，从“小爱”走向“大爱”，从传统慈善思想过渡到现代伦理精神。

四、儒家慈善思想融入“原理”课教学的原则

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文化的创新型转化，是时代的诉求，也是教育的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四个“讲清楚”，即“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

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就儒家慈善思想融入“原理”课而言，也体现为四个“向度”：

第一，文化传承向度。讲清楚中华优秀文化的民族特质和悠久历史。中华优秀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华大地这一方水土滋养出了儒家慈善传统，早期儒家智者们的“仁爱”之思，由“爱有等差”到“不忍人之心”，再到“亲民爱物”，构成了中华民族仁爱之思的完整体系，至今仍对归止文明发展方向、至善的理想目标、仁爱的道德规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讲清楚儒家慈善思想的传统内核和当代价值，是整合儒家慈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正确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基础。

第二，辩证统一向度。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需要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更要立足国际视野，聚焦时事热点，讲清楚东西方慈善思想的差异，展开文化沟通与碰撞，在对比的视域中，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辩证地看待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势与不足。通过异质文化的对比与交流，更能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力。

第三，道德塑造向度。基于人类生存的视野和个人价值视角，从更高维度塑造学生的道德品行。在马克思主义教学中引入儒家慈善的内容，引发学生对人类需求及更普遍的人类幸福的终极思考，引导学生对科学共产主义进行认知与展望，使“原理”课朝着它应有的方向前进。学生的道德水平得以提升，优秀的传统文化及我们想要的未来，便会更好地传递下去。

第四，知行合一向度。儒家慈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合，可以帮助学生了解优秀传统文化，同时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然而认同并不等于奉行，慈善意识的教育，最终要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效果，使之成为学生的自觉意识和行动指南。要结合理论教学，开展一定的实践活动，在实践中提高践行“仁爱”慈善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断提高自身修养，把慈善意识化成内在的道德情怀。这样既丰富了“原理”课的实践内容，又帮助学生树立公益精神，积极投身慈善事业。

作者：山东工商学院 孙燕

来源：《文教资料》，2019. 30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LAST2020&filename=WJZZ201930070&uid=WEEvREcwSIJHSldRa1FhdkJtNEYwbVZhck1jdE4xK2xDc0xUZWFzWnB1R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AxMjIxTHV4WVM3RGgxVDNxVHJXTTFGckNVUjdxZl11Wm1GeXpsV3IzSU1pZlJkTEc0SDlqUHI0OUNaSVI4ZVg=](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LAST2020&filename=WJZZ201930070&uid=WEEvREcwSIJHSldRa1FhdkJtNEYwbVZhck1jdE4xK2xDc0xUZWFzWnB1R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AxMjIxTHV4WVM3RGgxVDNxVHJXTTFGckNVUjdxZl11Wm1GeXpsV3IzSU1pZlJkTEc0SDlqUHI0OUNaSVI4ZVg=)

成功者从不靠偶然的机遇：我读《财务自由之路 3》



《财务自由之路 3》是《财务自由之路》系列的第三部，作者是德国理财大师博多·舍费尔与其投资顾问贝恩德·莱特根，这本书主要讲述投资者如何设计适合于自己的投资组合体系，是一本关于投资入门指南的书籍。

《财务自由之路 3》共分为十四章，开始阅读吧！

第一章 “目标：至少 8%~12% 的理财收益”

这一章里，舍费尔告诉我们更高风险能相应拥有更接近财富的机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矛盾的是一些最杰出的投资家和企业家从不做冒险的事情，他们只单单投资明显能赚钱及显然正确的项目。

舍费尔提出，如果谁还认为 8%~12% 或更高的收益率不可能或甚至将其视作赌博，只能证明这人极其不了解外部世界。几乎在整个工业化进程中，8%~12% 的目标收益率早已成为应达成的最低利润限度。

我们可以通过学习拥有一个高财商的理财头脑，拥有理财头脑是获得 8%~12% 甚至更高年收益率的前提条件。如何提高财商，从而拥有一个理财头脑呢？我们需要了解以下三条重要的准则：第一，必须将只有有形资产能让我们变富有这一点内化于心；第二，必须清楚什么时候是投资，什么时候是投机；第三，应该在负债前先开展投资。

第二章 “德国人为什么在理财方面一塌糊涂”

本章里，舍费尔首先列举了美国人的资产分配数据以解释富人为什么越富、穷人为什么越穷。他认为理由有三个：（1）有钱人在有形资产上投资力度大；（2）有钱人的不动产比重比穷人低得多；（3）有钱人很少产生消费债务。

随后，舍费尔列举了德国人 2006 年的资产分配数据以说明德国私人家庭的投资情况。舍费尔指出，德国人的确有 70% 用于货币资产投资，他们将资金最大的部分用在了对资产增长毫无用处的地方，而在股票和基金上的投资份

额太少了。他认为，德国人这样投资背后的三个原因分别是完美主义、恐惧和对国家养老金盲目的信任。这三个因素阻碍了德国人去获取本应得到的收益。

第三章“获利方”

本章中舍费尔提出，富有就是资本足够大，让我们完全可以靠利息来生活。只要还没有拥有这只会下金蛋的鹅，我们就只能是一台赚钱机器。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拥有一台赚钱机器，要么必须为了生活而不停地赚钱。

风险和收益这二者通常以相同的比例增长。但想要实现每年约 15%的平均收益率，根本不必去承担非常大的风险，你只需划拨相对较少的一部分钱投资于高风险项目。不是每一次投资都必须保持 15%以上的收益率，只要通过理智地分散投资，保持投资组合中部分产品达到超水平的收益率便足够了。

舍费尔提出乐观心态助力成功，但我们不能只靠乐观的心态，还应了解自己投资的产品，特别是当我们期待收益率在 8%以上的时候。也就是说，要保持持续关注。

第四章“灵活收益来源的三大基石：股票、股票市场和投资基金”

过去长期保持 12%或更高年收益率的投资形式是股票。舍费尔提出，股票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手段，可以让我们尽享企业股票增值带来的利益，却不用承担企业的全部风险。但股票价格总是受情绪因素影响，这可能引发短期内股价的大幅波动，因此股票应被看作长期的价值投资。舍费尔建议，应该至少 5 年或最好 10 年内不要动这笔投资在股票中的钱，在这段时间内几乎所有的短期影响都将不值一提。

股票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投资工具，如果打算通过直接投资股票获益，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包括时间、资金、知识、自制力和乐趣。如果具备这些前提条件并且遵守基本的投资原则，就能从股市中获得不错的收益。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天生具备这些特质，在投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地发展完善我们自己的能力。

舍费尔认为在投资陌生市场和行业领域时，投资基金比投资单个股票更有优势。他认为基金具备一条很简单但十分重要的特点，即投资专家可以取得比我们大多数人更为丰厚的收益回报。

原则上，几乎没有哪一种投资形式不能用基金的形式来呈现。基金的种类足以适合各种投资个性、不同的风险认知和不同的投资年限。其中股票基金能够满足五个重要的投资原则：高安全性、高舒适性、当天可支配性、长期收益率保持 12%和缴税优势。

虽然投资的股票基金每天都可以申请提现，但是股票基金依旧属于一种长期性的投资方式。因此，舍费尔建议投资到股票基金中的资金最好十年不去动用。

可如何利用投资基金呢？舍费尔建议采取以下五种方式：

第一，一次性投资。我们可以一次性投资一定数量的基金，之后可以随意加投资资金。但是不管对于首次投资也好，还是后续加投也好，都有最低金额的限制。

第二，基金定投。基金定投可以让我们定期地每月、每个季度或者每年向基金中投资一定数量的金额，就如同买入人寿保险一样。

第三，依靠金蛋生活。如果依靠储蓄来生活，或者说不得不依靠储蓄生活，就可以事先确定好每月或每年固定抽出一部分储蓄的利息来投资基金。

第四，资本公积金。在德国，可以投资资本公积金中的基金产品，当然这种投资方式要求必须连续储蓄 6 年的时间，并且持有基金份额满 1 年。

第五，借助投资基金来融资。在同样的投入情况下，怎样最大限度地缩短融资时间？此时，投资基金和选择合适的银行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五章“从蜗牛到老虎：一览投资的丛林”

资金安全是我们投资时的重要标准之一。在本章舍费尔给我们阐述了“波动性”这个概念。波动性描述的是一段时间内收益率的相对波动幅度。但他也提出，仅仅依靠波动性进行风险提示是不够的，至少还应关注交易行情周期。另外，波动性只能通过过往数据进行测算，这就意味着这一数据在未来也可能与当前的测算结果大相径庭。

如何进行风险划分呢？在本章里，舍费尔将所有的投资产品分为 6 个风险等级，并幽默地用蜗牛代表风险等级 1、用乌龟代表风险等级 2、用骡子代表风险等级 3、用大象代表风险等级 4、用马代表风险等级 5、用老虎代表风险等级 6。

蜗牛是风险等级 1 的标志，什么都无法撼动它。蜗牛代表的是最大的安全性、非常低的收益、很小的波动性。这类投资产品包括货币市场基金及与之接近的基金，也包括储蓄存折和定期存款。

乌龟是风险等级 2 的标志，它代表的同样是高安全性和低波动性。在极少情况下，乌龟会脱离正轨，短期内走入错误的方向，但它总能很快重返正道。这类投资产品包括国际货币市场基金和与之相近的基金、中长期国际和欧洲定息债券基金。此外，保本型基金、开放型不动产基金、德国和英国人寿保险及年金保险也属于此类。舍费尔建议这类产品的最低投资年限是 2~5 年。

骡子是风险等级 3 的标志，它们很难驾驭，但有时候跑得飞快。骡子代表的是安全到中级风险之间，但它可能出现强烈的短期波动。事实上，骡子是风险等级 2 的乌龟和风险等级 4 的大象的交叉点。这类投资产品大多数是混合产品，一般由定息债券和股票组成。也可以把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归入此类。此外，投资分散的国际高利率定期债券基金、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债权组合

也属于此类风险等级。舍费尔建议这类产品的最低投资年限是3~5年。

大象是风险等级4的标志，没有什么能立刻撼动此类厚皮动物，虽然大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真正起跑，但一旦它全力以赴便没什么东西能很快阻止它。大象代表着安全性和收益性之间最有利的关系。广泛分散的国际股票基金构成了这一等级的典型产品。理论上，投资这些产品可能让我们亏钱，但10年不动用这笔钱，也就不存在亏钱的可能性了。

马是风险等级5的标志，马可以跑得飞快，这就意味着可以获得可观的收益。但是，马很容易受到惊吓，容易朝着完全错误的方向落荒而逃。马代表的是高收益预期，但也代表了风险和极其危险的波动性。这类投资产品包括世界股票市场中的大型细分市场、行业和各欧元区国家为投资重点的大型股票基金。此外，还有国际和欧洲的增长基金及创业板股票基金。舍费尔建议，风险等级5的最低投资年限应是大于等于10年。

老虎是风险等级6的标志，其风险程度最高，但收益率也最高。投资老虎级的产品有最大的概率在1年内使资金翻倍甚至更多。但老虎也可能为我们带来巨大的痛苦，投资这一风险等级产品，可能使我们长期遭受高额亏损。这类投资产品仅限于某一国家或特定的主题和行业，包括对冲基金、风险投资、期权证、期货、垃圾债券和垃圾股票，还有那些无法评估而只能根据别人的评价来购买的股票产品，以及无保障的企业股份和灰色资本市场上的许多产品都归为这一类。舍费尔建议，风险等级6的最低投资年限应是10年以上。

第六章“各类投资形式的优缺点”

不认真对待金钱的人终将被金钱支配。在本章里，舍费尔告诫投资者应当弄懂各类投资属于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并深入了解它们所处的风险等级以及各自的优缺点。

第七章“你个人的投资组合和足球策略”

财务的成功不是依靠偶然，而是因为遵循了周密严谨的体系。在这一章里，舍费尔告诉我们怎么以最理想的方式把资金分配到各个风险等级的投资产品之中。他建议我们考虑目标有哪些、有多少钱、属于哪一类投资个性、投资年限这四个关键问题。在舍费尔看来，只要把以上四点都考虑进去形成致富准则，在5~10年内我们肯定能达成自己预定的收益目标。

关键问题1：你的目标

任何投资者都不可能脱离自身的现状和目标。问一下自己，梦想和目标是什么以及为实现梦想和目标需要多少资金？

关键问题2：你的财务状况

在清楚个人目标及需要的资金之后，应当检验目前的财务状况。请确认目前处于哪个财务阶段，是财务保障、财务安全还是财务自由？

关键问题 3：你的投资个性

理想的投资策略不仅和目标、财务状况有关，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风险承受能力。

关键问题 4：你的投资年限

除了投资目标、财务状况和风险接受度以外，投资年限也对资产的分配有很大的影响。年龄可能是衡量投资年限的一个很好的指标，但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打算或者必须回笼资金的时间越早，所投资产品的风险等级应该越低。反之越是能够长时间不去动用这笔资金，就可以选择风险等级越高的产品。

根据不同的投资个性类型和投资者所处的财务阶段，应该有差异性地开展投资。为此，舍费尔给出了资产分配方案的建议。

第八章“不要拒绝良好的建议”

舍费尔认为，专家往往具备普通投资者难以掌握的专业知识。如果我们不具备全面的投资知识，时间也不够充裕，就应该找一位好的投资顾问。在理想状态下，投资组合顾问的选择是一个涉及一生的决定，因此应投入时间慎重选择。

第九章“基金和其他产品投资成功的 11 条准则”

在这一章里，费舍尔给出 11 个投资成功最重要的准则。

准则 1：股市总是好坏行情交替变化，存在着小循环和大趋势。

准则 2：为了取得高额收益必须做好准备，要至少 5 年或最好 10 年把资金放在股市中。

准则 3：股市危机也有好的一面，它可以提供机会让你买到超低价的股票。

准则 4：保持现金储备。

准则 5：买进和卖出都宜早不宜迟。

准则 6：不要盲目从众，频繁转换。

准则 7：永远不要直接投资你无法判断的市场。

准则 8：学会分散投资。

准则 9：未来的市场可以赚到巨大的收益。

准则 10：正确的资产配置比投资更重要。

准则 11：投资组合要混合依赖股市发展和独立于股市外的产品。

第十章“怎样发掘出最优投资项目”

投资成功只有 4.6% 取决于正确的產品选择，但有 91.5% 取决于我们是否选对了行业、区域或市场。在行业和区域内选择基金应遵循的最重要的原则有：

- (1) 把大部分的投资资金用于购买大公司的基金；
- (2) 不要仅仅依靠收益率来做选择；

- (3) 选择基金要根据它的内容而不是它的货币；
- (4) 要注意基金的规模；
- (5) 不要盲目地去追随去年的大赢家；
- (6) 不要忘记了个人感觉惬意是多么重要；
- (7) 在你的投资组合中要保持持有 1~2 只你最喜欢的基金。

不要忘了最重要的是你的资产配置。评价技术标准和排序表的准则有：

- (1) 过去的投资发展状况对未来毫无意义；
- (2) 评估的时间越短，评估的说服力就越弱；
- (3) 仅靠效益来评鉴基金说服力不够；
- (4) 可运用德国投资公司协会方法来确定基金效益；
- (5) 比较基金的效益时，请注意不要拿苹果和梨做比较；
- (6) 请注意投资基金的效益受多种不同因素的影响；
- (7) 把比较指数也作为评估基准；
- (8) 请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
- (9) 一只基金不必总得战胜它对应的指数。

第十一章 “投资的成本”

这一章主要探讨税费、申购费、管理费以及其他类似支出。舍费尔建议投资者应忘记节省赋税模式，他认为如果直接缴纳税费，再好好投资净资产，资产状况反而可能会更好。此外，应避免重税不利的投资方式。

原则上，可以将支出划分为两类，即直接支出和间接支出。直接支出是基金层面的支出，包括托管银行的管理费、基金经理的管理费、基金经理的利润分红等，每年占 1%~3%。投资者无法左右直接支出，这笔费用会从基金公司能证明的收益中扣除。间接支出是基金产品之外的支出，包括个人缴纳的税费、基金申购费、赎回费、基金平台的服务费、顾问费等，这类支出投资者完全可以控制。

第十二章 “轻松投资：何时买进，何时卖出”

申购一项新投资的最佳时机是什么时候？对于风险等级 4 的投资产品来讲，购入时机对最终结果几乎没有影响。对风险等级 5 和 6 的投资产品来讲，情况有所不同。许多新兴市场在超过 36 个月的时间里平均增长率高达 350%，然后在超过 18 个月的时间里会跌落约 50%。面对如此强烈的波动，最有效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唯一有用的策略是在股市大跌后买进。为此，我们需要有现金储备。

那么什么时候应该卖出呢？这取决于我们投资的产品处于哪一个风险等级。对于风险等级 1、2、3、4 的投资，几乎不必采取任何行动。对于风险等级是 5 和 6 的投资产品，我们需要记录下收益目标，并在达到收益目标后从中

抽出部分资金。

第十三章 “如何管理投资”

在我们开始投资并且取得一定投资效果之后，我们该如何管理投资呢？在本章中，舍费尔针对一些投资管理中常见的问题提出了他的建议。

关于在哪些时期应该管控投资？舍费尔建议，最开始每隔1~3个月查看并记录基金的最新行情状况便足够了。此外，每年需要抽出半天至两天的时间，根据资产状况和投资个性来考虑投资策略。

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记录下最重要的数据？舍费尔建议购买真正需要的软件。此外，还应做好书面记录，把所有和投资策略相关的重要信息都记录下来。

怎样确保每月能有一定的进账？舍费尔建议，构建适合自己的、组织优良的年金或资金赎回账户。

固定的每月存储利率会降低投资的透明度，获得的收益很难估算，因此，舍费尔建议进行两项不同的投资，一是进行单笔投资；二是做定期定额投资。关于是否需要时不时更换投资这个问题，舍费尔认为如果决定好了定期定额投资，原则上一年更新一次仓位就足够了。同时，应当借此机会适时调整策略，使之适应生活水平和股市行情的变化。

舍费尔建议最好确立一个财务日，在这一天查看上一年财务的发展情况，然后制定下一年的财务计划。

第十四章 “献给冒险热衷者的两个风暴点子”

成功的代价是我们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通往成功和财富的关键钥匙就是勇于承担风险。在本章中，舍费尔给冒险热衷者提供了两个风暴点子，一是将不动产贷款的期限缩短50%；二是利用杠杆作用让每年的收益翻番。

幸福和富有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虽然富有绝对不能直接和幸福相提并论，但富有可以连接起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从而为人们架起一座通往幸福的桥梁。这本书也不错，虽然有部分内容与《财务自由之路：7年内赚到你的第一个1000万》有重复，但仍然可以说是一场悦读之旅。

财富是一个体系，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学习获取这一体系；财商是一种思维方式，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学习获取这种思维方式。要知道成功者从不靠偶然的机遇，理性的投资者应做好迎接风险的准备，明智地进行投资。好的投资可以让投资者关注到自己的内心世界，真正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富足，从而实现财务自由。

作者：山东工商学院 常叶青

来源：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Ng2ElYLYpf3yp6yDPmy2Q>

★学术资源推荐

图书推荐



《一首财富 一首幸福》

作者：李婷婷

出版发行：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7.09

ISBN：978-7-5171-2473-3

中图法分类号：B848.4-49

内容提要：财富和幸福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但是，在追求财富和幸福的过程中，不同的人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有的人将财富和幸福定义在表面层次，认为只要得到了物质的满足和看似光鲜的生活状态就是好的。但是，有的人把财富和幸福定义在内在层面，他们不会在意是否得到了金钱，精神上的满足和幸福对于他们而言永远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不管一个人更侧重于哪一个方面的满足，我们都不能否认，财富和幸福对于我们而言缺一不可。

电子全文链接：

http://img.sslibrary.com/n/slib/book/slib/14378361/462c4e363eec4821b0b346d945e6ca68/c509108878b310a7f945c28f660576a8.shtml?dxbaoku=true&deptid=1356&fav=http%3A%2F%2Fwww.sslibrary.com%2Freader%2Fpdg%2Fdxdpgread%3Fd%3Df30e3c215a2b7371e8268f6273b69f93%26enc%3D8421c5f162c880bb121fe8afb4dc678d%26ssid%3D14378361%26did%3D1356%26username%3Ddx2baoku_sdgsyy_1356&fenlei=0214080432&spage=1&srh=1&t=5&username=dx2baoku_sdgsyy_1356&view=-1

《灵魂与财富》

作者：张建农

出版发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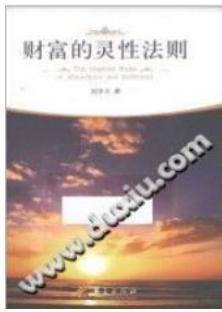
ISBN：7-5080-3956-4

中图法分类号：F715

内容提要：作者创业多年，用过自己的亲历亲闻，总结经商方法等，告诉读者如何把握灵魂与财富的关系，平衡灵魂与财富的关系，成为承担社会责任，对国家、民族作出贡献的成功企业家。

电子全文链接：

http://img.sslibrary.com/n/slib/book/slib/11635666/c1a43554b32b4d48926ba87df4d9e4a7/4722deb634930c9ecce8e184f30cd1f7.shtml?dxbaoku=true&deptid=1356&fav=http%3A%2F%2Fwww.sslibrary.com%2Freader%2Fpdg%2Fdxdpgreader%3Fd%3Dcb3e5be9a643594fbb71b574e938d047%26enc%3D0cf6785d53e4bd a7a370be8acb0ae33a%26ssid%3D11635666%26did%3D1356%26username%3Ddx2baoku_sdgsyy_1356&fenlei=06100107&spage=1&t=5&username=dx2baoku_sdgsyy_1356&view=-1



《财富的灵性法则》

作者：吴中立

出版发行：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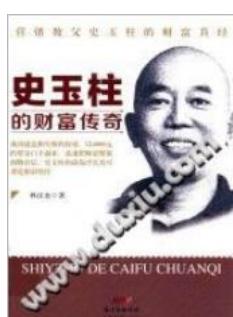
ISBN：978-7-5080-8499-2

中图法分类号：B821-49

内容提要：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后，用于维持生存和发展的财富及其象征物“金钱”就成了人类的普遍追求目标并很快被异化为膜拜对象，被赋予了太多的迷幻色彩，人际纠纷、社会斗争直至流血漂橹的大规模战争，莫不与财富和金钱紧密相连。作者认为，财富和金钱与万物一样，都有其内在特性，人类应正确对待其来去得失，求得心灵的富足和安宁。本书将财富人格化，以直接或间接沟通的独特方式，探讨了不同人群对待财富的态度偏差，批驳了求诸风水改运等迷信做法的荒谬性，开出了消除金钱烦恼的修心良方。

电子全文链接：

http://img.sslibrary.com/n/slib/book/slib/13846802/d82e75dac89e4d4986fbedf121c35f0d/4ed3eadcae7e694a37b418baeb55ad2a.shtml?dxbaoku=true&deptid=1356&fav=http%3A%2F%2Fwww.sslibrary.com%2Freader%2Fpdg%2Fdxpdgread%3Fd%3Ddee365c2af9dfb3130a3f56eca440e95%26enc%3D70ce5ce0dfc5145c6be5c9cb8c7357e2%26ssid%3D13846802%26did%3D1356%26username%3Ddx2baoku_sdgsyy_1356&fenlei=02120231&spage=1&t=5&username=dx2baoku_sdgsyy_1356&view=-1



《史玉柱的财富传奇》

作者：林汶奎

出版发行：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5.03

ISBN：978-7-5454-3862-8

中图法分类号：F279.23；K825.38

内容提要：《史玉柱的财富传奇》追寻史玉柱大起大落的人生轨迹，从客观的角度真实再现了一位营销天才，如何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又是如何从人生的低谷，重新再崛起，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为读者呈现史玉柱身为企业家的执着、诚实、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

电子全文链接：

http://img.sslibrary.com/n/slib/book/slib/13921520/4fc17c449f394311ab71e301e36a1c4b/0ce362f68dd7ed28df9681ca123d56fd.shtml?dxbaoku=true&deptid=1356&fav=http%3A%2F%2Fwww.sslibrary.com%2Freader%2Fpdg%2Fdxpdgread%3Fd%3D286cd7e45ae3e109554d5727a570e8f1%26enc%3D944b0b2ca020add368d20%26ssid%3D13921520%26did%3D1356%26username%3Ddx2baoku_sdgsyy_1356&fenlei=060308080202&spage=1&srh=1&t=5&username=dx2baoku_sdgsyy_1356&view=-1



《场外财富 360 问》

作者：王骥

出版发行：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01

ISBN：978-7-5136-3338-3

中图法分类号：F832. 51-44

内容提要：场外市场三部曲第一部《场外财富 360 问》，本书对场外市场从国家、企业战略层面进行了历史性、历程性解读，并与国家、企业转型紧密联系，具有国际借鉴的“登高望远”、对国内发展思路、路径和历程追溯的“俯首反思”以及企业如何透析国家时左时右“运动性”政策趋势而“规避政策性损失，尽可能地游刃有余”等作用，层次和战略布局上都具备一定高度和经验获取的动力。不论投资者、制度设计者还是企业的运营者，如想要深刻理解、操作场外市场的投融资运营，思想、境界需要上升一个台阶的话或许能给予更多满足。

电子全文链接：

http://img.sslibrary.com/n/slib/book/slib/13671538/bf73da024d9f4ff6a508bf37b0f08e93/a040c513a4c5a57386d3e8cda8e74b92.shtml?dxbaku=true&deptid=1356&fav=http%3A%2F%2Fwww.sslibrary.com%2Freader%2Fpdg%2Fdxdpgreader%3Fd%3Df23b3c53fe415a4292b0880ed38a42ad%26enc%3Dc9c581866024e6901df8bcc7894cf778%26ssid%3D13671538%26did%3D1356%26username%3Ddx2baoku_sdgsyy_1356&fenlei=0611030308&spage=1&t=5&username=dx2baoku_sdgsyy_1356&view=-1



《财富幻象的哲学批判 中国面向未来的财富观建构》

作者：范宝舟

出版发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08

ISBN：7-208-13850-6

中图法分类号：B018

内容提要：财富幻象是指人们脱离财富的物质实体构成、财富生成的社会历史关系和财富的属人性本质，而在主观上通过感觉、意念、联想和想象路径所形成的关于财富存在的假象、错觉乃至幻觉意向。在资本逻辑之下，财富幻象表现为货币幻象、资本幻象、信用幻象和目的性幻象。财富幻象的生成及其加剧与商品化向金融化，再向价值符号化的深度推进相一致。当下中国，要超越财富幻象的羁绊，一方面在拓展经济增长的新领域上，要树立生态财富观、虚拟财富观、知识财富观等等；另一方面在财富的价值指向，要树立共同富裕的财富观、公平正义的财富观、以人为本的财富观；再一方面在财富的获取上，要把财富创造落实到辛勤劳动、诚实守信、服务社会的原则上来。

电子全文链接：

http://img.sslibrary.com/n/slib/book/slib/14011211/011b94c6c7e54d379ab2c47d61bed065/dc2e1fd5c1f8ac24b8f093c8504338ed.shtml?dxbaku=true&deptid=1356&fav=http%3A%2F%2Fwww.sslibrary.com%2Freader%2Fpdg%2Fdxdpgreader%3Fd%3Dd3477f30d8ed05a16e7dc27ed8af0adf%26enc%3D288d9bb046adf26d20bfba8c7e6a9bb%26ssid%3D14011211%26did%3D1356%26username%3Ddx2baoku_sdgsyy_1356&fenlei=02020210&spage=1&srh=1&t=5&username=dx2baoku_sdgsyy_1356&view=-1

论文推荐

1. 税收递延、退休财富目标与养老金双账户投资策略/陈峰，李仲飞，曾燕/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

摘要：本文基于商业养老保险的税收递延政策，考虑消费者在面临不同税收政策下的养老金双账户投资管理问题。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假定消费者在工作期间获得随机收入，主要用于消费、缴纳基本养老金和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并将商业养老保险投资到金融市场。消费者在退休时希望能够实现一定的财富目标，即基本养老金账户和商业养老保险账户的终端财富之和需要达到一定水平用于保障退休后的生活。消费者的目标是最大化工作期消费和退休时刻财富超过目标水平的期望效用。与已有文献不同，本文假定消费者的风险厌恶系数是时变的，运用鞅方法，本文得到最优消费与投资策略的解析式，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模型重要参数对最优消费和投资策略的影响。结论发现税收递延政策有利于养老金参与者购买更多商业养老保险，有助于降低投资风险。

关键词：个税递延；人力资本；时变风险厌恶；财富目标；

分类号：F842. 67； F812. 42

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721001，71771220）；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研究团队项目（2014A030312003）；中山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14000-31610163）；

来源：《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0. 04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AUTO&filename=XTLL202004002&uid=WEEvREcwSlJHSldRa1FhdkJtNEYwbVZhck1QaEhoMU1FNUnoU296S0RFR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I5ODFUbkhZckc0SE5ITXE0OUZab1I4ZVgxTHV4WVM3RGgxVDNxVHJXTTFGckNVUjdxZll1Wm1GeW5rVmI3TVA=](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AUTO&filename=XTLL202004002&uid=WEEvREcwSlJHSldRa1FhdkJtNEYwbVZhck1QaEhoMU1FNUnoU296S0RFR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I5ODFUbkhZckc0SE5ITXE0OUZab1I4ZVgxTHV4WVM3RGgxVDNxVHJXTTFGckNVUjdxZll1Wm1GeW5rVmI3TVA=)

2. 券商介入是否影响新三板公司被并购的短期财富效应——基于券商网络资源视角/雷卫/西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文章运用2015年—2018年上市公司并购新三板公司样本，探索主办券商介入是否影响新三板公司被上市公司并购的短期财富效应。研究发现：

（1）券商通过信息传播与控制，专业的并购能力对新三板被上市公司并购提供支持，搭建新三板公司与上市公司交易的渠道，减少并购环节的问题和摩擦，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对并购有促进作用；（2）券商借助网络和声誉释放有利于新三板公司被并购信息，促进市场信息传播效率，引发投资关注和提高

对被并购公司的预期，引起公司股价波动，为股东带来额外收益。文章提出了在制度不健全且“关系型社会”主导下的中国资本市场券商网络关系与新三板公司并购的潜在方向，对国内尚未深入的“金融中介网络与治理职能”的研究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券商网络；并购信息；投资者关注；新三板公司；财富效应；

分类号：F271；F832.51

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上市公司终极实际控制权现实状况、作用机制及其行为后果研究”（项目编号：71572149）；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基金博彩型股票交易行为的动机、收益及对市场稳定性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71703119）；四川省2013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基金；西南财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资本结构，内部控制与并购绩效研究”（项目编号：JBK1507065）；

来源：《兰州学刊》，2020.04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AUTO&filename=LZXK202004009&uid=WEEvREcwSIJHSIdRa1FhdkJtNEYwbVZhck1QaEhoMU1FNUdoU296S0RFR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Q1MjhZdVptRnlubVVML0tLVGZUWmJHNEhOSE1xNDIGYllSOGVYMUx1eFITN0RoMVQzcVRyV00xRnJDVVI3cWY=](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AUTO&filename=LZXK202004009&uid=WEEvREcwSIJHSIdRa1FhdkJtNEYwbVZhck1QaEhoMU1FNUdoU296S0RFR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Q1MjhZdVptRnlubVVML0tLVGZUWmJHNEhOSE1xNDIGYllSOGVYMUx1eFITN0RoMVQzcVRyV00xRnJDVVI3cWY=)

3. 证券公司数字化财富管理发展模式与路径研究/华泰证券课题组朱有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战略发展部

摘要：本文系统研究了证券公司数字化财富管理业务，在重新定义数字化财富管理的内涵、总结境内外典型机构数字化财富管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证券公司数字化财富管理面向未来的发展定位、发展模式以及相关政策建议。本文提出，证券公司数字化财富管理发展应贯彻以客户为中心、围绕价值链建设全面数字化体系、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用数据驱动业务发展这四大核心定位。同时，本文基于顶层设计及优化监管的视角，提出了促进证券公司数字化财富管理发展的政策建议：一是建立数字化财富管理的统筹监管机制；二是完善证券基金类投顾政策法规；三是加强投顾利益冲突管理；四是扩展账户基础功能；五是明确数字化服务标准。

关键词：证券公司；数字化财富管理；数字化发展模式；金融科技；

分类号：F832.3

基金：中国证券业协会2019年度优秀课题“证券公司数字化财富管理的发展模式与路径研究”（2019SACKT076）；

来源：《证券市场》，2020.04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AUTO&filename=ZQDB202004001&uid=WEEvREcwSIJHSldRa1FhdKJtNEYwbVZhck1QaEhoMU1FNUnoU296S0RFR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TQ1MTZVYnJQUHp6UGJMRzRITkhNcTQ5RlpZUjhIWDFMdXhZUzdEaDFUM3FUcldNMUZyQ1VSN3FmWXVabUZ5bm4=](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AUTO&filename=ZQDB202004001&uid=WEEvREcwSIJHSldRa1FhdKJtNEYwbVZhck1QaEhoMU1FNUnoU296S0RFR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TQ1MTZVYnJQUHp6UGJMRzRITkhNcTQ5RlpZUjhIWDFMdXhZUzdEaDFUM3FUcldNMUZyQ1VSN3FmWXVabUZ5bm4=)

4. 房价收入比与家庭消费——基于房产财富效应的视角/何兴强，杨锐锋/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摘要：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2013年和2015年数据，基于调查数据构建和计算城市房价收入比，分析房价收入比对家庭消费房产财富效应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房价收入比对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有房出租、拥有大小产权房和不同收入阶层家庭消费房产财富效应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房价收入比高时家庭消费水平也相应较高，但房价收入比高却显著降低了家庭消费的房产财富弹性；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有房出租家庭消费的房产财富效应受房价收入比高的弱化影响更小，拥有大产权比小产权房更能抵御房价收入比高对消费房产财富效应的弱化影响，高收入家庭的抵御能力更强。

关键词：消费；房产财富效应；房价收入比；

分类号：F299.23；F126.1

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57328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7172100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8ZDA092）的资助；

来源：《经济研究》，2019.12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L&filename=JJYJ201912008&uid=WEEvREcwSIJHSldRa1FhdKJtNEYwbVZhck1QaEhoMU1FNUnoU296S0RFR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TM3MDdTN0RoMVQzcVRyV00xRnJDVVI3cWZZdVptRnluZ1VMdlBMeWZTWkxHNEg5ak5yWTlGYklSOGVYMUx1eFk=](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L&filename=JJYJ201912008&uid=WEEvREcwSIJHSldRa1FhdKJtNEYwbVZhck1QaEhoMU1FNUnoU296S0RFR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TM3MDdTN0RoMVQzcVRyV00xRnJDVVI3cWZZdVptRnluZ1VMdlBMeWZTWkxHNEg5ak5yWTlGYklSOGVYMUx1eFk=)

5. “财富焦虑”从何而来/李晓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安全资产的缺失、公共服务问题的突出、消费文化与道德价值的错位，人们产生了“财富焦虑”的心态。缓解“财富焦虑”需要注重金融创新和资产配置，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财富伦理建设。

关键词：“财富焦虑”；消费降级；消费文化；

分类号：C912.6

基金：教育部社科项目“公共支出对中国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8YJA790045）阶段性成果；

来源：《人民论坛》，2018. 34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L AST2019&filename=RMLT201834023&uid=WEEvREcwSIJHS1dRa1FhdkJtNEY wbVZhck1QaEhoMU1FNDoU296S0RFR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 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zIwNjR1eFITN0RoMVQzcV RyV00xRnJDVVI3cWZZdVptRnluZ1dydktOeURIZXJHNEg5blBxNDIWIjRSOG VYMUw=](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L AST2019&filename=RMLT201834023&uid=WEEvREcwSIJHS1dRa1FhdkJtNEY wbVZhck1QaEhoMU1FNDoU296S0RFR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 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zIwNjR1eFITN0RoMVQzcV RyV00xRnJDVVI3cWZZdVptRnluZ1dydktOeURIZXJHNEg5blBxNDIWIjRSOG VYMUw=)

6. 中国财富和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利弊和对策/简新华/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摘要：分析评价现阶段中国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劳动收入比重偏低的现象及其原因和危害，探讨合理有效的应对之策，指出应该要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实现产业链升级、完善国有企业制度、发展公有制经济、健全市场机制、实行国家调节、克服市场失灵、改革完善分配制度、节制资本、搞好全民教育、健全社会保障和救助、完成和稳固精准扶贫和脱贫、持之以恒地反腐败等多管齐下，强调中国现在应该重点做好、分好“蛋糕”，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私有制和市场机制优胜劣汰必然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与社会主义最终要消灭剥削和走向共同富裕之间存在的矛盾，及其合理有效解决的途径。

关键词：中国；亿万富翁；收入分配；贫富差距；

分类号：F124. 7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17 年度重大项目“中国经济走势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17ZDA036）；

来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06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L AST2019&filename=XTDX201806003&uid=WEEvREcwSIJHS1dRa1FhdkJtNEY wbVZhck1QaEhoMU1FNDoU296S0RFR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 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c0NDFYMUx1eFITN0RoM VQzcVRyV00xRnJDVVI3cWZZdVptRnluFZycktQVG5QZHJHNEg5bk1xWTlG WjRSOGU=](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L AST2019&filename=XTDX201806003&uid=WEEvREcwSIJHS1dRa1FhdkJtNEY wbVZhck1QaEhoMU1FNDoU296S0RFR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 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c0NDFYMUx1eFITN0RoM VQzcVRyV00xRnJDVVI3cWZZdVptRnluFZycktQVG5QZHJHNEg5bk1xWTlG WjRSOGU=)